



天津第一机床厂

www.duxiu.com

內 容 提 要

天津發電三廠是天津的第一座發電廠，到現在已有50幾年的歷史。

它歷經了許多次變遷：法國資本家、比利時商人、日本財閥、國民黨統治者，他們都在這裡施展了滅絕人性的伎倆，壓榨工人，來裝肥自己的肚腸。

可是我們的黨，早就在這個發電廠里播下了革命的種子，因此儘管工人們受盡了剝削，但始終堅持着不懈的鬥爭。他們的勇敢，他們的智謀，都給了敵人沉重的打擊。這部廠史就生動地記述了這些壓迫和反壓迫的鬥爭史實。

天津工廠史叢書

天津第一座發電廠

中國作家协会天津分會 編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錦州道6号)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6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 65/8 字數117,090

1960年4月第1版、196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8 100

天津工厂史丛书序

“天津工厂史丛书”的编辑出版，是想把从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間，天津工人进行工厂史写作活动的成果，做一个初步的总结，以便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前进。

工厂史的写作，是由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倡议的，并得到苏联共产党中央的赞同，和广大苏联作家和工人的热烈响应。在二十到三十年代期间，苏联工厂史的写作活动，在高尔基亲自主持下，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对苏联的工人阶级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整理和保存了大量有关苏联工业发展的宝贵史料，还培养了一批为数不小的优秀的工人阶级作家，成为整个苏联文学队伍的组成部分。

天津工厂史的写作活动，就是受到了苏联先进经验的启示，在中共天津市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和帮助下进行的。一九五八年，是一个伟大的、难忘的年代：中国人民以巨人般的步伐，跨过重重困难，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天津工人写作工厂史的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年月

6102/12/1

开始的。工人们意气风发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劳动，同时，回忆到了过去的黑暗年代，悲惨生活以及英勇的斗争，而更加鼓足干劲，为澈底埋葬旧生活，和迅速建立新生活进行了胜利的战斗。

“天津工厂史丛书”，可以说是这一时代精神特微的反映。虽然就其写作内容来说，大部分还是旧生活的回忆，但其中已经包含着有觉悟的对比；包含着对于已往反对帝国主义和阶级敌人的光荣自豪；而且对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信心。就这个意义上说，一九五八年工厂史写作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正是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空前提高，革命热情高度昂扬的表现。事实上，写作工厂史活动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不但发动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参加提供材料和进行写作，并且每一篇优秀的工厂史作品的出现，都立即变成了良好的工人教材，随时随地起到了鼓舞和教育的作用。同时，就是在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工人阶级集体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涌现出来了一批积极的、有才能的工人作者。

在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各工厂党委积极领导了这一工作。因此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获得比较大的成果。工会、青年团和一些高等学校的教师、学生，都是这一活动积极赞助和参加者。不少的作家，直接参与了编写和整理工厂史稿的工作。

“天津工厂史丛书”，就其内容来说，是丰富的；就形式来说，也是多样的。但是，这毕竟是一项新的工作，

是群众性的创作。关于它的许多想法和做法，以及作品的
内容和形式，都还不能说是成熟的，还有待于在实践中逐
步解决。但是作为天津工人阶级在描写自己的生活和斗
争，在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感情，在描写工人阶级伟大的创
造历史的活动中，他们已经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

一九五九年六月

目 录

上卷 变迁志

躲在海楼教堂的后面.....	(3)
第一次罢工——争双月.....	(10)
第二次罢工.....	(16)
第三次罢工.....	(34)
从西洋鬼子手里转到东洋鬼子手里.....	(57)
跟日本鬼子斗.....	(61)
血 债.....	(70)
又是一个朝代.....	(78)
包身工.....	(87)
解放之歌.....	(107)
电厂年青了.....	(110)

下卷 人物志

温兆宾.....	温兆宾 口述 (121)
裴树林.....	裴树林 口述 (130)
焦登瀾.....	焦登瀾 口述 (135)
于庆云.....	于庆云 口述 (141)

于文富.....于文富 口述 (152)

馬增惠.....馬增惠 口述 (158)

于恩源.....于恩源 口述 (167)

赵树才.....赵树才 口述 (185)

王庭芳.....王庭芳 (191)

卷 上

志 迂 變



躲在望海樓教堂的后面

金鐘河、大清河兩条濁流終于在天津的心臟地区汇合了。它們并成一股更大的水勢泄入海河，蜿蜒地向渤海灣流去。这三河相結的地方叫三岔河口。几百年来，几十年来，一直到今天，它都是天津的水陆要道，是内通外达的樞紐。

守在三岔河口上的，有座远近馳名的望海樓教堂。这座青砖砌就的教堂，實質上是一座变相的碉堡。法国教士为什么单单看上这块地方，那是別有用意的。因为望海樓的鐘樓可以修的很高，法国神甫可借撞击鐘声之便，了望三岔河口上的船舶往来，以及对岸督署、衛城里外的动静。平时是文化侵略基地，战时便是一座控制水陆要道的大寨了。不过，法国侵略者的算盤打得并不如意，望海樓教堂兩次被激怒了的人民群众給燒光。特別是第二次，1870年5月（同治9年），因教堂戕害嬰兒，群众激憤，當場打死法国領事丰大业，成为举世震驚的“天津教案”。这场教案虽然由清政府奴顏卑膝，砍了十五位劳动人民的

頭顱，給帝國主義找回一些面子來，就此結束；但是做為火燒望海樓的導火綫，那塊埋死孩子的亂葬崗子——“修女坎”和“小鬼庄”却成了法國神甫的一塊心病。吃了苦頭學了乖，法國鬼子不敢再向坎地裡埋死孩子了。光這樣還不行，人們總管它叫“小鬼庄”，這個名兒在這個地界帶刺激性，對於教堂的影響還是不利。再一說，在他們看來，“小鬼庄”還是可以換錢的土地呀！怎麼能讓白花的銀子扔在地上呢，得想法子呀，一晃三十年過去，這才由法國駐津領事館的一位高級職員兼商人叫克立孟·布吉瑞的出面，向清政府交涉，要在“小鬼庄”坎地上蓋起一座發電廠來。當時的北洋大臣是袁世凱，自然唯命是從。於是就在1904年簽訂建廠條約，並圈購了附近的一些坎地，一共用地250畝左右。這個法國人並不是獨資，是聯合比商世昌洋行一起訂約的，營業的區域以天津城內的鼓樓為中心，圓周六華里以內為限。這個世昌洋行的股東是誰，原來就是比利時國王王室。當時投資額很不小，是電燈電車一起辦。後來布吉瑞又另辦法租界電廠，整個移給比商了，所以這家公司的名稱叫“比商電燈電車有限公司”。因而人們後來簡稱這家電廠做“比國電燈房”。

電廠開初只有鑄駝機兩台，發電量每小時才一千瓩。1906年開始供電，發電量很少，主要是供官銀號城裡一帶用電。別瞧電量不大，可是買賣做得霸道，真稱得起是一本萬利，電費簡直和掠奪一般，貴的邪行！據當時給比商總辦做翻譯的職員講，這家小小發電廠賺得的利潤，有個時

期足供比利时全国军队军费开支还有余；乍听起来，好像有些玄乎，但是细算一算账，却是半点儿也不假。我们就以这家电厂在比商时期中间阶段的一年（1928）来算算看吧。这一年发电厂的发电量平均起来，每小时可以发电一万码，一天廿四小时共发电24万码。这些电卖给用户要多少钱呢，要两角五分钱一码电。一天廿四小时就是六万元，一年三百六十天，恰好是1836万元。当然啦，发电量不可能每小时都是高负荷，减半计算，也很可观了。再说它的发电成本要用多少呢，每一码电的成本（包括人工、煤费、设备折旧一包在内）才合一分多钱。请看看外国资本家赚的是多少倍的利钱，这还不算，那时候，按一个电表先要交20元钱的押金，用户用电在四码以下的一律月收一元钱，四码以上的才按两角五分一码电折合，里折外拐，它的利润真是连滚带翻呀。

比商对于中国职工的统治是秉承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手段分而治之的。工资一律按日薪算，小工是每天两角，临时工是两角五，职员每天由五角到八角不等。工头是直接骑在工人头上的，给的薪金比职员还多，由一元到一元二角不等。通过几次罢工斗争，工人的日薪上升到平均七角到八角，职员由一元五角到两元。职员和工头还额外管房子住，灯水全不花钱。仿佛这是一块香饵，引诱着人们往上爬，越是骑在别人头上越有好处。把职员和工人严格的区别开。在工人之间，他们也还是分而治之，利用方牌和圆牌的不同，硬把工人划成两堆。挂圆牌的是长期的，正

式的工人，这些工人还能享受一些正式员工的福利；另一种是临时工挂方牌的，干一天说一天，那就什么都享受不到了。自然，这部份临时工，活不少干，钱却少拿，看着正式工未免眼热，总是尽量多做好做，盼望升为正式工。正式工有这么一帮临时工等着挤进来，当然也要战战兢兢，嘀嘀咕咕了。鬼子通过工头还经常在这里面制造一些矛盾，生怕工人们团结起来，手段可是毒辣了。

比商的待遇和中国人比起来，那简直是一天一地。矿厂的总办和副办的待遇高到每天要15元到20元的工资，厂里还供汽车用、三个侍候他的佣人、一人一栋三层楼房。公司总办的薪金每天要30元到40元，汽车楼房都更加讲究之外，佣人增加到五至七人。虽然他们要中国人侍候，吃中国厨子做的西餐，可是中国人却不能直接给他们送饭，他们嫌中国人脏。专为送饭设计了一个升降机。当他们需要吃饭的时候，一按电铃，饭就从楼下送到楼上。吃完之后，一按电铃，杯盘碟碗就又从楼上降到楼下来了。中国人是轻易不许进屋的。

因为发电厂是开在望海楼教堂的后面，又是利用“小鬼庄”坟地盖起来的，所以一开头就和教堂里的神甫有着不可告人的瓜葛。教堂里不少神甫，经常开了后门，悄悄溜到这里，和这里的总办们一起大吃大喝，乱搞野妓。

当时河北一带，除去望海楼教堂的塔尖和电厂的大烟囱以外，周遭地区都是一片荒凉。每到望海楼教堂的钟声

敲起，电厂值班的工人听得特别清楚，有的工人连忙用右手指划一个十字，表示他們的感激和虔誠，要不是靠了教堂的引荐，他們怎么能吃上这碗飯呢？有的工人却暗自咬牙，想着为什么处处受洋人的拿捏，在这儿受这份穷罪。他們在高大的电厂楼房里干完活，出来却要踏着荒野到周乔庄一带去住。他們的住房都是用爐灰大焦子塊砌起来的窩鋪，冬不抗寒，夏不避热，有的一家老少三四輩只睡在半間房那么大的土炕上。人們能不恨嗎？人們是恨得牙痒痒的。

教徒在电厂工人里起着統治的作用。这里，我們只說两个人。一个是宗子明，一个是李寿山。

宗子明名义上是在鍋爐房看水，其实是干拿錢不办事的一霸，綽号宗胳膊。是一条单臂虎，那条胳膊是跟人家打架打下来的。他父亲在五十年前就信奉了天主教，和当时望海楼神甫养的一位打手是把兄弟，两个人勾結起来，称霸一方。据說在群众起来，火烧望海楼的那一天，宗子明他爹也被約进教堂里来，帮着神甫們守堂，手持洋槍，打死了不少穷人。后来他怕人們报复他，就逃往外地去了。留下他儿子宗子明，还在这一带晃蕩。神甫自然是另眼相看。到“电灯房”来，就是神甫荐来的。一来就是圓牌，拿头等工資。对人是张口就罵，动手就打，連把头都仇他一头。

李寿山也是神甫荐来的，給比國佬“傻魏”做总管，随后便当了大管事。这小子見錢眼黑，認錢不認人，长的哪

瘦癯癯的細高个，一臉小碎麻子，肉皮一松，麻子乱动，主意最多，就是把头給比国佬送礼，也得有他一份，不然，他給穿个小鞋，准保讓你看不了兜着走。大家給他賀了个外号叫李麻子。李麻子立下規矩，誰要想吃电厂这碗飯，不通过他不行。通过他先送兩袋洋白面，或是送对三錢多重的金戒子。

有回，在望海楼教堂做完禱告，李麻子跟宗路臂走在一塊了。宗路臂說：“大哥，您給想想法子，讓我二弟也进电灯房吧。听说現在沒空。”

麻子李的麻臉一松：“兄弟的事，你交我啦。好办，好办！”

他的主意真多，到了总管办公室，指手划脚的分配完杂役的工作，他兩只猫眼就紧着扫一个姓侯的，这人不是教友，他早相准他了。

不大会儿，姓侯的跟另外两个伙伴来了，路过这里。李麻子把他們吆喝住：“亲呀，有点事給办一下。”

姓侯的他們不敢怠慢，連忙过来問：“李管事，嘛事呀。”

“今天上午你們到后边总管院里打扫院子，把土箱倒了。完了事再进車間干活。”

“李管事，車間的头不知道，活等着做呢，請您老另找人吧。”

“你們头不知道，那沒关系，就說我叫你們干的。快去！快去！”李麻子不乐意啦，肉皮一紧，麻子直动。

老侯他們一看，非去不可啦，只好先到比國總管的院子里來。一進門正看見一個穿着華麗睡衣的女人，涂着一臉脂粉在那兒聞花香呢。三個人沒敢過去，再一看牆角上的土箱打掃得干干淨淨，那裏有土，這是怎麼一回事，老侯覺着不對味兒，連忙問那二位：“這是叫咱們干什么來了，李麻子這小子餓主意可多。”

“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逃不過。咱們快去車間吧。武大郎盤杠子，可別兩頭都夠不上呀！”

“對。反正是毀倒葫蘆洒了油，要找碴，咱們等着吧。”這三人連忙趕回車間去了。

李麻子笑不及及的，溜進後院來了。見了總管就說：“總管，您看見剛才那三個工人了嗎，他們上班不干活，跑這兒看地來了，這些小子們不是好人。”說着直用眼睛斜那女人。

那女人是南市的暗娼。是李麻子給找來的。她明白李麻子意思，就說：“這些臭小工子，饞貓的眼睛，瞧這盯我的勁兒！”

比國佬犯醋勁了。當時和李麻子說：“把他們三人給我開除出廠！”

第二天，宗子明的弟弟宗禿子上班了。這天晚上，望海樓教堂里，李麻子又和宗路臂見了面。宗路臂張嘴先道謝：“大哥，多虧您了！兩袋面，我讓禿子給您送過去。”

“嗨，自家哥們，說這些干什么。”其實，李麻子的算盤可打的緊，這一回不是兩袋面，是六袋面，他另外還上了兩個人！

—第一次罢工—爭双月

虽然比商剝削中国工人的手段很殘酷，但在充滿穷困飢餓的旧中国，在遍地都是失业人們的貧苦年代里，能够一月拿上八、九、十塊来錢的王資，这在吃了上頓沒下頓的人們眼睛里，还不是金飯碗啊。因而人們曾經把“电灯房”这行飯和鐵路、邮局并列，認為是生活比較穩定，了不起的好事由呢。加上电厂規模很小，人数不多，所以一直到1920年底这才爆發了第一次罢工斗争。

表面来看，这一次罢工斗争是年关挤的。大家都想年根底下松快着点儿，还还飢荒，因而比照有些洋行，有些大鋪戶的慣例，要求比商来个年終双薪，發双月。是自發的斗争，其实也飽含着时代斗争的气息。尽管这家發電厂的鉄門关得牢牢的，但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台，那股反帝爱国的風浪却已悄悄襲到这里来了。大家恨比国鬼子恨得牙痒痒，干柴烈火，所以一点就着了起来。

事情是从鍋爐房起来的。鍋爐房，当然誰都明白，这

是發電廠的最緊要部份，鍋爐要是不運轉，怎麼輸氣發電呢。鍋爐房的哥兒們明白他們一天流出來的汗多麼緊要，所以大伙一合計，拿捏他洋鬼子一手兒，在卅號這天，乘洋鬼子們準備過新年，歡渡除夕的當口，由彭頭領着去找“大白脖”。這一下子就把“白脖”弄蒙了，年關底下橫來這麼一杠子，已經出乎意外了，更出意外的是由工頭領着來的。工頭是他們養的看家狗，怎麼這當兒，胳膊肘兒朝外擰了呢？洋傢伙耍洋脾氣了，藍眼珠子一翻，也不說給，也不見工人。

彭頭不含乎，和窮哥們一條心，大的嗓子轟轟地喊着：“哥兒們放心，咱們一定讓大白脖年底發紅！”

“不發雙月不上工”，大伙把這一招端出來，不是吓唬他，當真把工具傢伙扔了一地。

從早八點起不干活兒了，可也不走，等着“大白脖”答復。鍋爐房不冒蒸氣，發電廠還有什麼概念？“大白脖”耗到中午吃不住勁了。於是答復鍋爐房的工人，說是方牌工人不發紅，圓牌工人給加半個月的工資。瞧瞧這個答復吧，還在利用圓牌方牌打算挑起工人的不和呢！

大伙明白，這不是答復條件，干脆說，這是噙火呀。噙火就得給點顏色看，鍋爐房的哥兒們一人手里拿着一根木棒，一窩蜂兒擁到辦公室門前。舉着大棒子喊喝：

“給我們發雙月！”

“不發雙月不干活！”

“大白脖”先還不肯出頭，好像和工人們見面，他就

扫了面子，輸了这口气了。可是架不住大伙喊的厉害。而且，越喊人越多。这一拉队伍不要紧，全厂的各部門工人都出来了。全厂罢工，将办公楼团团围住。逼得“大白脖”和工人照面了，嘴里也吐人言了。說道：“伙計們，大家不要鬧。有事商量商量好。”

光抹兩句甜話頂什么用，大伙忽拉一下子上来，把“大白脖”围在当中。又是一陣喊喝：

“發双月！不給就不上工！”

“大白脖”一看，事情不妙。把他围了个風雨不透，想跑也跑不了。真要是棍棒往下一落，不砸成肉醬，也好不了哪儿去。捏着鼻子他答应下来，全厂工人一律加發半月工資；算是年終双薪。

大伙一听，又是一片喊喝：“發一个月的！發一个月的！”

“大白脖”真行，是舍命不舍財的家伙。他有个推辭，要發整月的他做不了主，得請示公司。大伙七言八語的一合計，生怕“大白脖”借嘴溜了，再不算話。于是就接受半月加薪的条件，結束了這場斗争。不过，当时的斗争經驗还太少，沒有料到外国資本家詭計多端，沒有讓他签字，也沒有附帶任何保証条件，以为拿到錢也就完事大吉了呢。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大伙这一夜干的挺欢。等轉过年来，大清早晨，人們剛剛下班，“大白脖”的走狗，吃洋飯的刘三，帶着一批在电車厂修道砸石头的临时工进厂来了。二话不說，立刻



吹胡子瞪眼睛宣布：“鍋爐房的工人，不論圓牌方牌一律开除！”

誰也沒料到竟有这么一招！下了工，連洗个澡、換个衣服都不許，仗着那边人多，竟推推搡搡的，全給撵出廠去。气得大伙登时起誓：“你把我们开除！好吧，看你大鼻子藍眼珠子怎么燒鍋爐發電。”

这时，“大白脖”呆在他那洋楼里，还很得意哩。心里的話，讓你們要双月的，讓你們带头鬧事的，我統通把你們的飯碗砸了。看你們怎么办！

怎么办，“大白脖”的算盤打得滿如意，只是差了一筹。万万料想不到，这批临时工，沒燒过鍋爐，瞎抓撓一陣，鍋爐燒的不跟劲，影响發電，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大白脖”这下子蔫了！可是，这口气还得愾下去。

愾了兩天，“大白脖”愾不过去了。于是又叫刘三出头，把彭头找到办公室来。

一进屋，姓刘的先来了一臉嘻嘻哈哈，又讓坐又斟茶的。

彭头沒坐，也不喝茶，粗声粗气地問他：“找我来，干嘛吧，有話就說，咱們別来这一套。”

“前天的事是誤会。”走狗乐呵呵地說，“要开除那帮皇杂子，就不能不連你也捎上，要不，他們非把你揍了不結。你說是吧，东家有話，你是事出无奈，这事不賴你，你沒錯，叫你回来，領着这伙新人，咳，都他媽的‘力巴头’，接着燒鍋爐。你今天就上工吧。……”

彭头早料到这一层了，他们出去固然没饭路，洋鬼子离开这批熟练工人也会玩不转。他就盯问一声：“那我们这帮兄弟呢？”

“咳，有眼不识高低，跟外国人顶。管他们呢，死就死，活就活！”刘三哈哈地笑了两笑。

没等他笑完，彭头指着他的鼻子骂起来：“你这是想买我呀！想让我爬门子，鑽狗洞呀！嘿嘿，你瞎了眼。我们穷哥儿们有义气，要回来都回来，要走都走！”

合着是瞪着眼睛撞在墙上了。刘三吃了一顿抢白，冷笑一声：“胳膊拧不过大腿呀。你可别后悔！”

“中国人里头也有你这一号的。呸！”彭头一扭头，把门踹开，扬着脖子走了。

收买彭头没有成功，洋鬼子不死心，又去收买别人。但是工人弟兄义气为重，这一撮锅灶工人各奔前程，坚持到底，没有一个单独回头的。

工人们时常叨念彭头。他家就住在电厂的厂外边，以后就在门口摆了个小香烟摊儿，卖点儿蹦豆萝卜糊口。但他一生都不输这口气，一直和电厂鬼子斗。以后，凡是电厂工人为了解恨，或为了糊口，偷出了厂里的东西就放在他这里，他这儿成了转运站。老彭头总是拍拍胸脯，给哥儿们收藏着。

第二次罢工

比国佬统治工人有一套办法。在电厂里他们安着一种电表，大鼻子坐在办公室里，只要看看电表就知道推煤推灰工人干活的情况了，車一不动，电表便有标记，他们就出来检查。另一个办法，就是花钱雇流浪的老白俄来做监工，用鞭子抽打工人。

凭鞭子能治服工人么？那是白搭。他的鞭子越是晃来晃去的，工人們的活儿越是干得少。只要他一轉身，一出車間，大伙就聊的聊，睡的睡，誰也不干活了。这情况，車厂要比电厂还厉害，因为电厂的鍋爐不饒人，到时候它得张嘴要吃黑煤。車厂是修电車，是快是慢那內里的深沉可就大了。

光做活不出活，这是怎么一回事？老白俄讓比国佬問的一楞。他一研究，發現廁所有問題。其实廁所离車間远，来回走一趟得好几分鐘，再加上廁所容量小，老是显着人們滿滿堂堂的。綠眼珠儿一斜，他認為毛病在这儿。于是立下一个“解手公签”。誰要是上廁所誰就得拿签，沒签

就是鬧痢疾瀉肚也不准去。去的时间长了也不行，居然还要扣工資。理由是：大小便影响干活就必须扣一部份錢，以免比国資本家受了大小便的时间損失。这招儿真算是使絕了。誰不是又气又恨啊。

1929年，車厂的修配車間来了兩位师付，这二位年轻人是北京電車公司派来学习电焊技术的。来了一看，兩人眉头子一皺多高。就說：“兄弟們，你們这样还行啊！連大小便都受轄治啊！是条牲口也得讓它隨便拉呀，尿呀的。”

“受不了，怎么办呢，洋鬼子开的买卖！”

“你們組織工会，大伙一抱团，跟他洋鬼子斗斗，他們就不敢这样欺侮咱們了。”接着他倆把北京電車公司如何組織工会，如何和外国資本家斗争的事儿，細說了一番。

大伙一听，劲头来了。誰不願意組織工会呢。于是工会会长工会短的，有一股風在人們之間傳开了。

紙里包不住火。不消几天，自有耳报神把这消息通过把头傳到比国佬的耳朵里了。好像工会这两个字儿是炸弹，吓得鬼子当天就把这两位派来学习的师付給撵走了。

还是那句話，紙里包不住火。工人們立刻也知道比国佬怕成立工会了；也知道那兩位师付被撵走的事儿了。大伙是火上加油，要成立工会的心情更迫切了。而且要联合电厂工人一起罢工。

正这节骨眼上，忽然像吹气泡似的，冒出一个叫刘治

倫的來，他帶頭兒喊着要成立工會，私下里到處拉攏人。大伙都願意搞工會，可是誰心眼里也有個小九九，怕招風惹禍，不敢冒然出頭。劉治倫既然帶頭，自然大伙全都贊成。這時橫插一杠子，又跑出個叫陳澤林的。這人腰板上好像支着一根頂門棍，別人不敢說的話他敢說，別人不敢招呼的事他敢招呼，成天價也是把搞工會的事兒掛在嘴皮子上。大伙一看，行啊，誰敢出頭算誰的，也支持他。沒多久，工會成立了，理事會中推出他倆來負責。其實呀，他們這兩家夥是老虎帶數珠，假充善人來了。各有各的背景。劉治倫是嘎雜子，是比國人相中的一塊壞料，特地打發他出來搞工會的。原來，比國佬看出工會非搞不可了，他們便想，如其被動的等着工會讓別人抓去，何如搶先下手，搞個御用工會，守在自己腳邊，一鼻孔出氣呢，翻手云來復手雨，那多便當。陳澤林倒是工人出身，可他這人一腦門子升官發財思想，加入了國民黨。國民黨正大抓黃色工會，這個時期，天津各個工廠，無分大小，不論中西，都支起工會攤子來了。“比商電燈電車公司”油水很大，自然也是這批黨棍子極想撈摸一把的地方，陳澤林正是他們派來的尖兵。就這樣，兩派人物都擠到一個黃色工會里來了。究竟工會抓到誰手里呢，兩邊勢均力敵，於是搞了三個平行最高的常務理事。另一個落在老工人王桂芳頭上。

在洋鬼子眼里，國民黨是替他們辦事的一群狗，那里放在眼里。嫌陳澤林插這一手兒礙事，於是毫不客氣的下了手，頭一天陳澤林當選，第二天他提着小飯盒，興高采

烈地，一边哼着小调，一边摇摇晃晃地来到工厂。刚一迈门坎，就让门房的人把他拦住了。说道：“外国人把你开除了！”

“啊。”陈泽林先是一楞，没想到洋大人这么没面子。接着便冷笑了两声，他怕什么，反正有地方找饭路去。就说：“没关系，我不上班不要紧，也得让我把那身破油包拿出来呀。”

“这我做不了主。”传达室的人连忙跑到办公室告诉了总办。总办生怕陈泽林在厂子里煽风点火，摆下两个无形的炸弹，便派了两个走狗跟他一块儿去拿衣服。他进厂原想发作一通，可又不敢，只好挟着自己的油包，出厂去了。出厂以后，洋人管不着了，他的胆子也就大了。当天晚上，厂里的工人接到他写来的一封公开信，希望大家无论如何也要跟外国佬干下去！

工人们听说陈泽林为工会的事被开除，已经是火苗儿一着多高，再看到他写来的号召大家斗争的信，大伙都急眼了。有人就说：“不能这样看他被开除，要活一起活，要走一起走！”又有人出主意，马上找陈泽林，一来是安慰他，二来是取得联系，接着在外边干。

一看大伙的劲头这么足。刘治伦也披上一层人皮，杂在人群里头卖乖装蒜，竟说：“走，咱们找陈泽林去，咱们干到底呀！”积郁已久的工人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开来。罢工的局势已经势在必行了。

这天晚間，国民党市党部的会客室里灯光大亮，当时天津国民党的两个头目人孙墨池和莫子鎮正坐在沙發上，叨着烟卷，唧唧喳喳地商量着什么呢。門“呀”的一声推开，国民党市总工会主席席兴泉夹着大皮包也走进来。他一进门便喊：

“工人的火点起来了，要鬧呀！”

“比国人买賬不买賬呢。”那兩人緊着問。

“大鼻子眼睛朝天，还是不理这个碴儿。”

“好呀，讓他們也知道知道咱們国民党的厉害。非給他們点顏色看不可。”

“我的意見得大搞。”

“对，得大搞呀。”随后，这三个人小声儿叨咕起来，他們像是做什么投机倒把的买卖，那么机密，那么謹严。

第二天，由黄色的总工会出头，召集車厂、电厂的工人开了一个全体职工大会。

孙墨池把昨天穿的考究衣服收拾起来，换上一件灰布大褂，站在一张小方凳上，朝大家喊着：“劳工兄弟們，你們辛苦了！”

工人們围了个里三層，外三層，兩只眼睛漂着这位嘴里甜不罗素，但神气派头总有些看着别扭的人物，一时摸不清是那一类字号的。孙墨池不是单槍匹马来的，早有他的下屬暗暗扇風，替他吹嘘了一番。說：“这是孙墨池呀，孙中山先生的侄子，市党部的負責人，专替工人办事

的。”工人們一听，来头不小，小会变大会，也就不再唧唧喳喳的了，聚精会神地听他說下去。

“弟兄們，劳工弟兄們！我們古老的，历史悠久的中国不幸得很，很不幸哪。”孙墨池可着嗓門一喊，还把胳膊一揮，这才又說下去。“由于滿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事富国强兵之道，以至招来八国联軍的騷乱，使我們中国主权飽受摧殘。他們外国人在我們土地上办起来工厂，賺我們中国人的錢。而我們中国人，这富饒土地上的主人，却給他們当牛馬，受苦累，終日不得温飽。过去我們屈服，由于政府无能，現在革命已經成功，北伐已經胜利，我們不能再忍气吞声了。我們要反抗，要爭取我們的自由，爭取我們的福利。弟兄們，起来吧！讓我們向外国資本家宣战，提出我們的要求来。不答应我們的要求，我們就罢工。劳工弟兄們，我們不管資本家怎么样，努力斗争吧！為我們中国人的自尊、权利、荣誉斗争吧！兄弟我代表市工会，以万分的同情支持你們。你們斗争到底吧！你們为中国人争光吧！”

大伙一听，甭管他那南腔北調的口音怎么难懂，总还是好听的話，打气的話。那有白費唾沫的，于是大伙給鼓了一陣巴掌。

不过，吹完这通話，会也就散了。下面并无具体行动計劃。大伙是怎么来的还怎么回去。回去干什么，还是照样儿給洋鬼子干活。大伙这个嘟囔啊，有人說：“这是为嘛許的呢，大老远跑一趟，光听他嚷嚷一陣！回头燒鍋爐

的还是燒鍋爐，開電車的還是開電車呀！”那時候，國民黨在天津出頭露面還不久，打着“革命”的幌子，一時人們還摸不清是怎麼一回事，所以也沒往坏处想。其實呀，孫墨池這通講話，那兒是給大伙講的，那是給比國人講的。話里話外就是這麼一個意思，你們要是再不理我們黨部的碴兒，你們可估量着，吃不了讓你們兜着走！

偏偏，這些洋鬼子傲氣沖天，自踏上中國國土，要怎麼的就怎麼的，還沒碰上這樣的事呢。一群國民黨黨棍子就放在他們眼睛裏了，不慌不忙，給來了個相應不理。

過了幾天，由黨部給出主意，由工會出面向公司的資本家寫了一封公函。告訴他們，如果你們不做答復，我們可就要罷工了。洋鬼子看了這封信，這真是強盜遇上劫路的了，誰不明白誰呀？於是由公司業務處的經理林三——林子香給復了一封信。回信的大意竟這麼說：中國人罷工不罷工對他們沒關係。你們要是不怕挨餓，你們就來！口氣好硬。

工會接到這封回信，正好用來向工人點火，於是又在車廠電廠召集大會，對大伙講：“洋鬼子說啦，說咱們要是不怕餓呀，就罷工。罷上一月、兩月、半年、一年，他們也不在乎，咱們可得餓死。比國佬是豁出去了，咱們有決心罷沒有？”

大伙一聽這話，亂喊成一團。這個說：“这回非讓比國鬼子看看不結，別讓他小瞧中國工人！”那個講：“他們讓咱們罷一年。好呀，咱們按兩年給他招呼。”

当下工会跟大家商量，提了十項要求。这十項要求是：

- 一、陈澤林必須复工；
- 二、建立工人子弟学校；
- 三、年終發双月；
- 四、不准无故开除工人；
- 五、职工伤亡給埋葬費一百元；
- 六、不准外国人查票；取消白俄監工；
- 七、所有員工一律給按电表用电；
- 八、發給工人工作服；
- 九、撤銷洋翻譯馬本宣等三人的职务；
- 十、实行三八制，每天八小时工作。

大家就这样給資本家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答应，立即开始罢工。

可是怎么样，洋鬼子这回連信也不复了。他們要跟工人較較劲，他們以为他們一定得把中国工人餓趴下。

1929年6月11日到了。这天天津的街面上十分熱鬧，因为正是初夏，过端午节的日子，真是車如流水馬如龙，人們熙熙攘攘，电車站头上淨是等着上車的人。突然由油漆工人于世清率領着一队工人，在围城的东西南北四条馬路上一站，一条路上五个人，都是些膀大腰粗的工人，他們朝电車喊喝着：“十一点啦。停車啦，咱們罢工啦。”

立刻街口上的电車都停了。

電車上有查車的稽查，他們錢拿的多，跟工头是一撥，一看大伙不干了。他先嘖嘖开了：“你們为什么不開車？”

于世清是車厂里的油漆工人，整天油油刷刷，那摸的着說話呀，現在他不管这些了，掄起手里的大木棒，劈头盖臉便打：“你敢破坏罢工！”工人起来了，那陣势可不一样，吓得稽查夹着尾巴溜走。

警察过来了：“喂喂，快開車，不許破坏交通。”

“我們罢工了。跟洋鬼子干！”

“不行，我們不許罢工。”

可是，警察白嘖嘖，各路电閘都已关闭，車輛要开也开不了。

“不行，不行。你們把电閘拉开。”

“市长来了，我們也不拉。”

正这儿争执不下呢，一輛汽車馳来。吱的一声停在他們身边。車門推开，两个穿中山裝的人，先后鑽出車厢。一个是孙墨池，一个是莫子鎖。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多咱有过这样的事。孙墨池拉长臉子罵了警察一通，还說：“我讓停的。”随后又換一付笑臉給工人們看。

錢挨了罵，警察还倒堆着笑臉，連声：“是，是！”

接着騎自行車的警队开出来了。沿路曉諭崗警要保护罢工工人，不許發生冲突。

当真他們真心支持工人罢工斗争么？把戏当天就露着馬脚吧。行駛在“租界地”里的電車，因为帝国主义派兵

把住界口，强迫工人开电车，所以当天没有停下来。孙墨池和莫子镇却假装没看见，不敢撑腰了。还是工人们心齐，悄悄溜了号，第二天便也全停了。

当天罢工以后。电车工人集中到车厂子开大会。陈泽林按国民党市党部的授意，领着大队浩浩荡荡奔电厂来了。

电厂工人早就准备好了。只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发电照常，其余的人们手里拿着棒子，两支队伍合成一股，直奔河东总公司而来。公司里的工人也早做了准备，到时给开了大门。工人们涌了进去，把那一座考究的大楼围了个密密扎扎。有的人们便在陈泽林带领之下冲进办公室里来。

比国佬半躺在沙发上，强做镇静，瞧那股子稳重劲儿，亚赛楼里楼外没来一个人似的。他那把中国工人看在眼里。

工人们喊了一声，一嗓子就把这位高贵的总管吓得立起来。他端了端肩膀。

“喂，我们提的十项条件为什么不答复？”“限你廿四小时答复！”

人多声音重。比国佬吃不住劲了，连忙摆手说：“伙计们，不是我不答复，是我无权答复。我要请示本国政府。……”

明摆着这是胡弄人的事。工人逼到这儿，原可以再攻下去。洋鬼子的那股子傲气已经吓得没影儿了。可惜领头的是陈泽林，这小子是国民党员，唱双簧，去小跑的，他生

怕把洋鬼子吓着，真要挤出点事来，他吃不了兜着走。赶忙见好就收，楞把大伙喊出来了。说是等几天，看他们怎样答复。倒替洋鬼子解了围；

工人们前脚走了。后脚，比国佬就把买办林三、林子香叫进办公室来，一肚子邪火全泄在他身上，“你那里去了！工人们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

林三笑笑，这小子一肚子的坏水，立刻给他洋主子献上一条毒计，说是国民党这样搞，纯粹是利用工人炸咱们的肉酱，咱们也可以利用工人炸他们一下。把工人煽起来，工人什么事干不起来，说着，便如此这般地朝总办直咬耳朵。比国佬听了，呵呵地笑了起来。

原来这家伙使了一计。这天夜晚，派出一批狗腿子乘天黑摸进转电处，打算破坏输电线路，这样一来，半个天津都得漆黑一片，事情闹大，洋鬼子他们可以倒咬一口，说是工人罢工破坏供电，扣住这个帽子就好办事了。国民党也就不敢再利用工人了。

不料想，工人们的纠察大队真有本事。狗腿子摸进去的时候，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并无动静。等到下手破坏的那一刹那，好嘛，纠察队员突然从暗处闪了出来。关了个捉贼带脏，当场抓住一个。偷鸡不着失把米，林三的鬼计露了馅。

按说，比国佬唆使走狗破坏转电处，是一桩了不得的扰乱治安，破坏社会秩序的大罪，应该严加处理。结果你猜怎么着？洋鬼子还是躺在他的沙发上，连问一声也没有。

人問，倒是警察局調來大批警察，把工人們看住。說是防止破壞活動。瞧瞧國民黨黨棍子這一套花招兒吧，他們是又要利用工人，又怕工人起來。工人這麼齊心，糾察隊又這麼有本事，雖然工人手無寸鐵，拿的只是木棒，但是他們却不得不防范一二了。工人真要起來，那還了得！他們有些嘀咕。

更使他們犯嘀咕的是：工人的罷工堅持下來，從兄弟工廠，從各個角落得到了支援和同情。工人階級團結的力量當時是很強大的。最先到電廠來慰問的是鐵路職工代表，他和罷工的哥兒們說：“咱們工人不怕餓肚子，你們別愁錢不錢的，我們鐵路工人堅決支持你們。一張火車票增加幾分錢就夠大家生活用的了。你們鬥爭到底吧，有我們支持你們！”就這幾句話，給了工人多大的力量！但這只是開頭，接着，裕大紗廠，裕源紗廠，電話局……都派來了代表，表示支持和援助。他們不光帶鼓勵和友情來，還用車拉來饅頭、汽水、饅頭，許多吃食。真是“千里送鵝毛，禮輕人意重”。有些工人吃着饅頭，激動得淚水嘩嘩地向下滾。不光是送吃食來，有些工廠還派了慰問團、話劇團，給罷工的弟兄們演出，那真是熱火朝天，把大家的心連成一片。接着，不光本市的工人伸出來援助的手，上海、漢口各地的工人也都拍來了電報支援車廠電廠的罷工運動！工人的力量很大呀！大伙的決心可大了！看到這種光景，一些黨棍子更是暗吃一驚，絕大多數工會都是他們掌握着的，怎麼會搞的這麼熱火朝天呀？怎麼這麼熱情

呀？这里面是不是有共产党在操縱呀？他們心里打鼓，赶紧派人深入下来調查。这一調查不吃紧，可把他們吓傻了！

原来在罢工的第三天，共产党地下順直省委^①于6月13日發出一个“援助天津电車工人罢工事”的紧急通知。这个通知分析了这次罢工是工人們反帝意志高漲，不甘受洋人气，同时要求改善生活，反抗工資少、工作重的一項革命活动。党要積極支持，援助这次罢工运动，并要引起各界民众的重視，引导成为全民的合法的收回电灯电車运动。党还为这次运动制訂了14条口号。口号是：

- 17、增加工資！
- 27、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 37、不論长短工一律要花紅！
- 47、不論长短工疾病时一律照發工資！
- 57、各种紀念日放假，有工作者要双資！
- 67、恢复被开除工人工作！
- 77、罢工期内照給工資！
- 87、坚持罢工胜利到底！
- 97、坚持无条件收回电車电灯公司！
- 107、沒收帝国主义在华产业！
- 117、收回租界！
- 127、撤退帝国主义在华駐軍！

① 当时党的河北省委叫順直省委。

137:驅逐一切帝国主义滾出中国去!

147: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国民政府!

另外，还具体的指出紧急动员以下兩項工作：一是組織电車电灯公司工人罢工后援会等团体，向各界展开宣傳和捐募援助；二是推动当地工人进行斗争。

这就难怪为什么各界响应，那么多工会都来支援，而且搞得这样热火朝天了。国民党市党部几个头目人，吓得都低下头去。原是想趁火打劫，把持工人斗争，捞票油水，沒想到共产党把工人斗争运动向广度深度的方面推进了一步！这就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全慌神儿了。

党棍子慌神儿，比国佬也慌神儿了。風潮越鬧越大，工人们一揣手不吃紧，他們这才明白，懂得，尝到这股味儿。这那儿是餓死中国工人，干脆是跟自己的腰包过不去呀，是自己給自己堵了进錢的道儿。事情是非破鈔不能解决了。洋鬼子的眼睛不再朝天了。由林子香出头和当地党政軍三路大头談条件。要求把風潮压住。

談判的結果是，原来想多要的不敢再滿天要价了，怕共产党把工人斗争运动再發展开来；原来想少花几个小錢就把这群党棍子打發走的，也忍痛多掏了几个。双方的买卖一拍即合。共訂了四大条款。第一条是比国佬出六十万元名曰軍事捐款，捐給当时正在进行南北大战的北方軍閥閻錫山和馮玉祥。其实这錢拿到手后，由他們按势力和官职大小分派了，多的一千，少的五百、三百不等，搶分一光。第二条款是国民党要派宪兵、巡警看門，压迫工人，

这条是錢沒到手已經照办了。第三条款是公司紅利，每年要抽十分之一給天津市府。实际上就是从此开例，要对中国党政要人、一些地头蛇进行饋送。第四条款是国民党政府要帮助公司清查电表，催收电费。从这四条看来，比国佬虽是拉下点肉来，但有政府帮助清查电表，确实好处也不小哩。

罢工的第十四天上，6月24日的早晨，黄色工会大头目席兴泉便召集車厂电厂上午上班的职工一齐开会。他一上来，双手一张，大声嚷道：

“弟兄們，我祝賀你們，我向你們道喜。我告訴你們一个好消息。通过我們国民党党部的支持，我們总工会的援助，兄弟我个人的热情，你們提的条件，比国資本家已經答复了，你們今天可以复工了。”

說到这里，陈澤林站出来了，他得把这出戏帮着唱下来，破开銅鑼噪子，一陣儿吆喝：“弟兄們，我們胜利了，比国佬被我們打败了呀！大家鼓掌呀！”

一陣鼓掌过后，有的工人就問是怎么答复的，那条同意，那条不同意，七言八語的問題还真不少。工人們不相信磁公鷄拔毛，比国佬竟有这么痛快的。

席兴泉挂火儿了，問題并不答复，只是这么說：“你們已經胜利了。胜利了还要怎么的，我告訴你們，你們明天都要复工，假若你們不复工，保安队可要拿槍打你們。你們不复工，誰要出头誰就是共产党！你們誰出头呀，誰是共产党呀？”这小子把嗓音拉长，兩只賊眼乱扫。

大伙听了一怔，誰也不敢再問了。这儿有頂紅帽子等着往下扣呢！这时候，陈澤林又出来了：“我們的条件全答应了。我就复工啦。我又回来啦！”

紅嘴白牙，既是說的这么板上釘釘，那还假的了么，大伙也就半信半疑，罢工就此結束。

工人們也許想算完啦，但是比国佬却不肯罢休！心里是一鍋开水，乱滾一陣，那里肯服。別出毒招来和工人們干。

头一天一复工就出了事！工人們上班来了，好哇，那些破坏工人罢工运动，替洋鬼子当打手，当小跑的工賊，原来被工人群众打走了的四十来号人，也来复工了。工人一看，真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怎么着，白白罢了这么十三天工，到头来还讓你們这些工賊監視着我們哪。大伙不由分說，上去就把这些工賊們揪住。比国佬蘆法出来了，他替这些工賊說話：“他們是好工人，他們要复工！”

工人們的滿腹怒火正沒处出呢，一声喊喝，拳脚齐上，看你藍眼珠大鼻子又怎么样，按住蘆法一頓好揍。这一揍不要紧，蘆法的腿被打折了。陈澤林一看惹了事，就喊大伙：“讓一讓吧！”大伙心里有数，把洋鬼子的大腿打折，事情不小，也就一个个溜之乎也了。蘆法被送进医院去了，但究竟是誰打的他，連他也找不着号。

乘这乱劲，工賊們复工了。陈澤林一看，这不是事，他們这些工賊非和工人做对不可。連忙跑到市党部問怎么

办。市党部的党棍子們連他也不理睬了，冷着个臉蛋子說：“不准罢工反对資本家。你們要打官司办交涉有法院。一定要合法。”就这合法兩字把工人的斗争又給压下了！

比国佬的算盤打的紧。这不是受了些損失，又掏了几十万元的腰包么，有道是羊身上丢的羊身上找。于是鬼子紧跟着便搞了个电車加价計劃。原来的車費是三个小銅子，如今打算翻个儿，一律收三大枚，要加倍的价錢。

为賺大利，少不得也得先花几个打發的小錢，比商往国民党的市政府和市党部都下了注。可是，他們誰搶着是誰的，那些撈不上的，未免饑涎欲滴，好哇，罢工撈一笔，加价又撈一笔。不打点够了还行。于是有人就支使一些抽白面的，扎嗎啡的游民在电車上演說，搗乱，那些辞儿都很漂亮，什么“帝国主义剝削我們！”什么“为了大众的利益反对加价呀！”这一来不吃紧，国民党內部的头目人展开了狗咬狗的内爭。爭来爭去，發展到这么一天，全市工会召集工人在中山路的河北公园开大会，當場打手和工人群毆，借这机会，这个系派把那个系派頂走了。

在开大会当中，車厂电厂工人不知底細，有几个人受了伤，还有一些人把衣服撕了扯了。真是乱攪一鍋粥，工人們直喊丧气！那曉得大伙却又受了国民党和比国佬的一次利用，从此加价的事儿就順利实现了。比国佬的錢刮得更多了。

錢多了，得喂一喂手下的狗呀，再說，公司答应了那么多的条件，总得晃晃大伙眼神，实现一条呀！于是比国佬批给了工会七千元现洋，說是为了酬謝大家的。可这錢發出来，不貼布告，不提用項，暗含着由林子香轉到刘治倫手里。他們把錢吞吃了个一光二淨。却讓手下人跑到工人里吹風儿，說：“錢是發下来啦，大伙可沒見呀！都在誰手里哪？”“在誰手里，当然在工会主席陈澤林手里。”“噢，他把錢弄哪儿去啦？”“你們还不知道，这小子拿这笔洋錢胡吃海花，在皇宫影院包了个女招待呀！”这股風吹来吹去，吹到陈澤林的耳朵里了。他正为这笔錢急得坐不是臥不是呢。怎么，現在錢發下来了，他一个沒撈上，倒落的背上这么个黑鍋！气得他去問比国佬，比国佬就向外推，气得他去問刘治倫，刘治倫說話油油滑滑不沾边儿。陈澤林冒火儿了，找国民党市党部的头目人去了，到了那儿，又是一鼻子灰。真是兜头一桶冷水，到这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是多么可憐的人，是一个被愚弄的角色。有口难分辨，大伙原来就对他不满意，答应的复工条件怎么一条都不实行呢，再加上这些風言風語鬧的，誰也不用正眼瞧他，鬧了个威信扫地，里外不是人。連急帶气，陈澤林便得了一场夹气伤寒，倒在炕上，沒过多久，便嗚呼哀哉了。比国佬这一着又胜利了，到底把一棵眼中釘拔掉。折腾半天，总算工会是理想中的御用工会了。哈哈，連国民党的狗他們也不容啊。

第三次罢工

比国佬和买办林三自以为鬼計得逞，連国民党的一条小尾巴都給排挤得一命哀哉了；天下还不是他們洋人的！工会由刘治倫把持，更是从此太平无事。所以比国佬对待工人的威風就抖得更足。什么条件，楞来了个推翻不算，沒有一条实行的！

工人服这一套嗎？当然不服。誰也是窩着一肚子火气，唧唧嚶嚶，等时机爆發。后来事情發生在这个出缺的常务理事职位的問題上了。工人們坚持要补上一个新的来，資本家不同意。拉了很长时期的鋸，才由一个叫张广兴的补上来。张广兴是个俊俏的小伙子，那年才24岁，是公司的一个抄表員。原来文化水平也很低，滄县人，在乡下念过几年小学，后来便通过一位本家叔叔托情到“比商电灯电車公司”来了。这个年輕人很有雄心大志，白天抄表，晚上还到法汉中学夜校去学习，很懂得用功。而且他为人刻苦朴实，不吃喝玩乐，有点儿富裕錢便去买一点杂志新書看。懂得思索一些什么事情。如今老工人們回忆起他来，还

說：“人家張廣興是好樣的，能說能道，又是赤胆俠骨，好交朋友，好聯繫群眾。”自然，像他這樣人物要被大家推選上台了。

他所以能夠代替陳澤林，自然還另有原因。因為他也是國民黨員。經常把這個身份掛在他的嘴皮子上。他上台以後，常務理事是三頭為大，沒有一個總幹事了。什麼事全得三個常務理事聯銜蓋圖章。所以開初先拖了個時期，稱得起是相安無事。

但是，比國佬却心狠手辣，毒計一招跟着一招來，打算把所有的老工人，特別是參加過1929年罷工的那些工人，都抓碴開革。另外一着便是只出人不出錢，要職工越來越少。比國佬是懂得人多浪大這條道理的，兩個廠子合在一起一千來人，委實是受不了呀。活忙的時候，比國佬就找工頭外包，這樣一來，他就不怕什麼罷工的威脅了，因為干活的人和公司沒有什麼僱傭關係。但這樣還不算，還要停止增薪（按公司舊例每年增薪一次，一次可增幾分錢），還要取消已有的福利。比國佬的面孔越來越冷，特別是九一八事變以後，更是把中國工人當做亡國奴看。

工人吃這一套么，不行，干柴烈火，越着越高，最後在1932年10月14日，召開了“比商電燈電車公司工會”代表大會。出席代表212人，張廣興被推選做大會主席，當場向比國資本家提出十項條件。條件的內容是：

- 一、設立工人子弟學校，月增教育費200元；
- 二、給職工免費乘電車，免費用電的待遇；

三、年終發花紅；

四、工人在工作时一律發給官衣；

五、工友有死亡者發給葬埋費200元；

六、每个工人由公司代买兩袋牌价面；

七、职工工龄达22年的加發一年工薪做为养老金；

八、在定額以內節約用煤，發給职工煤賞；

九、病假不扣工資；

十、給工人解决宿舍住房；

比国佬接到工会的意見書，恨得直啄牙花子。心里罵道：“你們这群臭工人忘記自己是老几了，你們要上天哪！”如出一轍，洋鬼子表面不露声色，摆出洋大人高高在上的嘴臉，又来了个不答不理！

就跟上一次罢工一样，国民党市党部聞着腥味，党棍子們又来伸手了。只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地面上换了一撥子新的地头蛇而已。如今已非南北大战那时局面，正是奉系坐天下的时代，市长是周荣光，市党部里有邵华和时子周，省委里面有张厉生、严智怡，这些錢串子們早就耳聞上次罢工，如何炸醬的事儿了。这回是机会湊手，如何肯輕輕放过？于是假惺惺地代工人們办起交涉来了。

比国佬跟买办林三一合計，这笔款子有上回的数目摆着，能多不能少呀。这錢挖的未免心痛。洋鬼子这回鬼头多了，愜气挡不住多花錢；这是何苦来？便由林三出头，悄悄把张广兴約来。在他办公室里密談一番。

林子香和张广兴一碰面，这小子先笑唧唧的朝他一竖

大拇哥，說道：“廣興，你真是好樣的，我真佩服你，這手兒搞的多漂亮啊。”

張廣興已經料出幾分來了。他也会不動聲色，只是說：“到底什麼時候答复工人呢？老這麼拖下去要出事哩！”

“咳，出事不出事，都在老弟你啦。”林三說到這兒，干笑兩聲，隨後又講：“咱們有錢花在自己人身上。這事只要你不管，抽手一走，兄弟，你發洋財了，這個數！”林三把話打住，朝他眼前伸出兩個大手指來。

張廣興看也沒看，不做聲兒。

“好吧，咱們剃頭圖涼快，我給你再添個數！”林三又伸了一個手指出來。

張廣興這人可有計謀，還是不聲不響。

林三千咳了兩聲，又笑了兩笑，點點頭。“好哇，你年輕輕的真辣啊。行，我佩服你，我成全你。這樣吧，再加個碼兒，四萬塊。”林三把四個手指直晃到他鼻子跟前，嚷起來：“廣興，見好就收。可以啦，太可以啦。你算算吧，你一個月才拿三十幾塊錢，你一年才拿三百多塊錢，十年才拿三千來塊錢，你就是活一百年也拿不到這四萬塊錢。你算算吧，拿回去置房子買地做買賣，干什么不夠啊？”

逼到這兒。張廣興忍無可忍，這才頂了他一句：“我謝謝你的好意，你給我算的挺好，錢也給的不在少數。拿這錢發財做買賣嘛，那自然是够折騰一氣的了。可惜我不

想發財，不做買賣，我是替工人大伙辦事，我是人，不是狗！”

這一嚷不吃緊，把個林三嚷的臉上紅一陣，白一陣，萬沒想到鼻子碰在城牆上了！他把笑臉收住，冷笑兩聲，說道：“你可別不識好歹，我要買你的命，花不了幾個錢！”

張廣興也不含糊，說道：“你也別不識好歹，工人們干起來，够你瞧的。你不是有錢能買人么？好，你就拿錢花去吧！”說完，他扭頭走了出來。

不敢怠慢，張廣興連忙跑到國民黨市黨部來。把這情況和頭目人一說。把這几頭饑狼餓狗都氣壞了。他們咬牙切齒地說道：“好哇，好哇，比國佬也太錢狠了。這倆錢說什么也不放啊。拿四萬塊錢就想把事情壓下去呀，沒那么便宜的事！廣興同志你做的太對了。”

廣興便也裝做“同志”的樣兒，乘機獻策：“我們得大搞，得支持工人們罷工啊！”

“罷工？”几个頭目人有點害怕。半晌才有誰喃喃地說了一句：“万一要是讓共產黨利用上，點起火來呢？”

“不會，不會！有我，有我哪！”張廣興一拍胸脯。

這几个頭目人一想，廣興是國民黨黨員，他能掌握住，便不會出大漏子，還是炸比國佬的肉醬，發洋財的事兒要緊。就說：“罷工事情太大，得問一下市長啊。”

那時候，國民黨黨部和國民黨市政府總是碟兒碗兒的碰得叮當亂响。要步驟一致，還得協商，就由張廣興以工

会代表的身份跑去见市长周荣光。这位周市长上得台来；两袖正嫌风清，急着要大把抓钱呢。听张广兴来请求支持他们电厂车厂工人罢工的事儿，正中下怀，这不是肥猪拱门么？这不是给他市长送大洋钱来了么，登时眉开眼笑，反倒给张广兴打气。说道：“比国资本家这样压迫我们工人，这是帝国主义侵略，工人要求罢工是正当的，政府一定支持，兄弟我嘛也一定帮忙。哈哈……”这一关也打通了。

这天，九月十二日，天刚蒙蒙亮。深秋的早晨格外清凉，一群群工人往电车厂子走来。这里由工会临时召集了一个大会。

人们黑鸦鸦的围了一片。从人群中直立起来，张广兴举起喇叭筒朝大家喊道：

“弟兄们！公司资本家拖了又拖，结果是十项条件，一项也不接受。好吧，我们给他一个厉害看看。从今天起，我们罢工了。但咱们罢工不能影响社会秩序，咱们电车还是照样开，只有一样，随便坐车不要钱。让咱们中国老百姓也沾点光。他们帝国主义赚咱们中国洋钱赚的太多了，也让他们吐点儿出来吧！”

黑鸦鸦的人群里爆起一片笑声。这个办法太好了，大家都拥护，一来不误大家坐车办事，二来比国资本家还得往外贴本，比不干活还让洋人难受，这简直是在拉他们的肉呀！

张广兴又一挥手，喊道：“咱们电厂的哥儿们也照常烧锅炉送电，可就是查电表的不查表，收电费的不收电费，让中国人白用电灯吧！”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笑声中，人群蠕动了，罢工开始了！

这一着可厉害！电车还像往常一样，车轮子格格格格地在铁轨上滚着，可是白花花的大洋钱却随着声音扔掉了。电灯还照样儿净光冒亮，可是那些电费却一个也不见！比国佬一下子急傻眼了。

但是，他们还不肯和工人讲条件。这口气那能输啊，于是又由林三布下他的党羽，打算和工人们斗一斗。他们有句话：“我们洋人的买卖，不能受拿捏。”

如今不比先前，林三的手下人也多多了。又约来了两名专门破坏工人运动，对付工人的大流氓、大走狗钱伯骥和王彩南。这些人的手法又毒又辣，比刘治伦这一群嘎杂子的本领自是高出一筹。不来硬碰，却来个软泡，他们想撒下迷魂阵，专一的勾引那些不坚定的分子掉入陷阱中去。他们在“日租界”鸿义棧租了间房，大烟白面足这么一供应，另外是酒肉，金钱，女人明摆在那里，把一些他们认为可以腐化、拉下水来的工人叫到这儿来，然后问：“跟我们，你看见了没有，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人一辈子倒是图个么呀？”

不顶用，工人们臭卷他们一通，一个个火气都不小。这一着没有使上。不光这一着没使上，相反的倒听说张广

兴他們另外搞了个秘密办公地点。这地点在那儿，他們不知道：

比国佬一看，想用分化工人的手段，内部自行解决是办不到了。得認头花錢。于是由比国佬出面，在××飯店摆了一桌洋餐。虽說是洋餐，但也上了很多精致的中菜，要吃什么有什么。因为是請市长吃飯，怕不对这位周荣光的胃口。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比国佬这回自动开了腔。說道：“我們公司工人又鬧風潮了，这事还得請市长維持、制止。”

周荣光假裝不明白的：“哦！怎么他們鬧事了，不是电車还照样开着嗎，电灯也很亮嘛。”

“要命的是他們不收錢呀！”

“哦！怎么他們不收錢呢。这还了得。”这时候，通过林三的手，一张三万元的支票遞过去了。周荣光用眼一扫，臉子一搭拉，眼角上挂着冰霜。立刻把支票退回去。打着官腔說：“总办先生，你們劳資之間的事，我嘛，也很不便于插手，因为他們工人还是照样開車，照样供电，从維持社会治安角度来看，我也不便說什么。”說着，他立了起来，擡了擡屁股，說是还有飯局，端着个官架子走了。

总办也明白自己下的注小。于是轉天又是一場酒席，把支票換成了五万。五万，周荣光心里的話，我的价碼沒这么賤的，吃完了飯一抹嘴，又走了。总办只好又咬牙，

又請客，又加碼兒。直到怠工的第十五天頭上，支票換到廿萬元的大數，周榮光一合計：“好啊，廿萬！廿萬能買多少所樓房了呢？弓也拉得够份兒了，老這麼抗着洋鬼子，回頭再惹出別的事來。”趕緊唔了一聲，把支票掖在腰包裏，立時話鋒就改了。他氣氣哼哼地，說道：“這幫工人真是可惡，老是搗亂。我看這里面一定有共產黨的人操縱。”

“一定是有共產黨分子煽動！”比國佬連忙點頭。

周榮光就問：“你們有凭據么？”

“凭據沒抓住，可是影影綽綽的。”

就凭影影綽綽的這四個字，當然還不行。周榮光做官的人講究四面圓，八面光，便說：“要是這樣的話，你們還得和市黨部啦、省黨部啦交涉。兄弟我是要嚴辦這群搗亂工人的。”他真滑，還替黨部攬了點兒買賣。

其實，買賣不用他給攬。林三是拜八方的買辦，過去他在煤礦上干過，這一套自然駕輕就熟，另外幾張為數不小的支票也早已經開過去了。

就在這天晚上，深夜一點鐘的時候，省府委員張厲生忽然用電話將工人代表張廣興，還有印刷工會的陶子明，一共四個人叫到村子周的私室作最後的談判。連周榮光也在座。張厲生扯了一套官面兒話，滿應滿許的：“咱們明天立即復工，這樣鬧下去，有礙觀瞻，違背邦交。怠工期間的工資嘛，照發；年終双薪嘛，兄弟我拿人格來担保。你們總信得過我張某人吧？”

張廣興他們早料到這一着了。他們不從這一面和黨棍

子頂牛，而是抬出幾個問題來：“這樣一來，是不是要影響黨國威信呀？”“哎呀，這樣可是不好向工人交代呀。”

“以後的事情很難辦了。”

幾個黨棍子不好說話，周榮光卻擺出市長的威風，指着張廣興橫眉立目地問道：“今天怠工第幾天了？”

“第十六天。”

“你們老這樣鬧下去還行呀！”周榮光緊接着把帽子扣下來，“當初我跟你言在先，叫你們必須團結一致，不擾亂治安，一切合理合法，我才能幫忙，可是現在……”

張廣興忍不住了，緊盯一句：“現在又怎麼樣？”

“現在，現在你們里面出了共產黨，撒傳單，煽動工人，破壞治安，你知道不知道？”

“沒有的事。我們十五天，一點事兒也沒出。”

沒料想，張廣興居然敢頂撞他市長兩句。正好借這機會冒火兒。張開他那血盆大口，狼一樣叫起來：

“張廣興，我命令你通知他們。今天午後三點以前，全體必須復工。誰不服從，就按共產黨分子煽動罷工論罪。有一個斃一個，有一對斃一對！”

有去黑臉的，也有去白臉的。那幾個便一口一個“廣興”叫着。說道：“大家都要從大局着想，正是國難當頭，剿‘匪’緊急的時候，我們一定要顧全邦交，別讓共產黨利用了。現在從很多跡象看，有共產黨操縱的可能。廣興，我們要注意啊。廣興，據說還發現了一些小冊子。”

張廣興一口回絕：“那有这么一回事？”

“可是不能不防止哟！”几个党棍子抓住这顶红帽子了，就说：“马上复工，一定要马上复工！”

几个小时之后，天边刚刚挂出半堵阳光，电厂车厂的工人们便三三两两的向南市庆云戏院走来。今天召开临时大会。许多工人还蒙在鼓里，以为是比国佬斗不过，低头讲条件了呢。瞧会场上这个热闹劲儿呀。

人声忽然静止。原来是张广兴站到台上来了。他声音不大自然，连连喊了几声：“工友们，工友们！”话梗住。底下是一阵唧唧喳喳。“怎么啦，张广兴！”大家都眼巴巴地望着他。

张广兴下决心了，就把晚上交涉的话，一五一十端了个底掉。工人一听，这还了得！像火山崩开了口子，像热水煮开了锅，正这儿人声鼎沸，喊喝成一片呢。张广兴却两手大张，急忙叫大家静住。他说：“我和兄弟们一样，真是不愿意复工啊，可是逼到这儿，不复工不行啦。再不复工，我们就不单是和比国资本家斗，也是和市党部，和公安局保安队斗了。咱们工人们赤手空拳，劲头再大，心气再齐，却总不能这样对付政府的枪啊，炮啊。咱们为了把眼光放远，把力量保存得足足的，不在刺刀眼前做没价值的牺牲，我们只好先复工了。复工并不算是咱们的失败，咱们团结得很好呀，咱们到底狠狠教训了一下比国资本家呀，到底明白了谁才是真正帮助咱们工人的呀……”

张广兴越说越激动，激动得他话都讲不下去了，嗓音哽咽

了，终于放声大哭起来。

会场上是死一样的寂静。个个把眼睛瞪得鼓鼓的，像是一团炸藥，簡直的就要炸呀，这时刻，看到情势不妙，周荣光手下的一員干将，市府第三科科长穆道厚晃着脑袋走到前边来。他张开尿盆似的大嘴，嚷道：“我告诉你们，你们听真了！市长有命令，命令你们今天下午立即复工，免受共产党分子的利用；你们不就是想多要钱嗎，市长已经给你们办妥，你们要求买两袋牌价面，多剩俩钱，已经办到啦。人家比国人已经答应了。你们要官衣，人家看周市长的面子，也答应了，给二百件冬季皮衣。行啦，要求差不多啦，你们要立即复工，不复工就是破坏社会治安，破坏社会治安就是共产党，是共产党就得枪毙！”

……

大伙听得几乎气炸了肺，誰都是头晕脑涨的。有人想出去。嗨呀，不行！保安队已经堵上門了，大伙都低下头来。有人喊着：“我们听张广兴的。我们信得过张广兴。”罢工终于又被压下去了。

下午，各部门的工人低着脑袋进厂来了。刚一到电厂門口，不由得人们一怔，門口上把满了保安队，个个枪上插着刺刀，把母狗眼瞪了个贼圆，就差用枪刺子戳人了。进厂一看，里面还贴着布告。工人们一边看一边叨咕：“怎么，罢工十七天的工资一概不发！来年年終双薪取消！三年不涨薪！”好啊，比国佬是倒打一耙，噙上火儿

了。这还不算，还把工人包汉文等五个名列黑榜，宣布开除！

大伙一看，这是騎在腦袋上拉屎，故意跟工人們做对。你說我講的，誰也不再往里迈步了。吵嚷着：“这样不行！这样不行！”

“大家放明白点，可別再鬧事呀！保安队是真槍实弹，鬧哄着要抓共产党哪！”工会里的这批工賊、流氓打手就是这么一煽風，把大伙說的沒了主张。

“不要紧！不要紧！”刘治倫他們又出头了，从另一面攻。說道：“已經請示过市党部了。大家还是先复工呀！市党部保証包汉文他們可以复工。由党部办交涉。”

花說柳說的，工人只好低头走进車間。車間里怎么多了这么些人啊，好啊，一个人屁股后面跟着一个保安队，他們拿着槍，刺刀也就离后背尺来长。工人們簡直和罪犯一个样！

包汉文他們五个人就連忙跑到国民党市党部。在門口等了半天，这才有个小職員出來講話，說道：“你們不是被开革，是停职。停职嘛是公司的权利，市党部也不便过多干涉。你們先忍耐一下，等着复职吧。”

“那我們肚子餓了朝誰說去呢？”包汉文他們就問。

“忍耐嘛！自己想想法子嘛！”这位小職員把臉子一摔，走进去了。

这几个人整天隨在张广兴的身后，到处交涉，到处沒有結果。于是乘这机会，借这几个人做幌子，大工賊錢伯

驥、王彩南派人下到各車間，到处宣傳：“張廣興惹了比國總辦，讓咱們大家跟着倒霉。咱們大伙齊心哪，把張廣興赶走哪！”

聽說是要把張廣興赶走，大伙喊喝連聲，誰听这一套的，硬把狗腿子給撵出来了。

一計未成，又生一計。偏也湊巧，有个電車車守胡宝山賣車票的当兒，誤將車票画錯了一张。被稽查查出，于是硬把芝麻大的事儿当成黃豆，报告給公司了。公司里的工賊錢伯驥、王彩南正抓碴儿要破坏工会里的这批斗争人物呢，觉着是个坎儿，就把胡宝山找到日租界鴻义棧里來。指着他說：“姓胡的，摆在你眼前头兩条路，你走哪一条吧！”

胡宝山說：“我犯了什么錯，要你給我摆路。”

“你画錯了車票，这事不小呀。一条道，你承認这是張廣興教你們搞的，說是要一律吃票营私，自己到公司自首，随后到法院告張廣興去。告下来，你明白吧，比国人在职位上，薪金上还要照顧照顧你哪。算你命里該着，要走洋运，我姓錢的帮你这个忙，哈哈。”

胡宝山冷眼問：“另外那一条呢？”

“怎么，你还問那一条，那一条路，你想也想得明白，犯了这么大的錯誤，洋人來一张黃条，就把你开革了。这碗飯你就吃不成了。你想想，心里怕不怕？”

胡宝山反倒嘿嘿一笑：“不就是开革么，我姓胡的領着。張廣興是好人，为工人大伙办事，我姓胡的不能陷害

好人。你小子借刀杀人，放心吧，你没个好！”錢伯驥抹了一鼻子灰不說，而且这事嚷嚷开去，工人们团结的心气更足了。胡宝山虽然被开革了，但是倒更使工贼們难以下手了。

二計不成，又生三計。这一計可毒辣。林三林子香又去找市长去了，他問：“张广兴味儿不对，这人到底是怎么一个国民党员呢？你們保险么？”

周荣光是做官来的，凡事不担肩儿，于是連忙和党部的几个头目人叨咕。原本，这几个党棍子就有些照影子，张广兴年輕輕的，这么联系群众，这么任劳任怨，到底为了什么啊，明摆着給他白花花的四万塊現洋，他都不眼晕，不伸手啊；察其言观其行，也觉着不大对味儿，莫不是张广兴别有什么来路，不过疑心归疑心，証据归証据，张广兴明明是国民党员嘛！再一說，如果在国民党员里查出一个潜伏的共产党员，这事情不小，而且对他們头目人都有些不大方便，抓住小辮子就許讓人家給来一下子。兩下子一碰头，还是周荣光出了个主意，他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好下手，爽性把人情送給比国佬，請比国資本家看着办，办对了自是很好，办錯了也沒什么自己的責任，真是再妙沒有了。无声无息地干掉。来个悄悄地失踪，也就算了。

比国佬把这项任务交給了林三。林三在日租界开着大烟館，吃八方的买办，和地痞流氓一向勾勾搭搭，就花錢买通了几个人。有天，乘张广兴他們过老鉄桥的时候，从

暗中打了一槍。幸好沒有打中。

张广兴早就提防这一手了，出出进进，他向来不落单。特地找一些工人保护他。包汉文他们不是不能复职吗？这五个人整天轮班跟着他。这样，地痞流氓也就更下心了，而且另有内线帮忙他们。后来又有一天，正好是十月一日，广兴他们要到伪社会局去办交涉，走到××路口上，忽拉一下子从看报牌子后边，街道的角落里涌来了几个打手，他们照直奔广兴来了，有的动拳，有的动脚，还有一个从小腿肚子上拔出一把匕首，照广兴的腿膀骨就是一下子；虽然有人护着广兴，可是架不住那边的人多，广兴挨了这一刀子，立时倒了下来。可他能沉得住气，他喊：

“抓住流氓，他们是凶杀！抓住他们！”

过路的人从前后左右一齐拥过来。流氓们一看事儿不妙，呼嘯一声，扭头便跑。广兴他们看准那个动刀的了，把那小子按住。连凶器带人，算是抓住一个活口。这事情可就好办了。

忍着钻心痛的刀伤，张广兴和凶手一齐归警局了。警局里的人认识这些流氓，官面儿不惹地头蛇，光说和，了事儿。广兴他们一看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这还成，就要求转解法院打官司。

法官坐在上面，指着凶手问张广兴：“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张广兴捂着伤口，血又顺裤角流了一大片。

法官又指着张广兴问凶手：“你认识他吗？”



流氓橫眉豎目，脖子一歪，胸脯一挺，咧着个大嘴就喊：“認識，我他娘的認識他不少日子了，刺手貨，今天可讓我逮上了。他欠我錢不還。”

法官倒是沉得住氣，就又指着凶手問張廣興：“你是該他的錢嗎？”

張廣興痛得順腦門子滴落汗珠，臉色都變了。但是話却說得有条不紊。“咳，這是謀殺。我不跟他說，他是讓人花錢雇的，我跟林子香打官司。請法院傳他吧。他在比商電燈電車公司呢。他是買辦。”

法官一听，心里明白這是和發動全市的電車電燈工人大罷工有關。不是明伏路劫；這里還有外國人的事。吓得他暗自叫奶奶，“我這是碰了那股子邪霉了，這么難歪歪的事讓我歪上了。”法官便也要了個三推六拖，烏雲遮月的辦法。指着張廣興的大腿說：“哎呀呀，你這傷口不淺，流血過多，你看臉白成什么了。趕快送醫院吧，養傷要緊。傷好了再過堂。”話說完，他退堂了。

走出審訊室，廣興一看，車廠、電廠和公司的工人，都有人趕來了。而且叫了汽車來。廣興被人們連扶帶抱地送上車去。

汽車開到大街上。廣興痛得眼前直發黑。這時候，同車的于世清便喚他：“廣興，廣興，你睜眼看看！”

張廣興把眼睛強睜開來。嚙呀，街上的電車排成隊，一個挨一個的停了下來。原來是電車工人聽說張廣興遇刺了，准知道這是比國佬下的毒手，馬上來了個全綫停車

罢工。看到这光景，张广兴激动得两行眼泪滚了下来。斩钉截铁的吐了几句话：“大家真对的起我，我张广兴死了也甘心！我是坚决干到底呀，决不能辜负大家。”

工人们对他也是关心到极点了。把他送到马大夫医院。这个医院是外国人办的买卖，病多重先搁一边，拿钱来。同去的工人就拍胸脯，把医药费都揽在自己身上。张广兴这才被抬进急救室去。

张广兴年纪很轻，又是外伤，养了些日子，病也就逐渐好了。这天，大夫查过病房，看过他的伤口，忽然又回来了。瞪着眼睛和他說：“我看你是个好人。”

张广兴不免有些奇怪，就說：“大夫，您怎么說这话呀，我看您也是个好人。”

没想到大夫紧接着来了这么一句：“我几乎成了坏人。成了犯罪的人！”

张广兴再一打量大夫的脸色，心里一动，便盯着問：“是不是有人要逮我，害我，我为什么被刺，这事情您也全知道？”

大夫唔了一声，望着广兴：“我要不是看你这人朝气蓬勃，敢說敢干，我也就不說给你了。告訴你，你千万不要声张。声张出去，你没有好，我也沒有好。你可不能連累我呀。”

张广兴笑笑，指着自己的鼻子：“我們工人，赤胆紅心，无牽无挂。你放心吧，有什么尽管說。”

大夫是眼珠子轉了兩轉，嘴巴扁了几扁，含糊地說

着：“有人打算买，买通我，用毒藥，你知道，或是用錯了藥把你害死。我不能干这事。告訴你，你也別再問了，你赶快偷偷地走吧。”

“好，我明白了。謝謝大夫你呀。”张广兴的腦袋里登时閃过林子香的影子。他明白这又是林三的毒計。

张广兴不敢怠慢，悄悄从医院里搬出来。他没有回家，躲到他姨的家里。連一般的工人也找不着他到那儿去了。但是，张广兴并没有停止工作，經常叫一些人到他姨家去。

去的人很多。如今还能找到的一个是丁××。他被广兴叫去，进屋一看，病床上放着書报杂志，这不算新鮮，新鮮的是还有几本油印的小冊子。弄得老丁一怔，这不都是共产党的小冊子嗎？

广兴便說：“老丁，咱們要干到底，这样斗不行。咱們必須革命。要革命就得有革命的党領導咱們。你願意参加革命的党嗎？”

老丁明白了八成，这是讓他参加共产党呀。怪不得广兴这样積極呢，这样善于联系群众呢，敢情他是地下共产党员呀！他光顧楞神儿了，沒有馬上答腔。张广兴是話里留話，十分謹慎，也就把这一段話遮过去了。

另外一个便是张广兴的本家叔叔张巨明了。他去看他。张广兴就直接和他說：“咱們要搞革命，叔，你决心怎么样？”

张巨明指着鼻子說：“別人信不过，你本家叔叔总信

的过吧。”

沉思片刻，张广兴照直问：“那么，你愿意加入共产党吗？”

“愿意！你怎么干，我就跟你怎么干。”

“叔，你写个入党申请书吧。”

张巨明回来以后，马上便考虑写入党申请书的事儿。当然，写这么一份申请书并不简单，张巨明总得准备准备，于是自然而然的便过了几天。就这几天的工夫，张巨明的机会便错过了，他再也看不到张广兴了。毕竟他没有逃开敌人的魔掌，被捕了！

被捕的情况，据广兴的爱人回忆，当时情况是这样：

深夜，他家突然有一阵紧急的敲门声音。广兴的爱人早有预料，算到祸事要来了，好在张广兴并不在家里住，已经从他姨家移到别处去了。

这时张广兴的本家大爷在院里问：“找谁呀？”

“找人！”

“找谁？”

“开门吧，你！”

门打开。一群特务闯了进来。手电光乱射一阵，屋里屋外翻了个过。只是并没有张广兴的踪影。只有他老娘和他老婆，有人就喝问：“张广兴藏到哪儿去了？”

“他轻易不回家住。”

“我问你他躲在哪儿啦？”

娘俩吓得说不上话来了，光是哭。广兴的本家大爷看

不过，就說：“我們确实不知道他在那儿啊。老总！”

“好，那你跟我們辛苦一趟吧。”这几个家伙話到手到，竟給老人家上了手铐带走！

等到天光破曉。广兴的老婆急忙閃了出来。到扶輪中学一位严姓教員家里找他。那曉得半路上正碰上姓严的老婆。她也是一臉失神的顏色。

“喂，嫂子。我們广兴在你家不？”

她也問她：“晚上到我們家抓他們来啦。我还以为在你家里呢。”

兩头都落了空。那么他們都藏到那里去了？这个謎沒有等多久，到中午就揭开了。因为特务机关把张家大爷放回来了。他告訴了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广兴和姓严的躲在陶子明的家里。夜間国民党特务是几处一齐下手，他們同时被捕了去！……

七七事变前一两个月，张广兴这才从北平的陸軍監獄被释放了出来。他回来以后，馬上又取得联系，在铁路工会工作起来。七七事变一起，他和几十个铁路工人一起到蚌埠去。后来又回来，把家眷也接走。在蚌埠落戶。不过，他却沒有在蚌埠呆住，連他老婆也不知道他又跑到那里去了。一年多以后，他回来了，腿部受了槍伤。只有这件事他没瞞着他老婆，說是在新四軍的游击战役中，他們那部份游击队被日寇全部堵击，同志們全都牺牲了。他伤在腿上，当时也暈迷过去。等鬼子兵撤走，他这才醒了逃出来。他也告訴了老婆，自己是共产党员。

其实，他并不是逃回来的。随后便在明光县开了一家鱼粮店，经常人来人往的，成为地下工作的一个据点。这个点坚持了好几年，一直到1948年解放前夕。他在监狱中染下的肺病，这时候再也拖不住了，竟悄悄地死在鱼店中。他斗争了一生，遗憾的是畢竟沒有看到解放！

从西洋鬼子手里轉到 东洋鬼子手里

日寇發動蘆溝橋事變，侵占天津之后。他們首先下力量来抓工业的原动力——电力。自然，“比国电灯房”这块肥肉就成了日本鬼子饞涎欲滴的东西了。一年有千儿百万的現大洋可賺，凭什么讓比利时資本家弄走啊。但要拿过来得有借口，得抓碴找毛病。好在毛病是好找的，随便安排一个戏法就可以了。

戏法出在1939年。六月天气，正是最热的时候，鍋爐房正值夜班呢，午夜刚过，突然撞进两个人来。要說也怪，怎么会有生人进厂了呢，当时比国鬼子吃得腦滿腸肥，什么管理制度也沒認真执行，大門敞着，任人出入，附近过路的人，为了貪圖近道，有时还从电厂的前門进，后門出，抄近道儿呢。所以这兩人晃晃悠悠，人不知鬼不觉地就进来了。这两个大汉，一个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的板斧，一个手拿着把左輪手槍，一进門就邪着嗓門問：“电閘在哪，快快拉閘。慢了要你們兔崽子的命！”

值班的正是安头。他用眼一瞅，这两个大汉是“杂霸地”的打扮，歪戴马尾扁帽，上身穿一件漂白长袖短褂，下身穿条蓝毛料单裤，腰里系着四寸来宽的硬皮带。一脸横肉，眼睛瞪得肉包子那么大。安头心说不好，扭头便跑。

这两个家伙喊了一声：“你往哪儿跑？”拍，拍就是两枪。安头应声栽倒下去。

枪一响，司炉工谁肯守在这儿玩命啊，早跑得一个不剩。

这两个“杂霸地”一看找不着人，顺楼梯走上了电台。电台上是范厂才师付值班；他守在配电盘旁边，听见枪响，要躲还没来得及躲呢，让这两个家伙看见了，抢前几步，一把就把范师付的衣领抓住。直眉瞪眼的喊：“快拉闸，拉闸！”

“是是，我拉闸。你得放开我呀！”

他们自己不会拉闸，非得靠工人的手不可。那个家伙把手松开，用枪顶住范师付的后心，喊喝着：“快去，快去！”

范师付也有心眼。只听刷的一声，他把车间里的照明电闸拉下来。立时车间里黑成一片，对面不见人。乘这黑劲，范师付一溜就溜下楼来。把这两个“杂霸地”甩在配电盘的小屋上，两人摸不着东南西北了，一个劲地乱喊乱骂：“他妈的，往哪儿跑？外边怎么还有灯呢。”

这两家伙喊了一阵，一看没答腔的。黑得这样厉害，

敢情做賊的心虛，這兩家伙便也摸下來了。沒敢再找人，溜出車間，順後門跑走。

車間的燈又亮了，大伙涌出來一看，安頭倒在鍋爐旁邊，哼哼唧唧的，子彈在大腿根上穿了個洞。幸好沒有傷了腸子，大家趕緊把他抬回家去。

轉天天一亮，日本憲兵坐着卡車，直奔電廠來了。戲法做的都露假，鬼子官兒帶着刀，一進門就說：“你們這里昨天事故大大的有！八路破壞的有！”要接管廠子。

比國佬的牛氣還不小，曉着他是綠眼珠，白臉皮，那兒肯交這廠子。說是：“這里比國的財產，你的，法國領事館的說話。”

產權，日本鬼子沒有接過來。好在題目已經找到了。由這天起，日本鬼子搞了一個“臨時軍管理”。日本鬼子兵一排人卡在這里，把住大門，說的可好，是為了“確保電廠安全”。

假戲還要真做。當天，憲兵隊還把兩個特務抓來，讓工人們認，是不是這兩個人？還說：“他們八路的干活，破壞的有。”硬說是八路軍的地工人員來破壞電廠。誰不明白這一套呀，大伙都不言語，望着日本憲兵又把這兩人帶走。

為了搶這家電廠，日本鬼子跟比國鬼子在桌面上談判了，拉來扯去的，一拖就拖到1941年。到日本帝國主義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鬼子這回不用題目了，照直派兵武裝接管廠子。接管的頭目人叫富根。他這人又

高又胖，一对耗子眼，挎着一把大洋刀，他是日本军队的团长。这家伙祖孙三代都是靠杀人吃饭的，祖父是海盜，在攻打台湾时受过伤，他父亲是个下级军官，武士道精神十足。他自幼生在台湾，也是一小就当兵。“九一八”事变时到了中国。平型关大战时，挨了八路军一手榴弹，大脑受了震荡，以后就到天津来了。这回又受了重用。富根是败将犹荣，威风还挺不小的，把大家叫到一起，他噉哩呱啦一阵，立刻派鬼子兵分兵把守，把电厂的要紧地点都守住。勒令比国佬办交代。这些绿眼珠子都吓傻了，办完交代，连口袋里的钱也被掏光，随后低着头走进卡车，被日本鬼子送进海光寺集中营去了。

当天，日本鬼子颁布了他们奴役工人的制度，建立了上下班的搜腰制度。

跟日本鬼子斗

日本鬼子代替比国佬坐在办公室里了。工人们谁没有抗日的情绪呀，不用谁说，也不用谁讲，反正没有一个肯给小日本干活的。发电厂的哥儿们和别的厂子一样，跟鬼子施展开磨洋工、睡大觉、偷器材、毁家伙这四大绝活。给鬼子在生产上的打击，可是大哩。

在无数次偷盗活动中，要数吴万发偷电滚的事情最突出了。楞把日本鬼偷的心服口服。

有天，小吴推灰的时候，发现大厂的后边，冷水柜旁，有个搅水用的电滚。当时心说：“把这东西拿走可解气，非给鬼子招点儿麻烦不结。”再一思量，这家伙足有五百多斤重，三两个人甭打算弄动他。小吴就和李鸿儒他们一商量，找了五个人，大家合伙干。有了人，怎么拿出去呀？出大门不行，这东西又大又笨重。越墙而过嘛，这墙又有两丈来高，上面安着一层电丝网。怎么办，有道是，人多智谋广，哥几个一合计，只要决心干，反正难不住活人。找出办法来了。

入夜，电厂里一片黝黑。鬼子为了防空，个个灯罩上都穿衣裁帽，讓一塊黑布遮住，鬼影綽綽，办事很得手哩。特别是下半夜，鬼子不巡邏了，狗腿子也去睡大觉了。看这架电滾的小狗子也躲到一边打盹儿去了。趁这工夫，李鴻儒連忙上去拉电門，吳万發跟手就卸电滾的地脚螺絲，几分鐘的工夫，电滾子就卸下来了。五百来斤的玩艺抬起来就走。走几步歇一下，歇了几回，他們把它弄到圓水池的梯子底下。又喘了一口气，李鴻儒把电滾子架到小吳的肩膀上。他先順梯子爬到圓水池的頂上，拉着結在电滾上的繩子，小吳馱着电滾，拱一下，上一个梯蹬，拱一下，又上一个梯蹬。眼看快拱上去了，小吳力气再大，架不住这样重的分量，他吃不住劲了，头發暈，身上的汗像水捞过的一样。手拚命的抓住鉄梯，咬着牙，这一刹那間，他想到掉下去就完啦！这一辈子做牛做馬，不能这样完呀！他没劲了，使足劲儿向上拱也沒有拱动。圓水池頂上風很大，这时候，随着風势傳來小狗子的叫喊声：“电滾子沒了，快抓賊呀！”

他倆一听这叫喊，急坏了，楞逼出一股急劲，拱上圓水池頂。他倆連忙抬着电滾，跨到另一座房頂，沿着通天窗的洋灰板，往房子的那一头走，一口气走到牆跟前，李鴻儒急忙把鉄絲往电網上一抛，电門的保險絲断了，于是順着牆把电滾系下去。下面有三个人接着，他們抬起来就走了。吳万發和李鴻儒連忙从房上下来，推灰工一身是土，連擲土也不用擲，扎进入群，也跟着起哄喊叫：“快

抓賊呀！賊把電渡子偷走了！”

電渡子楞會不翼而飛！這事太邪行了，而且沒了電渡子影響水櫃上水，造成的事故不小呀！早八點，一上班，鬼子廠長就把“吊死鬼”，“蛤蟆秧子”還有其它狗腿子都叫進辦公室里來，他拍着桌子，八嘎八嘎的一陣海罵。跟着，廠里貼出布告來了，有誰知情檢舉偷盜電渡子的，許臨時工改為長工，另外嘉獎一百元。

全廠轟動起來了，大伙對着布告嚙牙樂。你說說，楞把攪水用的電渡子偷走了，這得多大的力氣，多壯的膽子，多巧的手藝啊，大伙直咂嘴，吳萬發他們也肩膀碰肩膀的，跟着湊熱鬧，到處問人：“你說這是誰呢，多大的本事啊。要是我，吓也得吓暈了。瞧人家，喘，喘！”

紙里包不住火。再說狗腿子吃了主子的一通“八嘎”，也真賣力氣了。蛛絲馬迹，找來找去，找到吳萬發的頭上來了。

這天夜晚，吳萬發剛睡下，就听咚咚地有人敲門。听那敲門的聲音，小吳心里一惊，料出个六七成來，裝着沒事人兒似的問了一聲：“誰呀？”

“快開門吧！”

小吳偏慢騰騰的。又問：“嘛事？”

“查戶口的，快開門。”

小吳逼到這兒，不開不行了，硬着頭皮拉開了个門縫。原來好幾個警察呢，他們一窩蜂似的闖進來，指着小吳說：“你昨天夜里打人了！”

到这份上，小吳倒不慌不忙了，反正該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吧。把腦袋稍稍一揚，他說：“嗨，何必說我打人呢，你哥几个不就是为电滾子来的嗎？”

“說开了鬧个脆声，不錯，是这么回事。你走一趟吧！”說着，警察把手铐掏出来了。

小吳把手往前一伸：“走一趟就走一趟。”但是，他腦袋却一偏，不忍看他老婆那涼吓的样子。五个孩子这时都哇哇地哭起来，那声音就像小刀子似的，尖尖的在他心口上来回划着。

一进警察局，先給来个下馬威，打了五十大板。吳万發手肿的像似發面包子。問他什么，他說什么，把事情都攬在自己头上，只是把那哥四个完全甩开了，对他們是只字未提。

因为偷电滾影响了發电，不是一般的盜窃，事关重大，所以紧跟着便把小吳押解到日本宪兵队来了。到这里，把他打了多少个死。都招了还不成，还要問他是不是八路。小吳原来不是八路，又怎么招呢，就这样，把他折磨得成了只剩一口气的人灯。

飄雪的那天，小吳的老婆領着孩子来看他了。吳万發知道这机会可一不可再，兴許竟是最后的一面。强撐着力气，忍着疼痛爬了兩次，那里站得起来。看獄的看他快要死的样，开恩的說：“你有那些要說的話，讓別人替你說去吧！”

有个同獄的，就說：“見一面是一面。来吧，我背你

去。”

見了面，小吳的老婆哭得泪人儿似的。吳万發連哭都哭不出来了，只是說：“我完啦。回去領着孩子，好好过吧！”他想着他活不成了。

事情出人意外。定案时，要厂里的鬼子来对質。鬼子山田帶着翻譯来了。他問：“你为什么偷电滾子？”

“餓呀，不够吃呀！”

山田又問：“你怎么偷的，是一个人么？”

“是我一个人呀！”小吳就把前前后后一說。小吳劲大，在厂子里是有名的。山說海說，竟把山田說得张口結舌，連声儿哦哦。

哦哦了一陣，山田終于嘆了一口气，把大拇指一挑：

“你的大大的好。中国人的你的有，亡国的沒有！”随后，翻譯就說：“山田先生很佩服你的胆量，你的本專。他認為你是个人材，他不願再深究这事了。还給你一百元养伤。”說着，还当真的拿出一百塊錢来。

小吳怔住了。不知山田葫蘆里卖的什么藥。其实，山田是真讓小吳的本事胆量給鎮住了。結果，判了四个月徒刑，小吳就出獄了。不过，从此小吳也就离开了天津。

小吳沒有回厂，为这樁电滾子的事儿，倒是一連进来了三个狗腿子特务。为首的叫张七，在小吳他們五个人偷走了电滾子以后，这三个人在牆外摸着了半个底，向鬼子跟前告了密。鬼子相上这三个人了，一来是酬謝，二来叫

他們帮着整治工人。鬼子這一着還真辣！這些小子吃中國飯，說中國話，對付起中國工人來，真是處處有門道。工人很受他們的治。

光受他們的治嗎？哼，當然不是！工人是兩肩膀扛着一個腦袋，怕誰呀？反過來，工人也治他們。於是這就出了有名的“巧耍張七”的事兒。

侯德富那時候是推灰工。每天盡吃些山芋干、雜合面，飽不了肚子，還得死命的干活，所以瘦得皮包着骨頭，跟猴子似的。又因為他姓侯，以音訛音，於是大家就管他叫起猴子來了。既然叫猴子嘛，也是說他有點机灵、調皮的意思。他經常沒事就出些主意耍弄工頭，叫窮哥們出出氣，开开心，逗逗樂。

這天晚上，一上夜班，大伙一個個無精打采地打着哈欠。侯德富就對大伙說：“咱們睡個覺歇歇吧。”

有的人膽小，就講：“別糟改了，要叫張七看見，你還想吃這碗飯不？”

有的人准知道他有高招，就說：“你有什么絕活，快給大伙說說。這兩天哥兒們也得痛快痛快。”

“你們附耳過來！”他就朝大伙如此這般的一咬耳朵。

當下，郭大個到地窖南口去巡風。因為張七每天來巡查都是打南口進來。大伙便躲在北頭，玩的玩，睡的睡，那個美勁兒就甭提了。

不大会兒，果然不出所料，張七鼻子里哼着小調，手

里拿着文明棍（工人給起名叫哭丧棒）晃里晃荡，搖着他那胖身子来了。郭大个老远便看見他那秃腦門在电灯底下閃着亮光。郭大个故意跟他走个对臉，笑着招呼：“七爷，您来啦。”

张七爱答不理的，眼皮子也沒抬一抬，嗯了一声，走过去了。等他走不远，郭大个連忙閃身到黑影里，用手捂嘴，变了嗓音，破口大罵：“你他媽的张七，往后小心着点，別仗着你是特务走狗就欺侮人。老子揍你个混蛋的。”

这是誰，敢这么罵他！张七立刻往回来找人。郭大个連忙擰开汽管，水汽扑噴扑嗤地直往外噴，像迷雾一样，噴滿了整个地窖。噲得张七直打噴嚏。偏不凑巧，他是个近視眼，看东西本来就不大清楚，这回又是从亮处往黑处看，結果是任嘛也看不見。挨了罵竟找不着人，气得他跺脚大罵，可一张嘴又讓水汽噴得够噲。真是活受！

趁着张七叫罵的时候，郭大个一溜就溜回来了。他把大伙叫醒。“快起来，张七来了！”

大伙一骨碌爬起来，用手指蘸点水往臉上一抹，装着流汗的样儿，然后又喘着气，跑到张七跟前。大家七言八語的問他：“七爷这是跟誰生这么大的气呀？”“七爷怎么弄得滿身水呀？”

张七心里明白，就朝大伙哧打着：“他媽的，臭小子放明白着点，別在太岁头前动土。罵你老子，小心什么罪过。”

侯德富最会接这碴儿，故意问他：“七爷，那家伙骂您什么了？”

张七又吃了个哑叭亏。哦呀了半天也没把话说出来。敢情当特务狗腿子，他也知道这不是好话。说不出口来。

郭大个还特别卖乖，还订问：“到底他骂您什么了。”

侯德富就又损他：“还是七爷想得开。谁骂人谁心里明白。”

张七眯着一对耗子眼，夹着哭丧棒，只好一走了事。看他背影消逝，这里哥儿们哄起一阵哈哈大笑。……

巧耍张七的事，立时全厂子都知道了。真是大快人心啊！谁知强中还有强中手。电台巡逻工周胖子也来了个巧耍张七。

张七这条狗，别瞧夜里拿着鞭子绕车间里转，专打那困得乏得不行的工人，不许人们睡觉。其实，他自己可是最爱睡觉，每天都是那样，巡逻完车间，回到办公室里来，蹠起二郎腿睡起觉来。那时候总是在后半夜三点来钟左右，几乎成了规律。周胖子抓住这一点了，这天晚上他通知各个车间的哥儿们：“今天后半夜可别睡觉呀，瞧我治治张七的。”

大伙一听能治张七，饶上半夜觉划得来。都说：“胖子，今晚上看你的了。”

晚上，张七跟往常一样，到三点来钟的当儿，迈着四方步儿，胖身子累得稍稍带喘，回到办公室来。身子往沙发上一倒，假装看报，就打起呼噜来了。等了等，周胖子就

在他門口一陣兒乒兵亂敲。吓得張七從睡夢中惊醒過來，連聲罵道：“有嚇事這麼着急吓人的。”

周胖子偏偏用着急吓人的調子說道：“不好了，七爺，我方才上廁所，瞧見幾個車間的人都睡大覺呢。茅房里淨是人！”

張七一聽說工人睡大覺了，這還了得？抄起哭喪棒就往外跑。他跑進車間一看，工人們干的正歡哪，哪有一個睡覺的？張七往常沒這麼下心過，這回眼睛瞪得肉包子那麼大，從電台直跑到鍋爐房，跑到修配廠，跑到推灰的地道，甚至連廁所他都跑遍了，哪有一個泡湯睡覺的！越找不着睡覺的人，張七越要找。這一折騰不吃緊，把張七累得一身臭汗，呼呼直喘。張七越想越氣，回到辦公室就找周胖子，問他：“你小子怎麼編瘋造魔，哪有睡大覺的呀？”

“那一定是他們得了訊，不睡了。我告訴七爺，是為你好呀。”

張七一琢磨，這理由也對。只好勉強笑笑。說道：“周胖子，你這樣對。以後再遇着睡大覺的人，記住他是誰。這回別瞧我沒逮着這群壞小子們，可我知你的情。”

哈哈，巧要張七的事成了大伙的笑柄。

血 債

日本鬼子的侵略战争使他自己越陷越深，所以他采取的統治剝削手段也就越野蛮，用了无法想像的奴役手段。

鬼子进厂不久，比国技术人员还没有撤退干净呢，电厂里便發生了一樁血案：一个老老实实的人失踪了。这人是誰？这人就是現在的修配机床組长楊才元的父亲。

事情是这样：正是楊才元十四岁那年，有一天中午，他父亲沒有回来吃飯。他們就想：也許是他今天活忙，不回来了。等到晚半晌，下班的时间全过去了，还没見回来。这天外面刮着大风，冷气从破屋子的四面嗚嗚地灌进来。才元和媽媽、弟弟、兩岁的小妹妹挤成了一团，冻得渾身直哆嗦。等啊，等啊，夜都深了，还是不見爸爸回来。他父亲是个老实巴脚的工人，他从来不到处去的。媽媽像是預感到有什么意外的事儿，睁着一双带紅絲的大眼，連忙跑到舅舅家去打听，舅舅也在电厂里工作。不太会儿，她頂着西北風回来了。呆呆地坐在破炕上，臉上罩着一層冰霜，一句話也不吭。从这以后，他們再也沒有見

过爸爸，连点消息也没找到，人就这样没了！

他爸爸那儿去了呢？他逃跑了。为什么逃跑了？为了一个螺蛳。一个小小的螺蛳呀！

那年月，杨才元的父亲在修配车间干活，一家五口人，生活很困难。再搭上物价飞涨，虽然表面上原薪不动，但是钱票贬值，有那些钱买不出那些东西来了。为了糊口，才元的父亲下班的时候，掖了一个螺蛳在腰里，打算带出来卖点钱。走到二道门时，把头于长有跟在后面就喊，“你拿什么了？”才元的父亲一慌，螺蛳掉在地上了。他是头一回，大伙围上来，好说歹说，“他老实人，饶他这一回吧！”事情算是揭过去了。那晓得，于长有要巴结日本人，给他报告了。转天一进厂，他就喊：“你来了正好，日本人叫你哪！”

才元的父亲不知是怎么回事，吓得扭头就跑，这一跑，就跑没了影儿。……

才元的父亲失踪了。他们家里立时断了粮。连冻带饿，两岁的小妹妹先经受不住了，病倒在妈妈怀里，连眼都睁不开，哭又没有劲哭，妈妈眼睁睁地看着这孩子断了气。死了一个，还有两个，光这两个也养不活。妈妈忍着心疼把弟弟送了人。过些日子，又把才元拉到跟前。摸着他的脑袋，抽抽搭搭地说了半截话：“跟你舅去吧！……”

第二天，杨才元随着舅舅到了电厂，当学徒了。什么叫学徒呀。纯粹是给把头当使唤小子，跑跑颠颠，连案子也够不着。挨打受气，回来还不敢说，因为他妈妈正坐在

窗口，望着无語的蒼天，悄悄流眼泪呢。眼泪流的太多了，后来媽媽連星星都看不清了，眼睛几乎全瞎了。

这一家人的遭遇多惨啊。为什么，只为一个螺蛳呀。

为了生活，为了能够少餓一些肚子。漸漸，什么样的惨事都發生了。鍋爐房的赵二竟为两个高头送了命。

赵二四十多岁，长得十分魁梧。干起活来，就跟玩命一样，一点歪道不走。又不会說不会道的。有什么委屈，含着吐沫也就咽了。可这样的老实人偏偏混不上吃，混不上喝的，家里老婆孩子一大堆，七八口人张着嘴，都等他一个人給賺吃的。物价越来越漲，拼命干上一天，不过掙上一斤半斤的棒子面，拿什么养活这一家子人呢？愁得剛进中年的赵二，活像个老头儿。怎样才能多掙口吃的呢？腦袋里光轉窩头問題了。

工人们不好好給鬼子干活，到时候，接班的人总是来不齐，一空一大片。工作簡直沒法繼續下去。鬼子出了坏招儿，接班的不来，上班的人不許走。富根凶神似的把住大門，他讓工人加班。赵二是个直心眼的老实人，不会溜、磨、泡、蹭，不讓出去，他就不敢出去。又一想也好，多干一班，爽性多賺兩塊窩头，这是鬼子給的加班費。为了这两塊窩头，赵二又干了一班。等这班下来，你猜怎么着，因为上班的人少，鬼子还是不讓出去，把头們还是跟着喊：“干吧，多給倆窩头呀！”爽性再賺倆窩头吧，咬咬牙，赵二又回去了。就这样，一連七天沒出鍋爐房，披着麻袋片，

沒黑夜沒白天的干。多硬棒的小伙子也經不起这么熬啊，这天晚上，赵二实在熬不住了，依着水管子，呼呼地睡着了。鍋爐房里是多大的响动啊，机器轟隆轟隆地叫着，任誰也甭想在这儿打个盹儿，他却呼呼地睡得甜香，太乏了，七天七夜啊，太乏了。那曉得把头来了，可逮着一个偷懶的；朝他狠命地踹了一脚，逼着赵二接着干，赵二揉了揉眼，老实人也說話了：“我实在干不了啦。我好几天沒出去了。”

“不干？哈哈，你喘气不？只要喘气你就得干！”把头又要揍他。赵二不敢吭声，又接着干起来。好不容易熬到換班，一出門，凉風一拍，登时得了过力受風病，一躺下就沒起来。那年月医院是給人家有錢人开的，有病沒錢別进来，赵二哪有办法治病呢，沒过几天，赵二就断了气。他这一死不要紧啊，拉家带口的七八口人可怎么办呢，孩子們朝誰要吃的去呀，……

下班的汽笛响了。司水工也是一样得繼續干。鬼子硬不讓下班。說的好，加班給兩塊窩头吃，可是光动嘴皮子，到时候，鬼子連这两塊窩头也不給。大伙一合計，这不是空着肚子玩命嘛！不能干了，决定轉天到“一善堂”去，給鬼子来个拆台，攔車。

“一善堂”离电灯房不远，是个講戒酒戒烟的“在理”的公所，就一間房。因为同院住的都是“电灯房”的工人，大伙平素就把这地方当做变相俱乐部了。这天清早，

“一善堂”可熱鬧了。該接班的司水工沒有上班，都到这儿來了。

熱鬧了一陣，有人說：“要是狗腿子帶警察包圍咱們，那怎麼辦？”

“咱們大家抱起團來。法不責眾，他不敢怎麼樣！”

“要是說咱們是共產黨八路軍，破壞發電廠呢？”

這一句話問得大伙鴉雀無聲。那年月只要一沾這名詞，就是槍斃罪過！想來想去，大家商議定了，別老這麼撐着，叫看水泵的胡師傅先上班去，看看動靜。

胡師傅進廠一看，好啊，鍋爐房裏像一窩蜂似的亂做一團。有的喊：“快加水，十四號鍋爐要爆炸。”這兒話音剛落，那邊十號鍋爐又喊起來了：“水加多了啊！”把頭于長有腦門子直冒汗，跑來跑去，打罵着從別的車間趕來的，不會操作的工人。他們心越慌，手越亂，越出錯。無可奈何，官銀號地區停電了。

急得于長有直打轉。老停電這還行，正踩腳的功夫，他一眼看見胡師傅來上班了。他過去，伸手打了胡師傅一個滿臉花。嚷道：“他們都在那兒？”

胡師傅手捂着臉說：“我不知道。”

于長有上去踹了一腳，把胡師傅帶到廠長辦公室去了。到了那兒，山田坐在正座上，小胡子一翹多高。胡師傅光着腳站在那劃好的圓圈裏。這是從比國佬那時起，一直留下來規矩，工人到這兒只許站在圓圈裏不許出圈一步，鬼子們嫌髒。

山田發凶的喊：“你們通統那里的有？”

“我不知道！”

果然，山田把这頂帽子扣下来了，“你們八路的干活的有！”

“我不明白！”

山田过来掄了一个嘴巴子。胡师付順嘴角直流血。这时，富根过来了，他扮着打一巴掌揉一揉的角色，說：“他們上班的有，你的关系大大的沒有。”

哥儿們講义气，还能卖大伙呀？胡师付还是那句話：“我不知道。”

这一下子惹火了鬼子。登时就上刑罰，把个胡师付收拾得死去活来。敢情不用到宪兵队，宪兵队的刑法这儿都有。厂长室变做审讯室了。

胡师付受刑的事傳到“一善堂”来了。大伙再也坐不安生，不能讓胡师付上宪兵队呀，只好肩并肩的又走进厂去。两个窩头沒有要成，胡师付狠狠挨了一頓苦刑。

鬼子把胡师付放出来。于长有还給叫了去訓一頓，他說：“你們不干活行不行吧？这回便宜了你！”

提起封建把头于长有，人称吊死鬼，又叫活閻王，白臉曹操。在电厂里称得起是一踩脚全厂乱顛的一霸，再沒有他恶的了。厂里的工人，沒挨过他的打罵的，可以說是百不挑一。他看誰不順眼，那是早晚得下手把人收拾了。誰不順眼呢，那些有技术的老工人最不順眼，这小子最嫉

妒人了，他是生怕有人盖过他去。所以姜順便成了他眼中釘。于是他就勾結他手下的軍師蛤蟆秧子趙恩元，在工作中找碴挑刺兒，專門和姜師付刁難。

这天早上，姜師付把飯盒放到牆腳，就去拿工具準備干活。打開箱子，他怔住了，“恩，我的工具哪去了？”

“到點啦，干活呀，快干活呀！”吊死鬼伸長脖子嚎叫。他身後邊跟着兩個爪牙，一個叫歪眼狗，一個叫斜嘴鷄，也隨着吆喝：“干哪，俐俐梭梭的干哪！”

姜順知道這又是故意跟他為難。心想胳膊擰不過大腿去，忍氣吞聲挨下去吧。便央告他：“于先生，您高抬手吧，沒有工具能干什么活兒呢？”

“媽的。誰他媽的給你看管工具。你存心跟我泡蘑菇呀！”說着話，吊死鬼把三角眼一立，抄起木棍，照姜師付迎頭蓋臉打下來。

姜師付閃開這一木棍，受欺侮不是一天了，心頭怒火再也克制不住了。老實人逼急了也要拚命。他指着吊死鬼說：“姓于的，你們待我姓姜的太狠毒了。我跟你們拚了！”話到手到，抄起一根沒車過的鋼軸胚，他就要打吊死鬼。

吊死鬼手下的人多。這時候，趙恩元和王世昌進來了。從後面把姜順的棍子揪住。歪眼狗上去把姜順的胳膊擰住。姜順要動勁，那里動的了。

蛤蟆秧子朝吊死鬼一樂：“于頭，跟他一般見識干什

么？哎，这何必呢！”随后把臉一整，指着姜順罵：“你这小子尽假裝瘋魔，不想干活呀。讓你尝尝老子們的厉害。以毒攻毒，来呀，給他去去火气。”

立时一羣恶狗蜂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按住姜师付。他們的毒計早安排好了。腿子預备了一壶开水，整个都澆在他腦袋上。姜順被燙得滿头燎泡，喊了几声，便迷迷糊糊不省人事了。工人們放下活儿围了上来，敢怒不敢言，还得和把头說好的，这才算是許可把姜师付搭出去。湊了几个錢，好不容易才把他送进医院。

打这儿起，姜順这口冤气窩成了大病。肚子鼓脹得吓人。一天比一天不是人的顏色了。这天，他把他儿子姜起鳴叫到跟前。嘱咐他道：“你要是我的儿子，可一定要替我报仇哇！于长有把我害死啦。”沒过几天，姜順咽了气。

天下是人家的。老子死了，欺侮儿子。以后，姜起鳴在厂子里干活，和他父亲一样，时常遭到狗腿子、把头的排挤，刁难。要不是解放，哪儿报仇去！

又是一个朝代

畢竟大家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的那一天到來了。1945年的秋天，日本鬼子宣布投降了！

工人們樂得合不上嘴，廠內廠外折騰得可歡。和其他工廠一樣，把鬼子們揪住，一頓好揍。日本鬼子打慣人了，等他們挨打，敢情个个是松包，那才叫狗現原形呢。富根連國籍都變了，竟說他是台灣人，他的祖先也是中國人，求大家別揍他。

誰也沒想到，前門去虎，後門進狼，哈巴着腿的鬼子還沒走呢，一批“劫”收大員，鬧“五子登科”的土匪又坐着美國飛機，天上來的，地下冒的，七拼八湊地來接收發電廠了。

請看看國民黨接收大員的整個班底吧。

為首的一員大將叫張景泰，他是從重慶飛來的。是名牌貨。一進廠，從小轎車里鑽出來，一身洋氣，鼻孔朝天，高鼻梁上架着金絲眼鏡，嘴里叨着一枝雪茄烟。開初是美式配備的制服，後來錢掙得多了，便換上考究的西裝。據

說他父亲是开电料行的，有把子剝削錢，又是个基督徒，所以从小就培养张景泰一套洋奴思想，进的是教会学校，以后公費留美，在那个紙醉金迷的国度里混了几年，鍍金归来，于是被捧做宝贝蛋儿。这家伙說話里头加洋字，虽然臉皮是黃的，但脑子里想事儿却和洋鬼子一模一样，主观、蛮橫、专权、自負、臭气冲天。

光这么个少爷秧子自然管治不了这个發电厂，必得找几个坐地虎来做左膀右臂，好騎在工人头上。于是起用了發电厂的两条恶狗大特务，一个叫张俊臣，一个便是那个于长有了。

說起张俊臣来，在比国佬和日本鬼的朝代里，似乎都不甚显眼，其实啊，他一直是和主子一鼻孔出气的“薦坏”。这小子也是天主教徒，他爸爸是法国教堂扫院子的，借这个方便，他进了专门培养洋奴的“法汉中学”。中学畢業以后，他就攀教会的門子，1932年进电灯房当职员来了。善于奉承比国佬，很得到藍眼珠子的器重。这小子洋奴思想很重，西洋人統治中国，他認為是天經地义，东洋人統治中国，他却有些信心不足，心里的話，“你們也是黃种人。行嗎？”所以1940年他就和国民党挂上鈎了，参加了反动組織，领导他的人是天津有名的把头巴延庆。到日本鬼子进厂，他有时交个情报，八一五以后，这小子逮着机会了，立时冒了上来，口口声声国民党地下，拉攏把头、特务腿子，培植个人势力。先投靠的傅秀山（傅死以后，这派由苏硯田領头），組織起电厂的黃色工会，他做

了工会理事长，和张景葵平分江山，在电厂里横行了好几年。見着工人，因为搞的是工会，有时也不得不露个笑脸，乐嘿嘿的說：“兄弟我代表你們工人，为工人办事。”且看他怎样为工人办事吧：1946年他竞选伪“国大代表”，用大卡車把工人接到老站，围着柜台轉了一圈。这就是他的德行。落选以后，又强斂工人圖章，选他作参議員、立法委員。拿工人交的会費来給自己鋪向上爬的道路。随后又花钱請客，和大特务朱雨田勾結一起，参加了国民党中統局工运組，专门做鎮压工人的活动和搜索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員的活动。在电厂里布下了一个特务网。还結了个18盟。这18个人明着是把兄弟，暗着是特务謀报网。当时他們把全厂职工都列表排队，几乎四分之一的人都被他們当做“共匪”嫌疑分子来看待。

說起于长有来，我們都已領教过了。这里再交代兩句。这小子自幼喜欢舞棍弄棒，不务正业，靠耍胳膊根吃飯，以后拜在青帮大头子的門下，很受賞識。1914年，因为比国佬特地要找几个打手，把他找进了电厂。敌伪时代，跟日本鬼子办事也是尽忠尽孝，不知出了多少坏点子，害过多少人。到八一五日寇投降，这小子居然也搖身一变，自称是地下“三青团員”，其实他是三个青年年龄加在一起的那么大的团員。随后他也参加了匪中統局的“勤奸小組”。专在工人里面用鼻子嗅。

这些人合在一起，在电厂組織起新的統治王朝，剝削、压榨、陷害、排挤、折磨，真是使尽了各种伎倆！工

人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1946年初春的一个深夜，推煤車的車道上，有个花籃煤車掉道了。推灰临时工温道泉和另外两个工人没办法就想把煤車抬上道去，可是推煤班长朱云和却离开职守，睡觉去了。人力少，怎么也搭不动煤車，温道泉只好冒着危险，在右边花籃下用木头顶着掉道的一头。抬呀，抬的，也还没能把煤車抬上道去。温道泉累出了一身汗，正想再繼續抬呢，忽然一声震耳的轟响，人們抬头一看，上边吊煤的高車，練子折断，帶着一輛花籃鉄車由上面直砸下来。几眨眼的工夫，花籃已經掉下来了，把温道泉的整个身子压在下面。

“不好了，砸死人啦！”人們七手八脚地把花籃鉄車抬起来，連忙把温道泉搭到鍋爐房，用手一摸他胸口，这个壮小伙子的心臟早已停止了跳动！

“人都砸死了，咦，他媽的班长呢？”

到这时候，朱云和揉着兩只惺忪的睡眼，跟着別人来到尸首旁边。不慌不忙地說：“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不留神点上边呢！咳，怎么办啊？”

“怎么办！你說怎么办吧。他是你班的人，死了你要負責任！”

又一个說：“怎么办，找厂长，找工会呀。工会不是說給工人办事的嗎？”

把头王庆堂走过来了。讓他一說，更是稀松平常，

“人已經死啦，着急也不頂事，不如等到天亮再去找工会吧。”

深更半夜，找人也找不着。只好等到天亮，等到太阳都老高的了，厂长张景泰这才到厂子来。

一听死了个人。张景泰一不惋惜，二不难过，只是赶紧抓住这几句話：“温道泉是临时工，砸死了厂方不負任何責任，不負擔任何善后費用。”

“那么人就白白砸死了嗎？”温道泉的本家爷爷在厂里工作，他的眼睛瞪得溜圓。“他是干活砸死的！”

张景泰一看不掏兩錢，尸首搭不出去。只好說：“厂方念他生前干活很好，按他本人工資發給九个月的，作埋葬費吧！”

“厂长，他才挣几个錢啊？再說，他家中上有父母，下有孩子老婆，一家七口，这怎么办呢？……”

“好啦，好啦，这已經是特殊照顧了。”

“我們想問一問，这吊車凭空砸下来，算是怎么回事？設備有檢查、維修沒有？鉄練子楞給用折了。他这人死的多冤，他……”

“好啦，好啦，这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事故嘛。走吧！”张景泰扫了勤务一眼，自有人把温道泉的族爷連劝帶架，連說帶攆，給弄出厂长办公室去了。

温道泉的死尸抬走了。临时推灰工又换了一个新人。事情便这样无声无臭地过去了。

国民党統治時代的最大特色是什麼？是事故多。

這年秋末的一天，太陽偏西了，灰暗的天空布滿了煙雲，工廠里傳出有節奏的轟响。

史恩貴師傅剛搥完火，放下鐵鈎向章技師說：“剛才接班的時候，八號爐漏汽漏的很厲害。”跟着，付班長楊長祿也擔心地說：“許是出了麻毛病吧！”

章技師看了看八號爐，那年月，干起活來都是搥塞事，誰也不下心，再說鍋爐漏汽也是常事，毫不在意地說了聲：“沒關係，有什麼問題找你們頭兒去吧！”說罷，他大大列列地到二樓辦公室休息去了。

守着三、四號爐干活的是苑四和段漢臣。這哥倆一聽說沒關係，就說：“咱們先吃飯吧。”那年月吃飯沒食堂，都是就地啃干窩頭，為了湊熱鬧，連史恩貴、張師傅都一塊湊過來了。他們剛坐下來，就聽爐里刷刷地發响。

“壞了！爐子轉音了！”史師傅猛古丁地站起來，趕緊找着把頭陳金山彙報：“陳頭，爐子有毛病啦，……”

沒等話完，陳金山就指着史恩貴厭煩地說：“就你事兒多。哪有那麼膽小的。一會兒住爐，先就合着點吧！”他屁股一扭，登上樓梯，向那邊去了。

爐子繼續燒着。干啞得嘶嘶地怪叫。不對勁了！張師傅想招呼苑四和段漢臣過來，他剛直起腰兒，還沒等開口呢，轟的一聲，鍋爐房頓時蒸汽弥漫，熱騰騰地像是在蒸籠里似的，人們拼命地向外奔，但是蒸汽却噴得更快，一股滾燙的熱汽把人們纏住。

当时，史师付守在爐門前边，听到鍋爐爆起巨响，赶紧往爐門底下一趴。爐門被蹦开了，門上的鉄鎖全被冲断，嗚嗚的火苗子把他的头髮眉毛全都燒光。两只破鞋也不知蹣到那儿去了。

当时，苑四一看白嘩嘩的一片，任嘛也瞧不見，觉着渾身發漲，急中生智，連忙向門口的方向冲，跑了几步，剛剛冲到門口，再也忍不住了，渾身上下像是有上千上万的尖針扎着戮着似的，他哎喲一声，暈倒在地上。

当时，张师付一把拉住段汉臣，鑽进八号爐旁边的防空洞，蒙头捂臉地趴在地上。只覺得背上發漲，像是有塊石头压在他們脊背上面，憋得喘不过气来。

幸亏楊长祿凭自己多年的經驗，冒着蒸汽，爬上爐頂，把主汽門关上，截断别的鍋爐汽管，这才沒有影响汽机运行。避免了造成重大的停电事故。鍋爐房的蒸汽漸漸消散了，人們跑进来，連忙用力一拉練子門，水嘩嘩地砸下来……

张师付和段汉臣躲避得很好，但他們原沒有想到顯自己，一看蒸汽散了，工人階級愛集体，愛机器的本能迫使着他們立刻爬了起来，打算出来搶救。剛走到八号爐子前头，出其不意，冷水从爆裂的汽管里冲出，砸在正燒得旺盛的爐火上，一下子濺起一股火花和濃烟。他倆一看不好，轉身又往回跑。可惜人的腿脚沒有火、水、汽来得快，它們一併扑过来。段汉臣跑到半路被它們扑住，渾身是火，一下子摔倒。

张师付来得快些，忍着烧伤，顺着上公事房的楼梯往上爬。恰好把头陈金山由公事房楼梯上面下来，张师付朝他伸手喊道：“救救我！救救我！”

陈金山一看他烧得浑身浮肿，肉皮紫黑，生怕碰着自己，不光没伸手，还把身子往后一退。张师付紧跟着又迈上一步，朝着陈金山倒过来，“扶我一把！”陈金山吓得什么似的，不光见死不救，没去扶他，相反的，倒用手扑住张师付的脖子，挡住他。乘这空儿，他一閃身，顺楼梯跑下去。张师付死命扶住铁栏杆，鼓起余力又迈了几步，两腿一软，倒在地上……

近六点钟的时候，工人们抬着担架，把苑四、段汉臣和张师付送到医院。大夫已经下班了，好不容易才找来一位，他嘴上带着厚厚的口罩，还用一只手捂着，探着身子，用镊子掀开被子看了一下，吃惊地摇了摇头，说道：“太严重了！哎呀，不能治了！”

“不能见死不救啊。大夫您修修好吧。”

大夫又出了新点子：“现在没有床位了呀！”

真亏有人会出主意，抬担架的工人张锡龙也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张张伯苓（当时南开大学校长，伪国大代表）的名片。这张名片能唬人，这才算把病人收下。

到八点钟的时候，三个人全换好药了。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进了病房，哥儿们刚要走，就听着也不知是苑四呀，还是段汉臣喊了一声“快逃命呀！”又哼哼了兩声，这两人便先后断了气。……

事后，把头陈金山不光推卸了自己的责任，还谎说是他不顾危险跑去关上了主汽门，避免造成重大事故。厂长张景泰不问青红皂白，不但没有追究责任，好像事故责任都怪那死了的苑四和段汉臣了，反夸他陈金山处理及时，奖给他五万元金元券。陈金山领了这笔赏金，和工会的几个理事大吃八喝，足足开了一个星期。

张师傅的伤渐渐好了，但他的脖子上却十分鲜明的留下了两个手指的指印，这是让陈金山当时抹的。

还有，那就是苑四和段汉臣的俩家家属了，妻子失去了丈夫，孩子失去了父亲，生活全无着落，只有对着娶人的秋风哭泣吧！难道他们没有领到工伤抚卹费吗？领到了，但很有限。而且，就这笔死人的钱，经张俊臣和陈金山俩人手里一过，居然被吞吃了一大半。

包身工

国民党接收大員“五子登科”唱的这么熱鬧，难道工人們眼巴巴的光瞧着嗎？把头工賊任意橫行，难道工人們驚搭搭的就任他們擺布嗎？沒那个事！工人們有話，“就凭你們这帮腦袋呀！你們这些料貨呀！哼，瞧着吧！”偷、磨、泡、踏几乎絕活都照样來着。跟他們斗！

斗得最复杂，最綿长的要屬包身工这档子事了。

提起包身工來，电厂里流行着一首歌謠：“推煤推灰活像鬼，烟熏火燎趟着水，餓着肚皮跑細腿！”就說推煤推灰工人有多苦吧。原先，灰煤部的工人也是长工居多。到日本鬼子來了，因为大伙不給鬼子干，光見人不見活。鬼子沒轍了，于是想出了一个絕招，把活儿能包的全包出去，就这么多錢办这么多事，越省工越多拿錢，賠賺是包活的。推煤推灰的便也包出來，倒了几次手，最后这事儿，讓干棚匠包活的楊恩元悄悄花錢买动到手上。这小子可逮住發財的机会了。騎在推煤推灰的哥儿們头上，这小伙子吃外撈，心黑手辣，又扣工錢，又放高利貸，真是比狼都

狠。包王大柜才干了几年哪，到国民党統治时期，这小子家里雇着老媽子，使唤着听差的，交結了一帮狐群狗友，吃吃喝喝，居然也是个財主了。就說他剝削了工人多少錢吧。恨得工人們直搓牙，管他叫“棚楊”。

可巧，这天“棚楊”来監工的时候發生了一件事。有个穿破袄的工人不小心，叫倒下来的殘火苗儿給燒伤了，不能干活。少一个人不行啊，一个萝卜一个坑。“棚楊”沒法儿，把袖口一挽，大爷也玩一宵票，跟着推了一夜的轆轤馬。这一夜不吃紧，他是酒色掏空了的身子，架不住这点劳累，回家就倒在炕头，爬不起来了。包身工是現錢現卖，干一天領一天的工錢，他一連兩天沒露面儿，大伙可吃不住劲了，一合計，讓班长赵志清上他家里要錢去。

老赵到了“棚楊”家里，由使唤老媽把他領进正室。他还歪在炕上，哼唧着腰酸腿痛呢。赵志清道了来意，說：“你得給錢，我們包身工沒錢吃飯啦。”“棚楊”心里直嘀咕，生怕包子露了餡，可他又病的起不来，只好硬着头皮写了个便条，讓赵志清拿了他的圖章到厂里取錢。临完，他千囑咐万囑咐的說：“你就凭条領錢，領多少是多少，任嘛事不用問。你明白啦嗎？”

赵志清兩眼一碼儿黑，認不得半个大字。可他心里豁亮，准知道“棚楊”这里头有鬼。你不是不讓問么，他偏要找个識字的問問。拿回来，讓哥儿們里喝过一点墨水的孙志欽看着。老孙綽号“算天星”，他就朝大伙念叨：“看啊，‘棚楊’吃咱們吃的太狠啦！”大伙一听那个数，火苗儿



一甯老高。真是，狼吃人还得剩堆骨头呢，他这小子吃人，居然連骨头渣子也一塊吞哪！包工錢是三七分，白袖口一卷，先剝三成去，這且不提，怎么大伙一天干十二小时的活，只領八个鐘点的錢呢，那四个小时都讓他眯起来了。这还行，大伙决定告他去。

头一状告到厂长张景泰那里去。张景泰倒干脆，說了一句話：“胡鬧！”

哥儿們里头还有一位会出主意的魯克恭，就由他煩人写了一个呈子，遞到伪社会局去。厂里不管，咱們是厂外折騰。伪社会局派一个戴金絲眼鏡，穿洋服的人見的魯克恭，一臉不耐煩的神气，不等魯克恭話說完，这小子就截住問：“你們到底要干什么吧？”

“我們要求取消包工制！”

想不到他倒应承下来，叫过三兩天来听信儿。过了三兩天，魯克恭又去了，这位戴眼鏡的又叫再过三兩天，一来二去的跑了十几趟。他們的事情沒有办出眉目，倒是社会局这儿和张景泰，和“棚楊”把事儿办好。戴眼鏡的拿到了他能拿到的那一份儿，也就不再照面了。連再过三兩天的話也沒了。魯克恭他們明白，这是給人家做飯吃，他們白跑这冤枉路了。

可是，他們还不知道，“棚楊”朝他們領头的下毒手了。这天，付班长肖景泉領班，垫手的破麻袋片沒有了。一推車，手上就得燙几个大燎泡。肖景泉就找“棚楊”要麻袋片，“棚楊”正抓碴儿呢，一看送上門来了，张口就

罵：“你他媽的拿麻袋片當飯吃呀！三天兩頭的要。沒有，沒有！”

肖景泉也窩着火呢，就嚷：“你不給不行！”

“我就不給，你敢怎麼樣？”說着兩人支巴起來了。

這時候，特務狗腿子張七來了。這小子在日本鬼子統治的時候，拿棍子抽人，到了國民黨派兒，他還是拿棍子抽人，還是交報告，轄制工人。他當然和“棚楊”是一頭的，喊喝一聲，叫腿子們一擁而上，把老肖，還有跟老肖一塊兒來的老王給按住，往大門外面一推。倒也干脆，開除了！

這能完嗎，當然不能完。老肖和老王就去告“棚楊”。俗話說的好，“有錢能使鬼推磨”。告來告去，他們不光沒告了“棚楊”，反倒被偽法院給他倆扣了個擾亂廠方的罪名，白白壓了好幾天監獄才放出來。案子就這樣算完啦。哥兒們在里面使不上勁，只好嘆口氣，先忍着。眼睜睜地看他們到別處去找飯路。

包身工的哥兒們里，有一位叫劉少波的，他是城裏住家。這天下午剛邁大門，要去廠里接班。就見斜對門的閻大律師正往外送客。他眼睛尖，看那客人坐的三輪有點兒像“棚楊”的，連忙閃到一旁。從門縫里往外偷看，可不嗎，閻律師送的正是“棚楊”這小子。老劉登時心里犯了嘀咕，“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官司不是已經打完了嗎，干嘛還找律師呢，這小子還安着什麼毒計啊。”

隨後，他蹣跚到律師的院里，喊了一聲，“四爺在家

嗎？”

“里边坐，里边坐。”閻律師和老劉是十多年的老鄰居，再搭上他這律師沒有干起來，所以对鄰居有個面。

進屋以後，老劉不用客氣照直就問。閻律師也就實話實說。好呀，原來肖景泉他們官司打不過，低頭算完啦；他“棚楊”可不算完，斬草要除根，買通律師想把趙志清也給咬進去，也給押上一陣子，來個一脚踢。

是這麼一計啊！劉少波連忙央告律師：“您可不能這麼辦呀，‘棚楊’這小子可不是東西。我們班長趙志清可是好人，人家‘扛着刀’，給我們大伙兒辦事。您要這麼一來，不把我們都毀了嗎？”

閻律師一想也對。一來是“棚楊”手緊，只搵了幾盒烟錢，值不當的去缺德，二來是和劉少波十多年相識，知道他們這伙賣苦力氣的哥兒們火氣大，犯不上惹人，再給自己搵了大包。就說：“好吧，瞧咱們老街坊的面子，依你。我明天不給他出庭。”事情揭過去了。

劉少波一口氣跑到廠子。趕緊給大伙送信。大伙一聽，這份氣大啦。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大伙抱團，跟他干到底啦。七嘴八舌的說：“給他挂隊！罷工！”

有人就擺手不贊成。說道：“這是什麼年月，找着讓‘棚楊’把咱們當成共產黨八路送終啊；再說，他正巴不得把咱們踢開，另換一撥新人好使喚呢。”

有人就提：“咱們給他來個明着不攔暗里攔。土市政府找社建時請願去。”

又有人摆手：“杜建时是哪一头的，能向着咱們嗎？”

又有人贊成：“嗨，杜建时跟他一鼻孔出气也好，兩鼻孔出气也好，反正这小子得花錢买动！”

“对！”大伙劲头都上来了，“請願不准，咱們不掉肉，‘棚楊’可把錢包丢光了。对，对，哥儿們折腾光这小子。”

要請願就得有說辞，于是煩人写了八項条件。主要的条件是：从比商直至現在，灰煤部工人一向在厂內工作，且为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份；因之灰煤部工人应改为长工；取消一切包工制；每天十二小时的工作時間应改为每天八小时；不許把头虐待、打罵工人。

遞上請願書，沒多久，国民党市政府批下来了，含糊糊糊的一句話：“候飭查核办！”以后便石沉大海，渺无音信。大家等得怪悶气的，不办不离奇，准知道他們不給办；可是“棚楊”究竟花多少錢，出多大的血呢，怎么連这个动静也沒轟。

沒有不透風的篱芭，事情讓經常向电厂运煤的把头，张秃张亭善知道了。他說：“我給你們大伙出个主意吧，你們找安青帮的头目人张逸之，拜师入帮，靠他的势力，国民党不說，連軍統中統也都有个面儿，准把‘棚楊’給拱下去。”

狗拿耗子，怎么他多管起閑事来了呢，把头撞把头，其实这小子也沒安好心眼，他是眼紅嘴饞，想夺“棚楊”的

食，挤下“棚楊”，他好当包工头儿。

大伙一研究，跟“棚楊”斗到这份上，沒路可走了。要是靠安青帮的势力压下“棚楊”倒也不错。死馬当作活馬医，每人凑了几个錢，給张逊之送礼，摆香堂，認师付，求他帮忙斗“棚楊”。

一晃，十天半拉月过去了。“棚楊”还是那股子牛劲，斜眼看人，恨不得把誰盯死。大伙儿一想，这不成啊，香堂白摆了是怎么的？哥儿們凑了三十多个人找张逊之去了。别提有多巧，正碰上张逊之要出門。一見大伙，他在台阶上一站，撇着京腔，倒数叨了大伙一顿：“你們請回去吧，原来你們是运焦子的。我这儿也是你們来的地方！”

說完走下台阶，揚着脖子，鑽进汽車里，开路了。大伙罵罵咧咧地不知怎么出这口恶气才好。

这时候，张逊之的办事人，穿着长袍、緞鞋踱了过来，朝大伙伸出四个手指，說道：“人家‘棚楊’使錢，买死啦，你們要想把事扭过来，得这个数。”

这四个手指头就是四十袋面錢的意思。大伙一听，唧唧噥噥地嚷开了鍋：“要是四十袋面，誰来你这儿啊！”“这不是拿我們穷哥儿們炸肉醬玩嘛！”……

大伙沒有搬动“棚楊”，“棚楊”可不饒大伙啊。事情全是班长赵志清出的头。他成了“棚楊”眼中的毒刺了。

这天晚上，赵志清刚进鍋爐房，就見一个叫李文杰的拿着油壶，劈头朝他砸下来。赵志清閃过去，这小子还抓住赵志清要打。人們上来，把李文杰吆喝住：“喂，你这是

要干什么？”

“我看他不順眼！”李文杰还逞能耍橫。

“是你看着不順眼啊，还是‘棚楊’看着他不順眼，你小子喝他几兩酒，抽了他几支烟哪？”

这一揭底不吃緊，李文杰夹尾巴狗，赶紧溜号了。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沒过几天，老赵下班回家，正走着呢，猛然間从金家窑包子鋪里跳出几个人来，攔住老赵就要揍架；但剛喊了一声，立刻又把拳头縮了回去，原来大家彼此都認識，全是家門口摔跤，練把式的熟人。哥儿几个一甩手，說道：“我們当是誰哪，原来是赵大哥。算他‘棚楊’倒霉，白吃他小子一頓包子。老赵，往后要加小心啊，你走吧！”

赵志清几次險遭暗算，不能不想个对策。大伙一商量，哥儿們里头，屬魯克恭来得机灵。就讓他假裝投降，到“棚楊”那儿臥底去。

当天晚上，魯克恭晃晃悠悠的到“棚楊”家来了。一张嘴，先借錢：“掌柜的，費您心吧，接济我几个。”

“不借。你們有本事，到处告我去吧。倒瞧我姓楊的行，还是你們穷小子行。青天白日旗挂着，大太阳晒着，你們要造反哪？”

“瞧您說的。我跟他們不一道啦。我过您这边来了。胳膊擻不过大腿去。我是吃飯要緊。”

“你这是真話，假話？”

还没等魯克恭回答，坐在“棚楊”身边的狗头軍师閻

同生开腔了：

“咳，掌柜的，您問这个干嘛。来，开柜子拿錢。”
这小子是个机灵鬼，想买动魯克恭，就塞了一把錢給他。
其实呀，这也正中魯克恭的計。

魯克恭回来了，就把錢交給大伙。大伙就拿这錢垫补了菜錢。以后，魯克恭不断的到“棚楊”家送消息去，編方造魔，淨是讓他听了心跳的話。一回来，准带一把鈔票回来。就这样，一晃过了两个月。

日子长了，“棚楊”以为魯克恭可靠了，就出坏招儿說：“克恭，既然你过我这边来了，你就得給我办点事。这事嘛，你要是办好了。嘿嘿，我給你新打的三輪一輛，三季衣裳都是里表新的。”

“头儿，您說办嘛吧。办得到的一定办。”

“你扒哪个爐子？”

“11号爐子呀。”

“好，你这么办，明天黑夜，你偷偷把爐条扒了，造成事故。嘿嘿，东西可就全到手了。”

“头儿，行是行，可是得緩几天，找着下手的机会，要是讓大伙瞧見，我吃不了得兜着走啊。”

“这样吧，七天，一言为定。”

別說七天了，十天也沒信儿。魯克恭还是到“棚楊”家去要錢。“棚楊”琢磨着不大是味儿。手指縫綳紧，不大相信小魯了。他另憋了新招子。

有天晚上，算天皇孙志欽去胡同口买烟卷儿，正好有

个人拿着张纸条问摆糖摊的彭老头（你还记得最初争双月搞罢工的那位彭头吗？）：“我打听一声，有个叫苏德林的在哪儿住。”

彭老头一看这人有点邪行，要胳膊根的派头，就问：“你找他干什么？”

苏德林是外面的包工头儿，经常做电厂的外活。孙志欽就留上心眼了。就说：“苏德林哪，他就住这块。”随后把纸条要过来扫了两眼。好啊，正是为他们包身工的事。又是“棚场”的主意，由苏德林另招了一批工人，打算今天乘他们下班，全换了！

孙志欽没动声色，告诉他门牌地址以后，一扭身跑回厂子来了。

大伙一听，反倒心平气和。说是“棚场”朝大伙来，棍打一片这倒好，省得他算计这个那个的，大伙悬着心。

赵志清出了个主意：“哥儿们，下了班，咱们别走，预备家伙，干嘛！”

天一亮，他们就把队伍拉到门口来了，有拿通条的，有拿铁铤的，全是铁器，净等着苏德林带人来了。

苏德林没来，特务张俊臣却来了。一看这架势，吓了他一跳：“喂喂，你们这是怎么啦？”

赵志清还有这股机灵劲，马上给他戴高帽子，说道：“理事长，你们工会管这事不管吧。‘棚场’找苏德林另招新人，要把我们都下了！”

张俊臣一乐，说道：“不是你们工会，是咱们工会。工

会是给大家办事的嘛，怎么不管，这事交我啦！”

“交你怎么样？”大伙嚷道，“你有嘛保证？”

张俊臣是笑面虎，专去拉拢人的角色。这是买好的事，他还能放过，眉毛一扬，鼻子一翘，给看门房的下了命令：“今天生人一概不准进厂。有嘛事先通过我。”

随后，张俊臣把“棚杨”叫来，板着面孔，一通好熊。

过去见面总是乐呵呵的，今天这是怎么啦，“棚杨”呆在张俊臣面前，像掉在烤爐里一样，烧得脸红筋粗，嘴皮子不停。一连声儿“是的，是的！”他心里却暗暗骂道：

“没给你这道衙门口使钱，你小子给我来这一套的！”

其实，张俊臣倒还不是钱不钱的。他是看上这几十号人了。要是能改长工，这就都可以加入他的工会了。那会给他增加多大势力呀。包身工斗争的事儿，可是复杂透了，八下子都使劲儿。……

这时节，厂里来了一位新的工程师，这人名姓都特别，叫来杰。他是从昆明来的。一进厂，大伙就知道了，都骂骂咧咧的说：“又飞来了一个！”

不过，这位工程师可有些不同，穿着一件蓝布半截大褂，一来就下地窖了。到了地窖就和大伙招呼，大伙给他个爱答不理的。这还不算，给他来了个外号，叫来大褂！暗含着这是损他的意思，穿大褂的，不劳而食，是光会指手动嘴的一塊廢料。不，来杰还真有两下子，推煤部有个机器坏了，誰也收拾不上。他给出主意，找着老工人一齐对付上了。工人们传出来了，说道：“来大褂，好家伙

呀，有把刷子。”

来杰看地窖里的工人光用斜眼飞他，问什么总是哼哼唧唧的，腔儿不亮，碴儿不对。他就扯着赵志清说：“你们别这样对我呀。我是好人，你们有什么困难朝我说。”瞧你们这个工作条件太差啦。”

大伙围上来了。一听来杰说的是人话，敢情飞来的也不一样，有好有坏，这比先前那位钱串子工程师强太多了。于是大伙就把“棚场”剥削的事儿，如此这般的一说。

来杰一听，满脸同情的颜色。自己个往身上攥。就说：“居然还有这样的事。你们听信吧。我给办。”

没过几天，来杰搭拉着脑袋捎回信来：“咳，我办不了呀，厂长不同意，说这是公司的制度。你们好好干吧，我很同情你们。”

要说同情，来杰倒的确是同情。有回，他瞧见工人推着火苗冒着老高的爐灰，连个麻袋片也没有。这要是溅上火星，登时就是一身潦泡。就问：“麻袋片呢。”

“用坏啦。新的不给呀。说这是制度。”

“老赵，跟我来，我给要两块去。”

等着赵志清到了厂长办公室，好啊，来杰跟张景泰吵起来了。一看他进来，两个人赶紧改用南边话吵。好让老赵听不出来。可是老赵两只眼睛看出来，张景泰这小子真狠，连两块麻袋片也不给。那意思是，不能把工人宠坏了。他们没有麻袋，怎么你做工程师的也管这事！最后，来

杰气哼哼的把赵志清扯出来，和他說：“以后要东西的事別找我。我办不了。这又是公司的制度。”

其实，按制度的規定，到日期，也該領麻袋了，这是张景泰故意刁难大伙。过不几天，赵志清直接找厂长去了，話挺硬：“你还是得給麻袋呀。有日子口管着呢。”

朝他要，这倒可以。张景泰一声不哼，盖了圖章。就說他这里下了多大心計吧！

別瞧兩条麻袋片，事儿不大，風可吹出去了。都說来大褂为包身工的事跟厂长干了一架。你傳我，我傳你的，加油加醋，傳到“棚楊”耳朵里，这小子一泡坏水，多了好几个心眼，未免心里發凉。“怎么这群穷小子，卖苦力的跟工程师搭合上了，还能少給我上眼藥啊。”折腾来，折腾去的，“棚楊”倒开窍了。反正怎么也是花錢，何必花了錢还惱气呢，干脆輸这口气吧。于是他派狗头軍师閻同生到赵志清家来。

正是吃飯的当口。老赵把狗头軍师迎进屋去。这小子瞟了一眼桌子上摆的窩头咸菜，故意找話：“吃了嗎？”

老赵說話嗆喳的。“这不是正吃着哪嗎？”

“沒福气嘛！吃这么难咽的玩艺儿！人活着为嘛呀！志清，你是明白人，一轉腦筋，別說不吃这么苦的东西，唔，少不得还要弄个二掌柜的干干。”

老赵准知道他是为嘛来的。就压住气說：“有什么事，你直說吧！”

“老兄弟，楊头很器重你，想和你交个朋友。磕头拜

把子。往后是，伙燒一爐香，伙坐一只船，有福同享，有患同当。都是自家哥們弟兄。嘿嘿，你这回可是一步登天啦。”

老赵也嘿嘿了兩声，眼珠子一瞪，大喇叭嗓子嚷开了：

“你回去告訴‘棚楊’，咱是工人，穷光蛋一个，为大伙儿办事。姓赵的不卖朋友！”

“老兄弟，凡事三思而行。干飯燉肉，窩头咸菜；掌拒的，推灰的；这个分量，一天一地，你可掂掂！”

“你給我滾！”赵志清“砰”的一声把門推开。

閻同生的圓臉变长臉。臉上罩上一層冰霜，冷冷地說道：“好，好呀！姓赵的，你也太不識抬举了，把道都走絕了。走着瞧吧，看我拿錢买不了你这条小命！”

赵志清把袖子一挽，也說：“好，咱們走着瞧吧。”

这一鬧，等于是硬弓又拉上一扣。包身工的哥儿們都格外加了小心，有今个沒明个的，走着瞧吧。

瞧着，瞧着，“棚楊”的毒計還沒容使出来，倒是大时代已經来到。海河岸边响起隱隱約約的炮声；这些声音在人們心弦上激起了莫大的震动。哥儿們都暗地使劲，悄悄念叨着：“国民党要完蛋了！”

越来越紧了，紧到輪船不通，飞机不飞，天津像一口大瓮似的，被解放軍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张景泰表面上还根据国民党的布置，安排了工厂职工五人联保，保証不是共产党。可是心里却直打鼓，渾身毛毛咕咕，屁股像坐在針毡上一样。走吧，沒法走；不走吧，共产党来了，要怎么整他呢？这小子心神不定，倒經常把来杰找到屋里来聊



天，讓來杰后發他。

來杰是共產黨嗎？不是。張景泰很知道他。找他談的原因是這樣：來杰的老婆前些時候坐船到南邊去，走到山東半島地面，船觸礁了，停在海面上。一船上好幾百人，都是行裝累累，滿是金銀珠寶的有錢的人們，大部份都是從天津走的。這事當時很轟動，謠言很多，都說讓解放軍給他們俘了，殺了，東西都搶光了。事實却是當地的民兵駕着小船，把一船的人都接走，把他們的行李都搬到海灘上，等船修好，又把他們送走了。來杰老婆聽當地的工作人員給他們講過話，對政策有些理解，又親眼看見過解放軍，所以回來以後，就把所聞所見全說給來杰了，來杰把這事當做海外奇談，到處去講，到處去說。張景泰也灌了一耳朵。因此他就來打聽來杰：“你說萬一……如果，假設他們進城以後，對咱們怎么個看法呢？咱們是技術人員，他們連工商業都保護，自然咱們更沒什么問題了吧？他們一定要用電，要用電就得靠我們。是不是，你說呀。”

來杰偏不給他打保票，不給他吃舒心丸，倒說：“廠長，有些事，廠長，我覺得嘛……”

聽着“廠長”這兩個字兒忌諱。張景泰連忙攔住他說：“來工程師，你就不必繞彎子吧，有話直說吧！”

“地窩子包身工鬧得很厲害。現在他們還到處告狀，罷工，打架呢。將來局面一變，那還了得，依我看，應該取消包工制。”

“這是公司制度，不光天津一處這樣。”

“到那时候，恐怕很难这样说了。他们几次请求，都说厂长很不同情他们呢。”

张景泰的脸上一阵发青发白。这小子吓傻眼了。只是拼命吐烟圈儿。

事情决定得很快。转天，赵志清被叫进厂长办公室。张景泰决心要买好。可是一瞧老赵那清瘦的脸儿，由不得的气往上撞，劈头竟说了这么一句：“你们呀，给我找的麻烦太多了！头一个就是你呀。我真该不要你。”

老赵勉强舌头打弯，说两句好的：“得啦，您多维持吧。我们穷人总得吃饭，不活反正不行。”

来杰连忙摆手，对赵志清说：“少说两句吧，给你们办好事，提升长工啦。”

赵志清连忙说：“那太好了，我先谢谢吧！”

没等他乐出来，张景泰却念了个名单，鲁克恭他们八个人不留。“调皮捣蛋，厂里不能留。”

“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啊！”

张景泰还挺嘴硬，咬定这三个字儿了，“不能留！”

赵志清从厂长办公室回来，大伙一听，都炸了。“这不是拆大伙的台吗？要好都好，耍赖都赖，哥儿们不能有甜有辣呀！”

还是那老招子，给他揽事，罢工！为了罢出点眉目来，让张景泰一概全收，赵志清找张俊臣去了。他不是暗送秋波，想拉拢大家吗，这回大伙正利用得着他。那晓得张俊臣因为上回那事，后来挨了特务头子一顿申斥。在当

时那么紧张的情况下，电厂是很重要的地方。又不同于一般工厂，在特务的工运组，防奸组控制之下是绝对不许有丝毫罢工活动的。张俊臣拉拢工人，想扩张他的势力，那叫因小失大，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是引火烧身。把张俊臣骂的够呛。现在怎么个碴，要罢工！张俊臣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伸手从腰里掏出一把手枪，乒的一声，放在桌子上。这小子母狗眼一立，嚷起来了：“你们敢罢工！你们谁罢工，谁就是共产党八路，破坏电厂，我就枪斃谁！”

这手儿很厉害，国民党正抓人呢，让张俊臣他们特务咬上，枪斃倒未必，可是装在麻袋里扔下海河这可是寻常的事。何必找这个牺牲呢，赵志清就赶紧溜回来了。倒是鲁克恭他们哥几个把大伙拦住。劝道：“哥儿们，咱们只要斗了‘棚杨’，不再受他剥皮，这就是大胜利。现在炮都响了，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留着脑袋，以后跟他们斗吧！走我们几个没嘛，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哥儿们，咱们后会有期呀！”

人们一寻思，这话有理。已经到了这份上了，还跟他们硬拼什么啊。

停了几天，张景泰在院里召集全体工人开了个会，说了几句刷油涂色的门面话，随后念了个名单，果然是鲁克恭他们八个都下了。可是“棚杨”却没踢开，他也补了个职员，还是负责推煤推灰部的工作！哥儿们里有位石宝林，忍不住气，当时冷笑一声，插了一句：“哼，这他妈的是相着‘棚杨’，给他解套，穿一条裤子！”就这一句话不大

疑，张景泰听见了，眼睛一斜，这小子所有的工人都認識，立刻找补一句，“还有石宝林，厂子也不留！”

大伙乱哄哄的，这算怎么回事呀。张俊臣把工会的一张布告贴出来了。字眼用的跟枪弹差不多。“如有工人聚众鬧事者，斟酌情况，或开除；或送警备司令部……”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伙只好骂骂咧咧地走开。包身工的斗争，到此也就告一结束。

解放之歌

隆隆的炮声越来越紧了。在炮声中，电厂应当值勤的工人全部到厂里来了。他们个个紧张着，因为枪炮不长眼，碰上谁是谁，谁也不愿意在这黎明前夕再遇到什么不幸。但是，从来没有过的，四十多年来头一遭，工人们这样细心地守着电盘，守着锅炉，守着汽机，守着厂房在时时准备着，准备着迎接解放，也在准备着那突然发生意外事件的时刻，那时候，他们就要拚命护厂，急救了。

到了后半夜。炮声渐渐稀了，近处传来一阵阵炒豆似的枪声。听着枪声，守在电台上的几个工人还交换了一下意见，“怎么样，炮声稀了，大概是轟开了。”“唔，听这枪声，大概是打巷战吧。”“我的天，什么时候才完哪！”说着，他们还看了看表。表针刚刚指过一点。嘆了口气，一扭头，隔着玻璃，就见有两个人一前一后，朝电台走来。走在前边的一个，上身穿一件黄布棉袄，里边套着一个大青夹袄，因为外边的棉袄小，那个青夹袄露在外边，足有二寸来长，背后还挎着一个背包。后边一个，穿着一身青棉裤

棉袄。电台上的工人一看，不用人說，早就猜透，这准是“八路軍”派来接管电厂的人員了。只是未免有点儿納悶，他們怎么进来的这么快呀！难道已經解放了？

他們怔神的工夫，这兩人已經大踏步走进了电台。弄得这哥几个呆在那儿，不敢动一动。誰也沒有想到，他們兩人滿面笑容，过来就打招呼。握着工人們的手說：“同志們，你們受惊了吧。”

真笑假笑，一望便知。工人們由不得也笑了，这哥几个吐出了一句話：“同志，你們受惊了！”

接着那穿黃布棉袄的就自我介紹：“我們是接管电厂的軍事代表。我叫曹化一，以后咱們就在一起工作了。”那个穿青棉褲棉袄的也指着自已說：“我叫刘国权！”

就这样，大家聊起来了。聊着聊着，工人們竟把“监盤”的事儿丢在腦后。曹化一同志馬上發現这問題了，就說：“咱們一面工作一面聊，你們可注意电盤哪！”大家这才又扭过臉来，一边看表盤，一边說話。老曹他們光想問工人們的生活，电厂的情况，可是工人們却想知道一下什么叫共产党，共产主义，进城以后，都要做些什么，越聊越熱鬧，一說就說了一个多鐘头。亲热地像是朋友了。

工人們弄了一壶茶来。喝过了茶，老曹这才問：“你們厂长张景泰呢？”

噢，敢情他們事先都摸底呀。工人就說：“厂长在后楼睡寃呢。”立时，勤杂老崔跑去找厂长去了。

这时候，电台外边围滿了人。大伙說，“請同志先到

厂长室歇会儿吧！”

他們倆走出來了，還和大伙說：“同志們，你們工作吧！咱們呆會再談！”

可是，這兩人有種吸力，人們拖拖拉拉的一直跟到廠長辦公室。剛剛坐下，人們就見廠長張景泰從樓底下，一溜煙兒跑上來。臉色有些發白，手足無措，又要笑又不敢笑，又要招呼又不敢招呼的樣兒。

這兩位都站起來，把手伸過去：“張廠長嗎？”……

談了一個來鐘頭，張景泰走出辦公室來了，臉上浮着一層松心的笑容，才剛那副緊張樣兒一點也瞧不見了。這兩位同志還把他送出來。

發電廠的電機依舊轟轟地響着。但伴着機器的人的聲音卻不一樣了。從樓上到樓下，從里到外，工人們都是一邊工作一邊談着共產黨，共產主義，有些人還不時的跑到廠長辦公室外面偷瞧，一回一個消息，“他們沒有睡覺，兩個人正在商量事情呢。”“他們在整理筆記呢。”“他們在看材料呢。”

天亮了。那間屋里一直亮着燈，他們一直在工作，一直沒有睡覺。

电厂年青了

解放了，这座最老的发电厂开始返老还童，年青了！

在国民党时期，这座发电厂已经老得不像样子。那些从美国镀金回来的工程师说：“这些发电机都老掉牙了，只能拆开做废铁卖。没法不出事故，没法不停电！”

同样是这个厂子，这些破旧的机器，看看到工人手里是个什么样子吧！从解放的那天起，天津的电灯发光再也不是黄涂涂的了，而且那被讥笑为老掉牙的发电机，也生产出了更多的电。比国佬在的时候，最高发电量是每小时13,000瓩；日本鬼子统治时期，最高发电量是每小时11,000瓩；国民党的“劫”收大员们搞的电量是每小时12,000瓩；而现在却是每小时最高24,800瓩。这是鬼子，党棍子们做梦也梦不到的事。

我们再看看工人的政治热情吧！

自然，中国人民站起来，这是帝国主义最不甘心的一番事。1950年美帝国主义竟派飞机侵入东北地区，疯狂进行扫射。杀害了我们不少同胞。消息传到了天津第三发电

厂，站起来的电力工人们，立刻握紧拳头，向战争贩子进行了回击！

消息传来的第二天，发电三厂全体职工联合署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保证安全供电，用哥儿们自己的手，自己的汗水为国家增添一分力量。信这样写着：——

亲爱的毛主席：

我们看到报载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数次侵入我国东北上空，扫射杀害我们同胞的罪行。这种无耻的挑衅行为，使我全厂职工非常愤慨，我们要把这种愤慨变成力量，加紧生产。现在向您提出保证安全供电，不停电一秒钟，并坚决保证在1950年下半年消灭在生产中的一切事故。同时我们并愿与全天津市的职工兄弟们携起手来，努力生产，壮大我们的力量，巩固我们的胜利果实，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台湾，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并声援朝鲜人民的斗争，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赶到海里去。最后让我们高呼我们亲爱的领袖

毛主席万岁！

天津电业局第三发电厂全体职工

9月5日

过了几天，工会主席一头大汗的跑进车间来了，他喊道：“毛主席来信了！毛主席给咱们来回信了！”随后从这个车间跑到另一个车间。立时，车间里激起一片沸腾的声音。下班以后，在临时全厂大会上，工会主席用他那激动得发沙发哑的嗓音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着：

陈郁同志：

轉来石家庄电业局全体职工給我的信及天津电业局第三发电厂全体职工給我的签名信，均已收到。請你轉告两处电业职工同志們，我謝他們的好意，希望他們團結一致，努力工作，为完成国家任务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奋斗。

毛澤东

1950年9月11日

工会主席的激昂声音剛剛停歇下来。全場頓時响起雷一般的掌声。这个掌声最后化成一种动力，它經常响在工人們的腦海里。党委会抓住这个鼓舞人心的事件，把发电厂帶到一个更新的，更向上的境地中去。在工人們一直干得热火朝天的基础上，健全了負責制、交班制，提高大修質量，提高供电度数，節約用煤，最后在1952年贏得了天津市第二模范厂的称号。

电厂最苦的莫过于地窖子的推灰工了，所以解放以后也以推灰部的变化为最大。

那还是剛解放呢，刘国权厂长（就是解放那天穿青布棉袄进厂的那个同志）便下到地窖来了，他一看哥儿們干活烟熏火燎喘得慌，就說：“这么干活还行，給咱們工人發口罩。”看見哥儿們光着脚板，就說：“脚底下趟水还行，發膠皮鞋呀！”以后，夏天推灰不怕雨淋了，一人一

件雨衣；冬天推灰不怕風寒了，一人一件里外新的棉猴。凡是工作中需要的，像手套啦，毛巾啦，肥皂啦，工作服啦，样样齐备。虽然穿着膠鞋，可是另外，还有水泵嘩嘩地向外抽水。工人們干着活，不觉感动地說道：“想想当初，看看現在，簡直到了天堂啦！”是的，有人已經心滿意足，到了头啦。

但是，党却不这样看。地窖子里的出紅灰問題还没有根本解决呢，还在影响工人們的身体健康呢。于是把除紅灰，和另外的兩項急待要做的事儿，除塵、除氧并列，說这是电厂的三害。京戏里不是有一出“除三害”么？电厂的工人們也要唱这一出新的除三害。不过，除这三害呀，里面可牵扯着很多科学技术問題。

还是从地窖子說起吧：1956年实行了“密閉式出灰”法。办法很不錯，就是在灰斗四周壘成小屋，里边裝上水管，灰下来了，水管把灰噴湿，再推出来。这样一来，紅灰是好多了，唯有一样，工作起来不大方便，因此影响出灰任务，大伙都不願意用。领导同志就动员說：“用吧，这样衛生一些，对健康有好处。”大伙也能体会这是党关心工人們的身体健康，改善劳动条件，用吧。

小屋式的不好使，是不是改个样式就好些，后来又在十一、十二号爐子裝了船形出灰机。效果是半斤对八兩，都差不多。不过，这事說明，为了除紅灰，大家还在一步一步的琢磨着。

1957年冬天，电厂的院子里开始了一项不算小的建筑

工程，要入地十來米，修一座水冲灰的圓水池，搭了大暖棚，冒着風寒冰冻，把工程火速趕完。工人們个个高兴，这一下子要徹底解决出灰的問題了。大伙儿分批地参加劳动，快馬加鞭，爭取時間。到了1958年8月，水冲灰全部实现。好啊，五十年来又苦又累的推灰工人的笨重劳动，完全讓机器代替了。看看这份麻俐劲儿吧，鍋爐燒下来的爐灰，放到冲灰溝里，用高压水冲得烟消灰灭，它乖乖地順水溜进冲灰池。冲灰池上边吊着“捞灰机”，这玩艺儿工人們給它起了个外号叫“老雕”，它把灰抓上来，裝到汽車上，运走了。过去得多少人干活！得費多大的劲儿啊，現在只消一个人开开水門，搬搬电扭，問題全都解决。如果有誰到水冲灰泵房的屋里看看，潔白的屋里，寬寬綽綽的伏着兩台冲灰泵，也許会打趣地說：“要沒有地上的台泵，跟迎面的操作盤，这屋子真比娶媳妇的新房还漂亮！”

守在这間泵房里的，五十开外年紀的赵志清师付（記得嗎，他在領头和“棚楊”斗争的时候，几次遭受暗害，險遭不測！）常常和年輕的徒工們講：“現在要跟解放以前比，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呀！”随后带些教訓的白叻說：“要还是从先那吃人的世道，我这把年紀不是累死，也让人家当一头掉牙的老驢，一脚踢开了。你們这些年青人，沒吃过旧社会的苦，沒受过大累。生活这么美，有些人还不知足，遇見这号人，你們讓他找我来！”

不过，工人們真的并不知足。因为在技术改进，挖掘潜力上，确是无尽无休的。比着水冲灰的办法，現在正在



搞运煤的自动化、机械化。另外，从1959年春天起，哥儿俩又在冲灰池周围种下了各式各样的花籽，经花绿叶，打扮得小花园似的，冲灰泵房的墙上葫蘆架上满是黄花。再过几年，誰曉得这里还要变得多么美。

在除紅灰的战场上高奏凱歌的同时，在除氧战场上也有新的发现。工会生产委员张树强，这人是个技术员，是学化学的，他协助工人李英，这人1952年才进厂，不过高小程度，很肯钻研，两人合作创造了凝結器除氧罐，降低回水含氧量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这样一来，就解决了电厂历史上一直不得解决的鍋爐水管汽鼓結垢問題，省出一台八吨鍋爐燒“生水”，大大提高了鍋爐效率，还可以节省不少高級工业用煤。发电厂的潜力一下子增了好多。而在除氧的同时，叫市民們皺眉苦臉，最膩味的电厂的塵烟問題基本上也解决了。现在只有袅袅上升的輕烟了，塵粉已經通过特别的吸塵裝置，被当做貴重的、特殊的原料来加以处置了，电厂变得更加有本事了，它为国家建設提供了更多的力量。

虽然这个最老的电厂由于地形条件的限制，沒有扩建的前途，但它在挖掘潜力、支援新厂上却做了不少的工作，把多余的鍋爐調出去，技工調出去，甚至連鍋爐的廢热汽也順管道調出去，支援了一家染厂。这还不算，这个发电厂的检修分場修配車間在十年国庆的前夕制造成了一座發电机。多大的發电机呢？6800瓩的。发电厂也能生产發电机，这簡直是奇迹，但是奇迹却就出在工人們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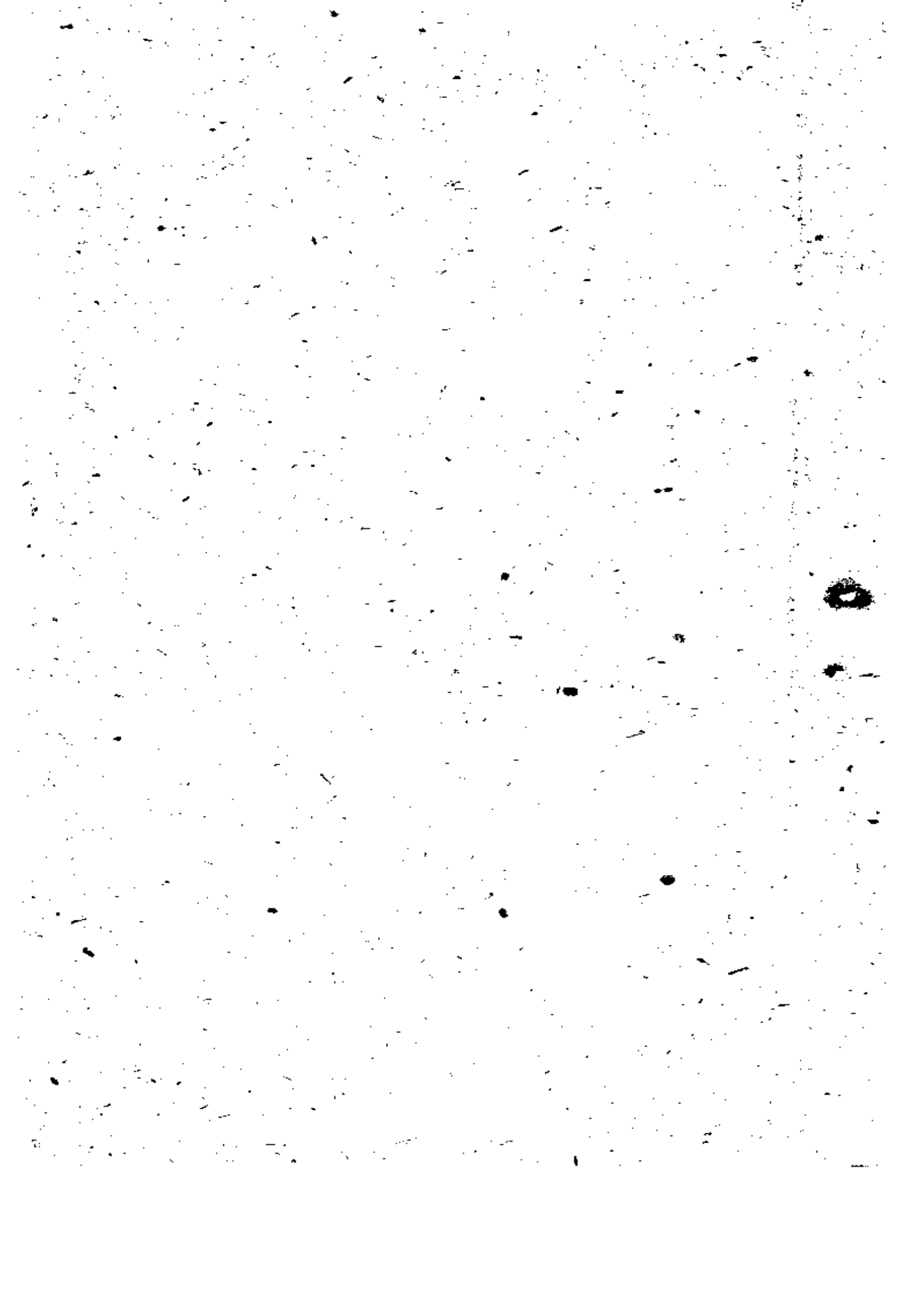
里电厂的工人本来是創造奇迹的人嘛。

（本文初稿由老工人于庆云、宋治国、张恩元、赵志清等口述，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发电三厂厂史編写小組片断纪录。二稿由工厂厂史写作組重新修訂补充并执笔改写纂总。）



下 卷

人 物 志



温兆宾

温兆宾口述

十四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家贫如洗，靠哥哥给人家种地，无法生活下去。我就偷偷跟着跑大棚卖唱的，到处流浪。十八岁那年，才离开大棚，跟乡亲们下天津徬来。投靠了族家的一个哥哥找事做。

没多久，我被荐到金汤桥同发号花场子当伙计。干了些日子，掌柜的嫌我个小力气小，又不会养花的技术，但又碍着族家哥哥的面子，不好辞我，就出了个主意，给我算了半年的工资，花场子不用我了，只是可以在他这儿白吃白住，多咱找着事多咱走。我已经十八岁了，人家看着不中用，自己偏还赖在这儿吃白饭，这滋味实在难受呀。真不比伸手要饭好过一些。

经常到花场子来的有个游手好闲的王三棍。这小子穿着长袖筒的大票白褂子，双道脸的洒鞋，月白单裤还在裤下腿拴着小漂带，他不断的来花场子，转一转，拿点花走。掌柜的见着也不敢说什么，老花匠更是装着看不见。可是等

他一走，老花匠就指着他的后背罵：“真正是臭狗屎。”

我也覺得這小子像個流氓，二流子。

這天，他把我叫出花場子，跟我念叨：“掌柜的不用你啦，我給你找個事由干，你樂意不？”

一聽這話，喜的我把他當成親人。那年月找碗飯吃有多難呀，我就連聲托附他。這話不是冒泡，果然他有路，說：“我介紹你去担河土吧。那兒有窩鋪，管吃管住，到月頭還發工錢。”

先不說錢不錢的。有個地方管飯，我就得念佛呀。轉天，王三棍找我來了。叫我跟他走，可臨走以前，他問我：“你都帶什麼去呀？掌柜的算給你的工錢，你也帶着去呀，那兒可是人多手雜，你可當心別讓人扒了走呀！”

我為難了，“那我存哪呢？”

王三棍胸脯一挺：“兄弟，你信得過我王三棍不？要信的過你哥哥，你把錢交我吧，多咱用，多咱到我這兒取來。”

他說的那樣懇切，再搭上人家給我找的事由，這面子怎好駁呀？我就把錢通統交給他了。

在河頭上担土，那份苦罪我不提，因為想受苦還受不長呢。又是嫌我個小力氣小，把我下了。天津地面這麼大，我可投靠誰去呀？萬般無奈，我又硬著頭皮回了花場子，心想找著王三棍，我先吃那一百五十個銅子兒吧。那曉得這二流子一聽說我找他要錢，避不見面，不到這塊來了。這一來可把我坑苦了，幸亏掌柜的瞧我族家哥哥的面

子，还让我在他那儿白吃白住。

过了几天。这晚上，大掌柜的把我叫进柜房。指着一位穿制服，袖口上配着“稽察”两个大白字红袖章的人说：“小温，你过来见见，这是刘稽察。”说过，又朝这位刘稽察说：“稽察，您总得帮我这个忙，他老在我这儿吃呀住呀的总不是个事。”说过，又一扭头朝我说：“小温，你这叫福星高照，刘稽察介绍你到河北电灯房当小工子去，你还不快谢谢。”

架弄得这位刘稽察哈哈一乐，说：“这好办，只要我一句话。”

真的，凭他疙疸刘一句话，我真进了“电灯房”。有这么个事由不容易，我干起活来就特别卖力气。后来就由短工补了长工，挂匾牌了。

光阴过的飞快，一晃我在电灯房也干了十多年了。一个月的工资由七元五角，升到二十二元五角。我成了顶呱呱的烧锅爐工。当小工子，怎么一来二去居然调进锅爐房来了呢？那是1920年，彭头领着锅爐房的人争双月搞罢工，后来让比国佬给开除了，锅爐房没人，就把我搬过来，为了救急。我这人呢，一向脑子不活，单凭劳动卖力气赚钱吃饭，不会给把头、洋奴送礼。所以把头、洋奴也把我当成派系以外的人，总在工作上抓碴找错，给穿小鞋。平常是哪儿工作困难，把我往那儿调，做好了没好，做坏了那就吃不了兜着走。那时候，锅爐房的把头号称八盟，有八个洋奴把头结拜了盟兄弟，气焰老高，谁敢惹这帮地头蛇

啊。我那时信服这一条：自己干活多加小心，讓你們抓不住我的碴儿。

想不到这天中午，电力負荷渐渐下降了，我們鍋爐房跟着回負荷的情况，把爐子一个跟一个的停下来。爐子一停，当然啦，大伙的活儿也輕松了。把头的盟兄弟大李头吃完了飯，和几个司爐工人围在桌子边，你爭我夺，也不知道搶着看什么东西。好奇心誰都有呀！我也挤进去看，原来是大李头拿着一卷子“春点画”正着呢。那年月，工厂里这玩艺很流行，都是为了麻醉工人的。一股好奇心驱使，冷不防，我一把将春画夺过来，扭头便跑。大李头就在后边紧追。一边追一边嚷：“温繼善，你别找倒霉，快还給我画！叫外国人看見就都倒霉了。”

我一听他怕外国人，就成心向后院外国人那儿跑。我寻思着正吃午飯的时候，外国人不会出来，就連大管家李麻子也不会出来，他睡晌午觉呢。那晓得大李头穷追不舍，嗓門也越来越大。等跑到洋人院里，他和我搶画的时候，忽然間有个女人叫了一声：“干嘛你們不去干活，跑这儿打架来啦！”

这女人叫柳丽华，是比国总办王士賴斯的媳妇，她这一嚷不要紧。我們倆全驚了。春画也不搶了，耷拉着腦袋，赶忙溜了回来。

把头陈金山可抓住碴了，把我們倆叫住：“喂，李大头，温繼善，你們倆干嘛去啦？”看我們毛毛咕咕，他一双賊眼盯住那副春画了，“这是嘛呀？”

我这人实性子，不会編說，实話实說。大李头可口口声声的叫着：“二哥，我剛要放起来，温繼善一把搶走了。他非往后院跑不可，叫柳丽华看見了。二哥，您看怎么办呀！”

我一听这話不对呀，都扣在我身上了，就說：“大李头，你要是不追不嚷呢，你什么时候要收春画呀？”

陈金山那容我分辯。就說：“你們闖了禍，你們自己負責。不要光知道錢是好的。好时候也要給不好的时候下点保險費。我跟外国人报告了再說！”这小子眼睛不瞧我，可我明白，他这話全是甩給我听的。心想禍是惹上了，脫也脫不掉啦，跟他把头沒什么說的啦。我扭头回了鍋爐房。

轉天一上班，洋奴李麻子就派人把我和大李头叫到总办公室里去了。翻譯告訴我們說：“李大头温繼善你們兩個人在班上打架不干活。特别是温繼善不老实，竟敢对着总管太太撒尿，太野蛮了。这里有总管下的条子。大李头是黃条罰錢兩元，發薪扣清；温繼善是白条开除出厂！”

又气又恨，当时我好似掉在万丈深井里了。有心反駁一句，又一想，打架也沒用，反正是小鞋讓人家給穿上了。一賭气，又是二句話沒費，我出厂了。

在厂外，东奔西跑，晃了小三年，別瞧我是好体面的鍋爐工，却是几个厂子都沒呆住。这都是些中国資本家干的小厂子，經不起折騰，动不动就欠工資，就歇业。

有天，遇上老伙伴吳师付了。他說：“老温哪，咱們

电厂又盖新房子，添爐子了，正上人呢；你还不煩人說說，回厂子燒火来。”

我說：“外国人把我开除了，我回的去嘛。”

老吳給开了条道儿。“没关系，現在王士賴斯調走了。你改个名字，那查号去。”

这可好，我馬上托他跟头說說。第二天，吳师付陪着安头和几位过去的伙伴到我家来了。見面他們就給我道喜，还說，“多少年的哥儿們又湊在一起了。”

安头安起順是个老好人。是鍋爐房最老实的燒火头了。和他一班工作的人沒有受外国鬼子气的，他也不用怕工人送礼，也不給大伙說坏話。鍋爐房的工人都希望和安头一班工作。跟大伙好，自然他也得受大把头陈金山的气。后来日本鬼子在的时候，14号爐的鍋爐發生干鍋事故，陈金山抓住这个碴儿，一脚把安头踢开，换上他的表妹夫王庆堂。安头当了修水位計玻璃管的鉗工。这都是后話了。

从这儿起，我一直在电厂干下去。几十年过眼云烟，要說生活最苦，莫苦于日本鬼子統治时期了。那时候电厂改称为华北电业第三發電所，物价飞漲，每月發給的工資一家生活不了三天，發給七八十斤豆餅面，杂粮面，又苦又辣，里面还带着許多老鼠糞、麻袋毛。給穷哥們預备的吃食摊也少了，卖的大半是黑食糕，高粱面掺杂粮面做的，吃一口粘的拉不出舌头来，就这样，人們还得赶半夜去排队，才能买上一斤半斤的。粮食还分人种，大米只許可日本人吃，中国人要是吃了大米，那就犯了罪，抓走以后，

打不死，也得送日本当劳工去。早晨，七点来钟，从金钢桥过，到电厂上班来。瞧吧，见天价都能看见扒得净光净光的饿死的流浪汉，一地排子车接着一地排子车的拉到铁道外小王庄、小于庄一带野地里掩埋。那还有工人們的活路呢？厂子里的工人也红眼啦，能偷的就偷呀。可是，一个烧锅炉的能偷什么呢？没法子，拿命拚吧。下了班，别瞧累成那样，我还得找外活去，当两条腿的畜生，拉“胶皮”车。跑上一天，两腿发直，两脚发涨，交车回来，好的时候，能剩个八九毛钱。孩子们堵着门迎接我，一瞧赚回钱来了，个个喜笑颜开，接过钱去，再赶快去排队挤着买山芋面、杂合而去。我倒在炕上歇一会儿，呆不会儿，又该到电厂上班去了。一个人当两个人使唤，就这么没黑天没白日的折腾。

即使这样苦卖劳力，还是顾不上吃喝。还是饥一顿，饿一顿的。我那几个孩子个个瘦的赛过干柴枯棒。怎么办？还是活不了啊！

我们同厂的，又是住同院，同在一起拉“胶皮”的胡玉清和我說：“咱们都是拉家带口的，老是这么‘抗刀’还行呀？”

“那怎么办呢？树挪死，人挪活，我真恨不得逃荒啊！”

老胡就出了个主意，他有个舅舅在东北开荒种地，他一个人，也需人帮助；要不，下一趟关东，在那儿混碗饭吃。誰去过关东啊？又是这么兵慌馬乱的年代。可是不走又没活路。我老婆就和胡大弟妹，拉扯着孩子们泪眼汪汪

地到东北去了。这些年呀，我没和孩子们分开过呀。送她们走，我的心都裂了，这都是让生活逼的呀，一家人全拆散了。在东北，也没有落住脚，他们又回来了，到头来还是一起苦熬。

熬到解放，你说，我们这些老工人该是多么幸福吧！从一打解放起，我就有这么一个思想，要是不好好干，不加把力气，实在太对不住党了；太对不住那些为了解放我们而牺牲的那些先烈了。

其实啊，我也没干出什么来，可是大伙却都说：“温师傅能帮助人，什么活儿他都做！”咳，我一小就卖力气，劳动是正理，闲着我不习惯呀。我哪有什么奉献呀。

1953年的时候，我们电厂煤种复杂，大量使用的是烟台煤。这种煤可难歪歪，着火点特低。可我们这个电厂又是个尖负荷的厂子。前夜发电量犬，锅炉都是旺火，一进后半夜，就得压火，压火的时间特别长。非好煤顶不住。偏偏我们使的是这种次煤，压得时间长了，干脆火就灭了！年轻人就着急了，这怎么弄啊！跟烧锅炉打了一辈子的交道，我什么煤没烧过，还能让他死煤难住我们大活人嘛？我就出了主意，琢磨出一套办法来，几点几分压火，压多厚；几点几分开，开几道风。咳，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学问，就凭这几十年的经验吧！这一来，倒是有点奉献，解决了烟台煤着火点低的这个讨厌问题，在供电上没受到拿捏。谁能想到呢？就凭这点奉献，居然评我做1953年的天津市劳动模范了。党给我的荣誉太大了，不过，要说最

大的榮譽的話，那還該說是我1953年被批准為一個共產黨員的事。

一個共產黨員應當為黨的事業一直工作到底，現在，我已經退休了，但我還在工人新村裏面辦些街道服務的事。我的心還不老呀，而且時時的想着干了一輩子的電廠，打了那麼多年交道那些大鍋爐。……

(王庭芳 整理)

裴 树 林

裴树林 口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已离开父亲摆了十多年的茶摊，后又自谋生路，在作坊里织布带子了。蹲在囚笼似的小屋里，从早干到夜晚，一个月才拿四块钱。真是憋气。那年我是廿六岁，正在壮年，年轻人谁没有点儿理想啊？有道是树挪死，人挪活，于是自己心窝子里老想着飞出去闯荡闯荡。可是，究竟往哪儿闯啊，没个路数。

有天，我们一位伙伴得了个讯，说是下边租界里的法国洋行招募华工去法国。一个月给22块钱。其中10块钱由洋行直接交给家里，算做养家费用，其余12块钱在法国发，做零用钱。我一听，这事儿不赖，到法国比光守在木杌子旁边强啊。于是四个人一块儿报了名。报了名还得验身体。验下来，想不到他们三个人都不及格，就剩下我孤另另一个了。一个人举目无亲的，干什么去呀！我又犹豫了。他们三个就俏皮我。让几句玩笑话一激，走就走啊！走的时候，父亲不知道，怕他舍不得我走。我是悄悄

溜的。穿着一身衣裳，一个熟人没有，就这样上了路。

我们先到的威海卫。到这儿一住三个月，受军事训练。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受了骗，并不是去做华工的。训练了些日子，从我们这里挑出班长和棚头来，当时是十二个人一棚，一棚有个棚头。大伙为了互相团结照应，于是三棚三十六个人合伙拜了把子，结为三十六盟。大伙对天起了誓，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三个月后，我们坐船到了法国，在××登陆。这一船装了两千来人。到了那儿，有一个英国军官讲话，那几句话由翻译翻过来，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你们东方人来西方，不是叫你到金厂发财来啦，是叫你们打疯狗来啦。你们和我们订的有合同，三年回去……”

正说着呢，忽然一阵警笛响，德国飞机来了。大伙乱窜一阵，把会搅散。第二天，这位英国人又接着说：“打胜了，我们把你们送回去。打不胜，五年、十年、十五年也要帮助我们！”这话把大伙说的一楞。真有那抹不开弯的人，竟有急疯了的。

我们住在野地里，临时搭的帐篷。那些帐篷一望没个边，光这片地里，大概住着有上万人。据传说，前前后后去法国的有十三万中国弟兄。随后，便发军装了，从脑瓜顶直到脚后跟，全是法国军队配备，满讲究的。所不同的是不发枪。不发枪，大伙倒是心里一乐，准知道不让我们当炮灰去了。只是还提着心，怕发橡皮褥子。有了这家伙就得上前綫当担架队了。据说有些华工做了担架队，牺牲

了好多。我們却幸运，撥到后勤队伍里，专门做装卸工作。分人的时候，法国人可狡猾，兩人一排，他从中間一撥，左边去一个地方，右边去另一个地方。他主要是怕中国工人抱团，不好对付。

幸运中最幸运的要屬我們五个人了。不知怎么一撮，湊巧讓一个挂四道的中国官儿瞧見了。他把我們五个叫住，說是你們別去工兵装卸队了，把我們撥到了医院去当衛生員。那时候，我正年輕，虽然瞎字不識，但是記憶力滿好，外国人說話，如果不太长，听上兩三遍，我就能按音模仿，会学舌。讓我办个什么的，准能完成。干了几个月，医院里的大夫保举我，給我写了封信，硬說我会說法国話，可以去应試。这都是哪儿的事，叫我去，我就去吧。到了那里，湊巧碰上厨房的厨师付了，他也是天津人，也是織帶子的。异国遇故知，好啊，我們倆別提多亲近了。他說考試及格就可以給一道，做官儿。于是又教給我兩句英文，順声音死記硬記。第二天就考試了，第三个考的便是我，一問正問的是这几句話。那有这么巧的事，胡七八糟的，我竟当了一个道的棚头，做小官儿了。

干了一年棚头。有回，遇上挂三道的法国官儿，他叫火車門碰破了头皮，硬叫我給他包扎伤口。我那会呀，非叫我来不可。一来沒来好，这小子火儿了，要揍人！你揍人，我一赌气，棚头不干了，衛生員也不做了。那时候，中国人都有这种思想，不伺候你法国人，不受你“小老法”的欺侮，惹我們华工，我們华工有十三万人哪。高低我不

了。他們只好調我到倉庫去。

剛一到法國的時候，法國的軍官可瞧不起中國人了，不是罵就是打。剛一去，唬着洋氣，我們還是真不敢動手。後來，我們工人們摸出門道來了，一個是他們認不准中國人的面孔，二個是法國兵不多。我們就不放鬆他們，再聽到他們罵中國人，我們是伸手就打。而且打的越狠越沒事。這些法國軍官只要頭破血出，你放心吧，登時吓得他們就老實了。有回，我們八個人一齊出去，路上見着幾個法國挂四道的軍官，按軍隊的規矩，我們給他們行禮。他們却連瞧也不瞧一眼，楞沒還禮。沒還禮，我們一商量，這可得教訓教訓他們，頭一個我上去了，給了一拳。跟着我們拳腳齊下，把幾個軍官打的爬不起來。然後呼嘯一聲，一走了事。後來，法國軍官不饒這事，在各隊里查尋，人太多了，到底沒把我們查出來。以後打鬼子官兒竟成了風氣。

但是，也有些人忍受不住這種單調生活，走了另外一條道。私自逃走。這些人下落不明，不知淪落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們是整整熬了三年，終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帶着滿身的病痛又回到祖國大陸上來。

回來以後，父親的茶攤還擺着。倒是我的織布帶子的手藝卻拾不起來了，那就干苦力活吧。因為在法國做過華工，比國佬另眼看待，經人一說，便進了發電廠。

我在電廠里度過了大半生。這半生成天為吃喝犯愁。而且是歲數越大，生活越難熬。特別是父親，六十九歲了，

身子抵挡不住，得了伤寒病，倒在茶摊的木板上，呻吟了几夜，随后断了气。我們眼睁睁地看他断了气，也沒錢請医生給他治。他死了以后，茶摊没人摆了，一根維持大伙活命的繩子断了，日子就更难过了。后来，逼得我下班回来以后，还要带着几个孩子拾煤檢去，卖破爛去。……

这些话都过去了。解放以后，党给了我一个愉快、安逸的晚年。我从1953年起，开始退休了，現在拿着养老金，住在新盖的工人新村里。几个在旧社会拾煤檢的孩子，現在都长大成人。有三个当了国家的干部：一个在包头发电厂当科长，一个在洛阳发电厂当領班，一个在南京电厂当技术員。还有一个儿子在农村，一个儿子在讀高中。他們都过的很好呀。

不光青年人生活得很好，我老伴儿生活的也很好。旧社会里一个又穷又瞎的老婆子，現在也識字了，而且被选为人民代表，街道委员会主任。每天起早赶晚的为群众做些事情。去年还到北京去参加了职工家屬代表大会。真是倒了一个过儿，有时候她出去忙了一天，倒是我留在家裏給她做飯吃了。咳，說起来我也不单是为她做飯呀，我是劳动慣了，做点家务劳动，自己心里也安然一些啊。

(馬鳴丁 整理)

焦 登 潤

焦登潤 口述

我是大城县生人。在农村长大，从小儿就拾柴捡粪，給财主家放羊，成年价累的死去活来，还是混不上吃混不上喝的。随后便投乡亲到了天津。經人介紹，到“电灯房”来了，跑外綫，做电工。做外綫电工，受的那份苦就不用提了。

我要提的是，日本鬼子統治时期，听乡亲们从家乡來說，老家成了“解放区”，鬧穷人翻身，打日本鬼子的事。咱一听，从心眼儿里信服。你想想，咱穷人讓财主逼得做牛做馬，一听到翻身的消息能不高兴嗎？再有打日本鬼子的事，更是可心。乡亲们来来去去，其中，我們老表弟来的最勤，总是定期来，定期走。常了，我就問他：“你光是这么来来去去，干什么呀？”

“做点小买卖呗！”

不錯，那年月跑单帮，干小买卖的不少。只是日久天长，每次来，每次談，談来談去，我摸出我們老表来了。

有他这么做买卖，跑单帮的嗎？一談就是抗日，再談就是共产主义。我心里照影子，这年輕小伙子脑袋里装的都是什么呀？这人有思想，不是为俩錢跑跑顛顛的人啊。

我琢磨他。其实他也琢磨我。因为我特别关心家乡的事，也爱談个革命，談个翻身什么的。他也看出我在这方面有發展，有基础。于是，有回他就照直和我說：“是菜不如老表菜。咱們倆攤牌吧。表哥，你說我是跑单帮的嗎？”

我笑笑。“老表，你总信得过你这个表哥吧，我一輩子就凭手上这点儿汗吃飯！”

点点头，他照直和我講了。原来他是共产党员，每次来都是負責来做采买的。說开以后，他倒方便啦，找个人啊，买个东西啊，經常叫我帮忙。我这人是个架綫的电工，成天长在外头，东游西轉，办起这事来，有时比老表来的还自然，还方便。讓我办什么，我就办，从来沒有駁过，也从来沒有怕过。只是，我心里也沒多想别的，我沒有文化，做不了大事，也就是帮帮忙呗。

直到1945年的春天，表弟这才和我說：“表哥，难道你老是这样嗎，有沒有要求？”

“我还有什么要求？”我挺不明白的。

“这样吧，跟我回家去一趟，你乐意不？”

嗨，这可摸着我的心坎儿了。我說，“我可乐意回去看看啦。”

“这可是秘密。連表嫂也不能知道呀。”

我說：“你放心吧。我跟她叨叨不上這些。”商量好了，我撒了個慌，說是要跑一趟單帶，發點小洋財。我們“內掌柜”一點也沒多心，點了點頭。電廠里的假期也批下來了。我便和老表上了路。

出天津城圈不老遠，我們走進一個小莊子。究竟什麼莊子，老表不說，我也不多問。隨後由他領我進了一個院子。給我找了間小屋，住下來。第二天一早，有個人來跟我說話，一見我就喊：“焦圖志，你來啦。”我應了一聲“來啦！”可他姓甚叫甚，他不說，我也不多問。就這樣，我們聊了一天，從我家里情況一直聊到天津市面，我是連說帶評。為什麼這樣呢，我也有個心思，讓他看看我怎麼樣。

第三天，我們轉移了，又往里去。坐船到了王家疙瘩。在那兒，另有人跟我談話。講了許多黨的綱領，黨的政策。一連給我上了幾天課。

隨後，那位同志問我：“願意不願意抗日呀老焦？”

我說：“當然啦！”

他跟着又問：“你願意參加共產黨不？”

這倒把我怔住。我吞吞吐吐的問：“我夠嗎？我配嗎？我行嗎？”

“老焦，你是老工人啦。看你自己的決心啦！”

我這才結束那種自卑的思想。決心入黨了。……

在第七天頭上，他們用一隻漁船把我送回來了。我和划船的人也沒過話。入黨了，我更懂得機密的重要性了。

船駛進天津邊沿地界，被幾個兵不兵，匪不匪的人把船喊住。這幾個傢伙到船上亂搜一通，任什麼也沒有，就把魚給扣了。看起來，划船的同志早知道他們這點道行，那魚正是給他們預備的。就這樣，我安安全全坐船直到了天津。

從那以後，老表不再來了。另有人和我聯繫，主要是做採買工作，採買工作里，最主要的是買藥品，這工作我幹的是得心應手；這買點，那弄點，一點不引人注意。只是另一個任務可開展得不够快，活動周圍的一些人，都有那些是可以發展的人呢？

凡事只怕有心人。一來二去的，我發現在比國副總辦家裏，那個女傭人叫楊青卿的有點意思。她一連打聽我幾次：“你老家是哪兒，是解放區嘛？”

“是呀！”

她又試探着問：“解放區到底怎麼樣啊？”

我也就試探着給她來點眼藥，做點宣傳，說：“我是不明白。可是聽到這兒來的老鄉說，八路搞的可好啦！”

她還是真愛聽。談來談去，我們倆的話說深了。有道是“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彼此都信得過，彼此都有點思想相投了。

有一天，她悄悄拉我到一邊兒說道：“焦大爺，我有一封信，要捎到你們老家去。你給辦辦行吧？”

“也許行，也許不行。這麼辦，你說說你是怎麼回事吧！”

她和我說了實話，原來她是個赤色外圍群眾。在上海的時候，南漢宸等同志在她家住過。後來事機不密，他們轉移到解放區去，她也就離開了上海，東跑西顛，輾轉來到天津，不知怎麼托人，干了這麼一份侍候洋人的差事。現在她很想和南漢宸同志取得聯繫，或是去解放區，或是留下來工作。

這封信捎過去，不到兩個月，南漢宸同志的信來了。從這兒起，我也和她攤開牌，在一起做了一些工作。楊青卿識字，搞起采買來，比我強多了。

1948年的下半年，天津的街面上，誰也看得出那緊張氣色。國民黨鬧了一次法幣改金元券，物價暴漲，搶購一空。鋪子裏面貨架是空的，鋪子外面傷兵是多的。國民黨就要垮台了。這時節，黨派人來傳達布置迎接天津解放的任務。要多做宣傳工作，保護工廠機器，穩定人心。

宣傳工作很好做，只要這兒沒有特務，你放心吧！十堆人裏有九堆談的是解放了怎麼辦，八路軍到底怎麼樣，我就利用一切機會盡量說起來，“我是沒見過，可我們老家常有人來，要是聽他們來的人說嘛……”

天津臨解放的前一天，我的宣傳工作也告一段落了。只差河西還有家親戚沒去說過。我一想，西頭轉電站是我做工的地方，我還該到那兒看看。炮已經打得很緊了。到那兒一看，好呀，國民黨扯了多少根電綫，燈光賊亮賊亮地，照得四外像白天一樣。在燈光下，一道道電網攔得嚴嚴實實。咱們解放軍攻城的時候，這玩藝可就太礙事了。

能够讓他們点着电灯打仗，电網子电人嗎？我腦子一轉，赶快跑到轉电站，掏出鑰匙，打开鉄門，蹬上小樓梯，双手握住閘柄，往下一拉。唰的一声，总閘就讓我拉开了。西头馬上黑成一片。我这个高兴啊，仿佛我眼睜睜地看見解放軍冲上来了，进吧，沒挡头啦，电網全沒电了！这真是我有生头一遭这么高兴。不过，只呆了一会，我馬上就把門鎖上，乘黑溜走了。

第二天天一亮，天津解放了，滿街都是市民，大家都从隐蔽的地方出来看解放軍。我也露面了。

消息馬上傳到了工厂。工人們都奇怪，大伙嚷着說：“真人不露相啊。看不出你倒是地下工作呀。”

我說什么呢，只好呲呲牙算了。

連我老伴也斜眼睛了，白我几眼，一連啣了几声。說道：“真沒想到，你这么个一扁担压不出个响声来的鳶貨，还是个老八路呢！怪不得从老家一来人，你就朝外面哄我們呢！你怎么不早告訴我呢？”

瞧她这大惊小怪的劲儿怪有气。我說：“好嘛，早告訴給你們，还有我嗎？那还算什么地下工作呀。”……

(曉霖整理)

于庆云

于庆云 口述

我們是道地的天津人。而且就是电厂左近，獅子林一帶的老住戶，我父亲是眼瞅着电厂盖起来的人。他是油匠，后来經人介紹便到电車厂做长工了。我小的时候，順着河坝找生活之路，撿馬鬃，打“小鬧”。后来大些了，便由父亲煩人，也把我带进电車厂来了。子傳父业，也是干油匠，帮着擦車。我由小儿就爱惜父亲的那几把油刷子，刷出来，要紅便紅，要白就白，任怎么髒啊，旧啊，破啊的东西都能变得漂漂亮亮，看着心里痛快，特別喜欢。干起活来真入迷。要是干得“草鷄”一些，不用人說，自己先憋得慌。又受我父亲的影响，懂得做活的不怕出汗这个道理，凡是上岁数的师付們，有个登梯爬高的地方，我总是搶着来。大伙也說：“这孩子是好样的。”那年月，咱們工人是給比国佬干，誰肯卖力气啊，都是比划比划，点到即止。特別是打夜班，有几个睜眼干到底的。我那年才十四岁，熬一宵也够嗆。有天，擦着擦着車，我在上面打盹

儿了。偏也巧，讓工头瞧見。这小子心里早憋着碴儿呢，嫌我楞头楞腦，不懂得巴結他，不給他送礼。于是悄悄跑到洋人那里，給我上了个报告，借刀杀人，竟把我开革出厂。大伙一听我被革了，都和工头鬧騰起来，說他：“这么好的孩子，你这么办，太缺了！”工头也会裝蒜，說是原来不过是想吓唬吓唬我，那曉得真給开革了呢！鬧也白鬧，再搭上那年月脑子里有这么一种思想，凭手艺吃飯，不低头不求人。走就走吧。

可是，过了一年，我又回来了。是大伙說的，“活重，叫老大回来吧，那是个好孩子。”我父亲当然乐意，我就又来擦車了。見天見擦車完了，一下班，年輕輕的工人們，专有一帮子坏人勾引，出电車厂不远就是六合市場，那儿有下等娼窟，有人就到那里打茶围，寻欢逐乐。有些才十七八、二十上下来岁的工人，居然鬧上花柳病，把一生都糟塌了，旧社会那真是到处安排陷阱，除了剝削、压榨工人之外，还給开这么一条腐爛人們的坏道。来来去去的熟了，有住在厂子里修閘瓦的孙师付，他就囑咐我：“可別跟他們一道混。一走那条道，这一輩子就完啦。要爱惜身体。来，跟我侄子練武吧！”他侄子練杠子很有名，还出过国。从这儿起，我也跟着練上了，那时候还真不含糊，十八般武艺，那样都能来兩下子。可惜，沒有練长。这倒不是我沒恒心，是生活条件不允許。要鍛煉身体，在那年月，沒錢沒閑功夫怎么能行？

不过，就凭这点不到家的拳脚，居然給咱們工人做了

点事。1929年鬧罢工的时候，領着一撥糾察队，截住圍堵电車的便是我。我那时的名字叫于世清。二一次，1932年鬧罢工，复工以后，我們工人里，选了一撥人保护张广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可惜那次我没遇上暗害广兴的那撥子地痞流氓，要不的話，可是有熱鬧瞧了，兴許出了人命。

給大伙出气的是这么一回事。张广兴不是遇刺了么？好哇，工賊刘治倫就派他手下的那些腿子們，車厂电厂到处吹風，說张广兴是蛤蟆伸腿强撑劲儿，不行啦。說要搞工会得跟着他們。乘这机会，要倒我們的工会。我們就和他們理論开了。大伙支持我們，不支持他們。这些小子們有官面势力，有买办林子香給撑腰，于是就买通了門口的警察注意我們，刁难我們。

这天，我們正察車呢，警察上來了，繞处检查。我心里納悶，这怎么啦？就問：“你上車找什么？”

“說你們藏着刀子，要打群架。”

“誰报告的，你翻吧！”

沒翻着。警察下車了，斜眼和我們說：“你們可老实点。”

我們一寻思，这准是工賊刘治倫他們給使的坏。倒提我們个醒儿，我們就留神了。晌午在喝茶的地方，这些小子們又在吹風：“张广兴完蛋了，誰跟着他，誰倒霉呀。”

我們十八个人一忽拉子把他們十二个人围上了。我揪住一个問：“你說什么？誰要倒霉！”

这小子喊了一声，“你要倒霉！”过来就揍架。

打架他們不是个。我一冒火，抄起一个斧把，照那小子就砍。砍起来的时候，我心里一动，这一斧子下去还有他的命哪，临时换膀子，斧把改做刃背了。就这一下也够噲，这小子脑袋开花，鮮血直冒，立时暈倒在地上。

吓得这些工贼狗腿子們就要跑。跑，跑哪去，我們抄起火筷子，抄起什么合手就抄什么。砍来砍去的，直到有个穿黄衣服的来拉架。我也沒看清他是誰，伸手擰了一个嘴巴子，竟从这边把他擰到那头去。他这才喊：“你們怎么連我也打，我是巡长，我是拉架的。”

一怔神的工夫，两个警察把我揪住。我說，“你揪什么，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庙。打官司咱們走。”

厂里厂外，好哇，称得起是人山人海，到底官面儿相着他們，把我們十八个人用繩牽着，他們十二个人空着手，到派出所去了。搵也白搵，那些家伙們头破血出，反正是吃了亏。

在派出所里，那个狗官更是买卖人的秤砣，一头沉。和我瞪眼珠拍桌子嚷：“你們要造反哪！我要重办你們！”想唬着我們，把事了啦。

我說：“去你一边的吧！办不办，你管不着！我們打官司去。”

“你們犯大罪了，你知道不知道？”

我說：“犯多大罪，你尽管写。你越写得狠越好。我們不在乎。事情你管不了，你別吹胡子瞪眼的，少給我們来这一套！”

巡长吃了一个大高脖，这家伙把我们送公安局了。用卡车装我们走的，五个警察拿盒子枪押车。到公安局里却变了个样，把他们几个头破血出的伤号倒摺在外边了，我们却到屋里坐着歇凉。看监的警察还直说，“吓，这么大热天，小哥几个怎么干这事呀，你们为嘛呀。”

我们就怎么长怎么短的，从打电车罢工那儿一直说到今天的事儿。一提电车罢工，那是全天津市没人不知道的事儿。连警察也挑大拇指，说：“你们哥几个是好样的，喝水不，我给你们弄点去。”他还出主意，“要是喝水，就得吃东西，吃足喝饱了，好顶足劲打官司呀！”我们也说对。可是那来的钱呢，这倒不用操心，我们工会早把钱使过了。一布袋子的烧饼跟着就送过来。怪不得警察偏向着我们呢。

那几个工贼狗腿子倒是捣邪霉了。事情闹到这份上，比国佬跟林子香不肯大把儿使钱，没有我们来的快。看着我们又吃又喝，他们在外面晒太阳，又是头破血出的，格外口渴，就凑到自来水管子底下，喝凉水。喝凉水也不行，警察就骂他们：“他妈的，那水是给你们喝的。”顺手就抽了孙××两鞭子。这条狗当时叹了口气，和那几个人说：“咱们这是何苦来呢，到处挨骂，受这份洋罪，刘治伦跟林子香也不管不问了。”哈哈，这小子也后悔了呢！

从公安局又把我们解到法院。临上车的时候，司机也说：“你们哥几个是好样的，我给你们开快车，五分钟准

到法院。那几个小子，讓他們坐悶子車，大热天的，烤着这些冤崽子們。”我們明白，連司机这儿，錢也花到了。

到了法院，法官問了几句，来个當場取保釋放。司法警跟我們出来，扯着大嗓門就喊：“你們可找保呀，找不着，押監！”

我們就悄悄和他們說：“辛苦一趟吧，你們老兩位。取了保，我們得謝謝您。不能讓您白跑道。”

司法警一看我們这些工人懂行，也就不嚷了，只是說：“快走，快走。”

那年月，全天津市干电料行，做修理电灯电綫业务的，沒有一家不和电車电灯公司职工勾着。而且有不少職員、工头在外面就开着小电料行。他們都干偷电的业务。所以我們找电料行打保，一找一个准。我們坐車奔南市了。就在我們一位同事开的电料行里取了鋪保，又借了四塊錢，一个法警兩塊，算是把事情了啦。

从这起，我們可失业了。公司以聚众斗毆为名，把我們兩边三十多号人全开革了。这是我二一次被开除。其实，开除事小，比国佬跟林子香搗鬼，那才是大事呢。他們暗含着把那十二个打手养起来了，还叫他們出头告我們，打算用这个办法，連张广兴在內，一起都咬进去。我們也不含糊，工会暗中支持我們，也和他們沒完沒散，到法院傳訊的时候，我們就找了个开业的大夫，开个有病的証明，这次他們几个有病，下回我們几个又不舒坦，泡来泡去，官司也就不了了之。旧社会的事就是这样。

买办林子香一看咬我們咬不住，他就另出花招，叫那十二个工賊打手上班复工。事机不密，早有人給我們送信来了。預先商量好，工人們在里面往外打，我們由外面向里打。反正他們不能上工。这些小子們讓我們打怕了。一瞧見我們在厂子外面等他們，扭头就跑，复工沒复成。后来在电厂、公司都讓我們堵过。这些小子想换个地方复工，也不行。我們只咬定一句，只要他們复工，我們就得复工。

这节骨眼上，国民党市党部又出头了。調解的人是国民党市党部委員邵华（这人在1946年做过天津国民党市党部主委），由他出名，由林子香付賬，在登瀛楼飯庄大摆筵席，給我們兩方調解。有道是会无好会，宴无好宴，我們十八个人为了防备一手，特地坐膠皮車去的。选这么大的飯館子是头一遭。連站崗的法租界巡捕都看着扎眼，竟問：“你們是干什么来的？”倒是飯庄子人摸底，說道：“是給他們了事的。有市党部的人。”这才算沒干涉我們。

坐在飯桌前面，又是清蒸白鴨，又是紅燒魚翅，可我們兩只眼却尽着搜索，生怕他們有埋伏，到時候再給我們下了手。这工夫，邵华站起来了，把酒杯一举，开言道：“看我邵华的面子，得啦，你們都是工人，自家兄弟嘛，也別說誰挨了打，誰打了人，我給双方調解。我喝你們大家一杯喜酒吧。”說罢，腦袋一揚，一飲而尽。

跟着，林三林子香也站起来，假門假氏的，他也举着酒杯，說道：“邵委員，我不能駁你的面子。都听你的

啦。”也是咕嘟一口，一飲而盡。

那邊也說了話，他們有人莽着，自然樂意和解。我們十八個人一看，這是硬打鴨子上架。不哼聲，光在下面用手你搥我，我搥你的。

邵華以為這麼大的飯莊子，這麼豪華的酒席，特別是他這麼個人物在這兒一擺，把我們唬住了呢。就說：“要是聽我的，我給出個主意，你們兩邊都不要爭竟，讓公司盡量准許你們复工，挑誰就是誰。”

我二虎頭的脾氣，這時候忍不住了。霍地一下子站起來。原來也想說幾句客氣的話，可是舌頭不受使，一說話就倔他老大一塊的。“要是這樣，你調解不調解不吃緊。要复工都复工。由公司挑，他們一個也不挑我們。我們還是法院解決。”

氣得邵華把桌子一拍。嚷道：“到法院你們就能解決嗎，你們有罪，你們明白不明白？”

“有罪法院治罪，你不用操這份心！”

這時候，我們又有一位站起來說話了，就講：“我們都是工人，粗魯人，不會說話。你別生氣。今天承邵委員出來和我們出面調解，你這麼大的面子……”

我嫌他這話太軟，登時插了幾句，“別忘啦，有句老話，露多大的臉，現多大的眼！”

氣的邵華又一拍桌子。他叫起來：“我不管你們的事了！”小臉兒鐵青，酒沒再喝，菜也沒吃。

活該。我們哥幾個是魚啦，肉啦，風卷殘雲，吃完了

赶紧都溜了。

不过，跟他們干到底，我們就不行了。刀把攥在人家手里，我們那儿講理，那儿說話去呢？张广兴被捕的当天，一早晨，我們見天見碰头的那个工会秘密所在也讓警察和便衣抄了！恰巧我守在那儿。在網的难逃，本来也要帶我們走的，有个便衣說了这么句話：“他們大字不識，共产党不够資格；都他媽的穷光棍，逮他們干嘛呀！”算是網开一面，只把我們赶出来，把房子封了。

沒了头儿，沒了工会，也不好斂会費了，我們靠工会那倆錢活不下去了。大伙儿就說：“咱們也各奔西东，找自己的飯路去吧！”

飯路哪那么好找？我一想，找公司去，跟买办林三要养老金去。林子香听說是我来啦。居然把我叫进他屋，請我在沙發上坐下，笑嘻嘻的說：“你要回来，还可以呀。你要早听我的，够多好。”

我懂得他話里有話，就說：“我是个工人，拉大伙的肉贴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討愧呀。我不能那么办。你給我养老金吧！”

看收买不了我。他还嘆口气：“你是傻子。我留不住你啦。这倆养老金够你吃几天的。”

我吃养老金干什么？我还是耍手艺啊。在外边干零活，干来干去的，瓦匠头王四把我找到电厂来了，在这几千包工活。一进厂，大伙都認識我：“这不是糾察队的于世清嗎，这不是斧劈工賊的于老大嗎？”都說：“你在这儿

干不长。”

可不，馬上讓比國佬知道了，把包工的王四找了去，說：“他要是在廠里鬧事，你可得負責任。”

王四一拍胸脯，“我使喚的人，你放心，不好的我不要。”

我又不是在廠里做長工和短工，是跟王四來做包活。比國佬也管不了。也就不問了。

由這開的頭，電廠裏有什麼油活，漿活，經常的王四就派我去，我裏頭淨是熟人，干起活來方便。有回，是給新來的總辦家油葡萄架，我一個人連踢帶打。那個總辦看我干活認真，又叫我到公司去刷房子，刷漿的時候，他經常去看，哪時看哪時我都在工作。這天他竟在下面喊：“木須趙！”^①吓我一跳，還以為是那兒活做的不稱洋鬼子的心了呢。後來趙翻譯進來把總辦的話和我說了：“看你很眼熟。你工作做的不錯，你在那兒做過活兒，”我連忙順梯子下來，實話實說。

剛說了兩句，趙翻譯便把話接過去了。他給圓了幾句謊。還說：“外國人想補你長工，你得改個名字。”人家這是給我開道。我當然連忙點頭。從這兒起，我改名叫于慶云了。

一晃在電廠裏干了小三十年。這三十年，說起來慚愧，我沒做什麼事。只是因為干油漆活，和木廠子熟，遇

^① 法文趙先生的意思。

上电厂里的工人有办白事的，我就热情地去给他们张罗。也就因为做这些事做多了，解放后，成立我们工人自己的工会时，居然把我选做了工会劳保委员。我一听，头大了，党委书记曹化一和我說：“老于，你给大家办点福利事吧。这不比先前好办多了嘛？”是呀，好办自然是好办多了。不过，我常想一个老工人对国家难道就只这么点贡献么？說起来，我实在觉着讨愧呀！

(苏舟整理)

于文富

于文富 口述

拾煤檢，打“小關”；
沒有事，上河堤，扛大个！

这是一首儿歌，六七岁的时候，我們成天唱着去干活儿，这正是我們童年生活的写照。我六岁的时候就已经懂得拾煤檢了。打“小關”是怎么回事呢？是給有钱人家办紅白事，去那个打旗的，拿雪柳的小孩。穿一件紅衣或白衣，脑袋上系个髮結，拖拉着一双破鞋走上一趟，有时可以对付一两斤棒子面。

七岁的时候，我父亲拉膠皮，拉上了“灰兵”，拉到地方他不給錢，朝他要，他解下皮带把我父亲抽了一頓。父亲的胳膊被抽得脫了环，連車也拉不上，便提着洋鉄罐，用一只手抱着我弟弟要飯吃。媽媽总是一夜一夜地出去挤面子。当然，挤的不是白面，而是一些發了霉的使人难以下咽的麸子面，草籽面什么的……人們吃下去迎風一

吹，就覺得身子打晃，而且是吃多少拉多少！

別瞧我岁数很小，却是出人意外的懂事儿。那么小的心眼里，光想着給爹媽分憂，想法子賺錢养家，別挨餓。

看胡同里的孩子們上学很眼热，爹媽也巴不得我念兩年書，将来好多少儿做事的本錢。于是在我九岁的时候就上了学。那是一座貧民小学，是有錢人家办的慈善事业，連課本都不花錢。可是就是这样一個不花錢的学校我也上不了。仅仅几个月，我就不能上了。为什么，因为不能餓着肚子上学呀。沒法子，我还是撿煤核，打“小闊”去。

上河坝扛大个那年，我是十二岁。个儿小，那时，扛洋面口袋每人得扛兩袋，合88斤，我个儿小，一个人背不了，就拉着我弟弟一塊儿去，一人背一袋。說起来，我弟弟比我还苦，他上碼頭背面的那一年才八岁呀！一袋面压在他肩膀上的时候，真是从心口里挤出来的声音，“哎哟，哎哟！”我們哥倆伙背兩袋面，算一趟。一趟賺多少錢呢，賺一个小銅子。我們干一天才賺十五六个小铜子，合七八个大枚。苦哇，真是苦得不能再苦了。

但这还不是頂苦的！我們的房东是个在法租界当巡捕的，这家伙不好惹，因为我們住房子交不起租錢，他立逼着讓我們搬家。正大冬天的，搬出去，連第二宵都不用熬。全得冻死。亏了鄰居們好說歹說，房东算是积德修好，把那間女厕所租給我們了。这間小棚有大桌子那么寬那么大。我們鋪些稻草，六口人挤在里边打“通腿”。那真是难受，誰也不能翻身，而且一个人的嘴紧对着另一个

人的脚鴨子。也不用說被怎么破怎么薄了，因为我們根本就沒有被，蓋的是稻草。有个破棉袄，誰冷的最厉害就給誰蓋蓋。

穷到这光景，有人見了老远就躲。我还記得清清楚楚，有个同院喝破爛的小販，他看着我們特別不順眼，說的是我們的穷气能伤人。在院子里罵大街：“你們还活个嘛呀！死了埋地里都不生芽！”人穷嘴短，我們听了也不敢回声。我父亲是个老实人，有話只会往肚里咽。母亲更不敢講什么了。但是越罵她越硬气，經常跟我們說：“咱們人穷志不穷。”要不就說：“还能总穷嗎，还能把穷人都餓死嗎，別說人了，連大糞不是还翻翻身嗎。”母亲說的对呀，她一直这么乐观，我們要活下去的意志可是强哩。

不过，那样吃人的社会居然逼得母亲也寻了一回死：那是我二十岁的时候，剛剛被同院鄰居范师付荐进电厂做推煤工，一天，我父亲出去了一天一宵，沒見回来。那年月日本鬼子到处抓人当劳工。急得我們一家人坐臥不宁。我連忙到賈家大桥左近去打听，那儿有个人市，我父亲是到那儿卖短去的。碰上熟人了，他是和我父亲在一道的。說是那天剛到賈家大桥，沒留神开来一輛卡車，日本鬼子帶着“杂霸地”下来，見人就抓，我父亲五十多岁的人了，跑迟了一步，眼睜睜地讓他們抓走了！这話像一桶凉水，澆了我个渾身發凉。我竟忘記我是怎么走回家来的了。

到了家，我赶紧把眼泪抹干，硬着嗓子和我母亲說：

“人家雇他做工去了，得呆些日子才能回来呢！”說完了，我又坐不住，站不住地，跑出家門口，見着他那么大岁数的我就紧盯几眼，恨不得一下子把他找回来。但是找不着，似乎也并不意外，因为我早明白讓日本鬼子抓了劳工，那还能回来。回不来了！

瞒到第六天上，母亲已經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就是不猜，她也会看我的臉色啊。她問我：“你爹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忍心瞒你娘嗎？”

等她知道了，急得賽过瘋子，拉扯着弟弟們往外跑。足足在外面找了一天一夜，最后，她来到东馬路，心一窄，扔下弟弟們，竟一个人往电車軌上扎。幸亏当时行人很多，还没等她跑出去，被一位要飯的老大爷手急眼快地揪住了。她这才算是沒有死。

大伙都劝說我母亲：“不管怎么样，你也得把这几个孩子拉扯大呀！”

我們一家人哭哭啼啼的回到家。在家里呆了几天，一个穿大褂的，臉皮白晰晰的先生到家来找我母亲了。他說：“我是新民会的，听說你男人被抓走了。不要紧；他大概是在滿洲国。我們現在正招人，跟我們去吧，做几个月的工再回来，好賺錢养家呀。我是可憐你。”

“那我孩子怎么办呢？”

“讓鄰居們照顧照顧，几个月不就回来了嗎？”

母亲更沒主意了，留下来沒活路，走吧，又怎么放得下这几个孩子呢？我說：“新民会还有好人？咱們不听那

一套的，死也死在一塊。”

母親也說：“對呀，死也死在一塊。”

“大樹”一看我母親不活心，後來也就不再來了。如今想起來，我還后怕呢。他是打算把我母親騙走，賣了。那年我母親才三十多歲的年紀。那真是人吃人的社會呀！

從這以後，一家重擔都壓在我們哥幾個身上了。苦熬活熬一直熬到解放。解放以後，真是應了母親那句話，我們算是翻身了。日子一天天好起來，我們不再住廁所了，我們也住上坐北朝南，有玻璃窗，陽光充足的大瓦房了。而且，解放一年的光景，1950年我竟然結婚了。說起結婚，年輕人覺得這還不是理所當然的事，還值得一提嗎？在舊社會，電廠里七十多號推煤灰的工人，除了班長趙志清有家小，一律都是窮光棍。一提是推灰的，誰肯嫁過來挨餓呀！要不是解放，我們能結婚嗎？

畢竟婚姻事小，我們學本事是大。從1953年起，連我這笨手笨腳的工人也調進鍋爐房來了。過去推灰的要進這門口，摸一點技術，不花錢送禮，不爬門子窗戶，怎么能進得來呀？這都是黨培養我們哪！我現在不光是一個司爐工，而且司水，吹灰，哪兒缺人哪兒去。我真感激黨呀！

對於一個工人來說，當然不光是感激黨就完了！更重要的還是要不斷提高覺悟。說實在的，我是在通過黨課學習之後，心里才豁亮的，才懂得了黨的偉大。到這時候，我才覺得真正翻身了，不光是生活翻身，技術翻身，而且

在思想上也翻了身。使我有了奋斗的目标。

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就是在1953年年底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员，我愿意终生忠心耿耿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江成贵 整理)

馬 增 惠

馬增惠 口述

我生在天津市滄縣東關村一家佃戶家內。爸爸和三個哥哥給當村的大地主馬閻王種着三十畝水淹老碱地。這那裏是人種的地嚮，十年九不收，倒是碱棚棵長的很好！不管收成好壞，馬閻王收租子可是決不含糊，有的交，沒有的也要交！我們一家七口人，終日吃不飽肚子。夏天，媽媽、姐姐帶着我往東南洼地裏去打碱棚菜，拿回家來和米糠高粱面摻在一起蒸着吃。冬天更苦，一家伙蓋着兩床破被，穿不上一件不露肉的棉褲袄，吃的是山芋叶子高粱面粥，我們一家人养的都有一個特點：渾身沒有一點肥肉。村里人管我們叫“瘦馬”。可不嗎，我和三個哥哥都餓的粗干柴棒式的，一層薄薄的黃肉皮包着干硬的骨頭，凹着腮，顴骨露在外面。刮大風的時候，人家都替我們擔心，生怕被風刮上天去，再掉下來摔死。

儘管生活這麼苦，爸爸還餓着肚子讓我上了兩年學。在村里的私塾念了一本三字經，十歲的時候因為實在上不

起學，只好放下書本，到大地主馬闊王家去放牛。一個十歲的孩子，成天價沒黑夜沒白天的，一個人陪着幾頭母牛和小牛犢子在荒野里過活。看着那些小牛犢子偎着母牛在草地里吃草，我真眼熱啊。它們在吃的时候，我還得孤零零的打草，晚上掙回來好給牛準備冬季糧。活的真是淒涼透了。

到我十五歲那一年，碰上了少有的大旱，一場雨沒下，沒收成。一進秋，又飄潑似的大雨連澆數場。秋苗被大水淹沒，庄稼地是一片汪洋。乡亲们們都逃荒出外了。我們家也是一樣，地不能種了，牛沒處放了，一天吃不上半碗粥，逼得非找出路不可了，于是就由父親煩人寫了個信，叫我到天津來找我們一位本家族叔。由他介紹我到振興成鐵工廠當學徒。

振興成鐵工廠的買賣還不小，是專包修建工程的包工大櫃，鋼筋、鐵梁、水暖汽管、白鐵活、瓦、木、油漆，能承裝全活，養着六十多名各種工種的長工和四十多名徒弟。大部份都在櫃上吃住，到月底拿一點薪金，干活不計時間，也沒准地方，說走就走，到處做活，沒有帶家眷的。經理姓黃叫黃振華，矮胖子，皮膚很黑。手里拿着個粗藤子做的棍子，看誰不順眼就抽誰兩下。手下還養着兩個打手，專門欺侮工人，抓碴打架。不過，最厲害的還是黃福榮黃大監工，他是經理的侄少爺，這爺倆長的都一樣矮，一樣黑。見了我，問過幾句話，打了個鋪保，在一張写着“不守規則打死無論，因故投井、跳河、丟失，廠方概不

負責”的合同保證書上按了手印。随后由“侄少爺”把我潑到管子匠那一組里去。而且給我起个名儿叫“四馬”，是根据我姓馬行四这样起的。那年月，当学徒的不許起名字，都是这么个类似貨物标号的称呼。

先还以为在工厂学徒，不管怎么說，也得比放牛强。其实啊，做佃农是苦，做工人还是苦，无冬无夏的，白天在加工現場干活，夜晚我們四十多个学徒的睡在洋灰地上，一床薄被連鋪帶盖，朝身上一纏，真是越睡越凉越硬。天不亮就睜眼，一睜眼就起床，一起床就得給师付买点心，倒尿壺，稍微不如意，师付們就連說帶罵，連踢帶打。那年月师付們有气沒处發，淨拿徒弟当受气包了。受这份折磨的时候，我想，如其侍候人，还不如侍候牛呢。但这还只是小磨难，要是挨上黃家爷倆的藤棍子，那真是把徒工們打的鬼哭狼嚎，真狠不得有个地縫能躲躲才好。

記得有一年开春了，忽然天一反复，刮起嗖嗖的寒風，又下起鷄毛似的大雪来了，海河的水也上冻了，足有二尺来厚！这么冷的天，我爬到东亞毛呢厂三層楼頂上的脚手架上干活。光穿着一件空心破棉袄，吹的我透心凉，手脚全冻麻木了，鋤釘子的錘子拿不住，一个劲儿往下掉。我就兩手往袖口里一塞，想暖和一会儿再干，誰知道就这工夫，被“侄少爺”看見了。他喊道：“四馬，你他媽的又要滑不干活，兩手抱肩膀，干什么？”

我并不是偷懶不干活儿，就解釋了一句：“我总得暖和暖和手啊！”

“好小子。四馬，你下来！”

“上边活还没干完呢，我下去干嘛？”我两眼紧盯住他的藤棍子，提防他揍我！

“你他媽的敢叫劲不下来！”这家伙气坏了，拿着鞭子就往三層楼上来。

他从那边上来，我却从另一面下来了。气的这黑猪在脚手架上大喊：“四馬，站住！不許你动！”

我不敢再跑了，可我也沒有老老实实等着挨打。我就往瓦匠师付那边靠。等他下来，拿着哭丧棒，气呼呼的，那真是往死里头打啊，揪住我的一只手，一棍子抽在大腿上，打了我一个坐墩。

冷不防，有人出来說話了。那是做瓦匠活的謝师付。他說：“大冷的天，少先生，可不能这样打他呀！”

他才不听这一套呢，掄起藤棍，照我又打。他們这瓦匠組是包活，另一碼子事，不屬他柜上管。师付們看他蛮不講理，就跟他吵起来了。由說到罵，由罵到打，倒沒我的事了。瓦匠师付全出来了。一个人拿着一把瓦刀，把黃福荣围在当中。他們嚷：“你別仗势欺侮人，我們瓦匠不服你的管。来吧！”

这工夫，黃振华坐着包月車，兩個打手，一个推着車背，一个拉着車把，正好赶来了。姜是老的辣，这老小子一看引起了公憤，他黑臉上泛笑，立刻說道：“誤会，誤会，都看我了。干活要紧。”他也是怕包工誤了期限，好說歹說，总算把事情揭过去了。

我廿岁那一年，几个师兄弟和我都該出师了。掌柜的想賴着不讓我們出师当然办不到。可是，他会耍花招。挨了他这么多年的打，又給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牛馬，他却說，你們出师得謝师，要大摆酒筵，請請大家。这是历来的規矩，我們也不能例外。請那些客，吃什么，这都不用我們操心，他都給办了。那天吃了十好几桌菜，凡是掌柜認識的人都来了。大吃八喝一陣。临完事，掌柜的把我們几个叫进去，說是这謝师的酒得我們花錢，柜上給垫上啦。錢不能不还，怎么还呢，这样吧，为这桌席，我們每人再給他白干半年。一頓飯得流我們半年的汗，这也是老例。真是剝削得还有份儿嗎？不过，他也只能再吸我們半年的血。半年一过，他要留我們当师付，給工錢。我們認可別处找路去，到底也沒有留在他那儿。

在外面干了短时期的活，1942年我煩人說合，进了电厂，在修配場工作。大把头于长有把我派到他的打手王世昌手下做活。我是新来的工人，外面的处世經驗淺，再搭上生活很困难，不懂得“溜上”，不懂得給把头送礼，光知道成天低头干活。因此修配車間的大小头子都恨上了我，暗地派人監視我，雞蛋里挑骨头，故意給小鞋穿。虽然穿小鞋了，为了糊口，哑叭亏肚里咽，我从来也不声张。人們常常笑我：“瘦馬瘦的都沒火气了。不敢說不敢道的。”

越躲事越来事。在那人吃人的社会里，有句俗語說得好，“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有些人真是踩在腦袋

上發坏！1943年春天，这天我正干着活呢，就听背后有人站在不近不远的地方，用一种又让人听得見，又不让人听得見的嗓音，往外摔打話儿：“于头，你看这裁人的单子上也真怪，为什么朱桂生的名字都有，就沒有瘦馬的呢？”

我回头一看，正是把头于长有跟他的軍师，外号叫蛤蟆秧子的工賊赵恩元在叨咕呢！于长有故意把嗓門提高，說声：“把他也填上吧。”

我一听，这不糟了嗎，赶紧找朱桂生去。朱桂生綽号朱大炮。他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快下班的时候就堵着把头办公的那間小屋罵了起来：“他媽的誰要想吃独食，我跟他白刀子进去，紅刀子出来！”

打手王世昌出来了。意思是要問問他罵的是誰。朱桂生是敢說敢干，提起个大刮刀，还是罵罵咧咧：“他媽的不怕死，来呀，我給他个一刀脖子齐！”

这一来，把几个小子吓唬住了。誰也沒敢噉声儿。事情竟这样了过去。

第二天，連这点毒也种到我身上了。傳下話来，我被裁了。我找到于长有，問他：“这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一回事？你問外国人去呀。我不知道。”

“你別裝孙子了！”我火了。

于长有也火儿了，喊了一声：“来火，把他赶出去！”立时打手們都拥上来。

一看这架势，我没有好啦。大伙劝着，我一賭气离开厂子。当时心里想，在外边受这罪，还不如回家受去呢！我

回老家种地了。帮着父亲在家种了一年的地，不行，家里也是没活路呀。1943年正是日本鬼子在乡村进行疯狂的屠杀，搞治安强化运动的时候，乡村简直成了恐怖的地狱。我一看，还是回天津去。

到了天津，又找我那个本家二叔去了。他这才知道我已不在电厂。就说：“你不在那儿，倒是把我的保单撤回回来呀。”我连忙跑到公司，找一位先生要联保书。那是一位过去见过面的老先生。他一查档案，竟说：“不对呀，你们第三所发来的几个被裁的人里，没有你的名字啊！”

这一句话把我说蒙了。这是怎么回事，哦，我明白了，这是于长有跟蛤蟆秧子捣的鬼。他们暗暗的把我踹了。瞧我这胆小的劲，我连忙求他：“老先生，帮我个忙，我还能回去不？”

“行呀，有封信，在外国人面前说说，也就行了。”

这事情不难办。没几天，我就拿着信回来上班了。大伙瞧见我，都嚷起来：“瘦马，你跑那去啦，这一猛子扎的够深。一年多没有看见你呀！”

拿着这信我奔于长有的办公室来了。别瞧这小子又损又坏，他一看我，脸上未免也有点不是味儿。再一瞧信，这家伙嘴上强装出点儿笑来：“这太好了，我老早就希望你回来呀！外国人同意，太好了，太好了。”

蛤蟆秧子也假装欢迎，说：“瘦马，你回来，我起心眼里高兴，老人一起，不比新人好嘛。”

我也假装不明白的，说了几句门面话。狠狠咽了两口

唾沫。为了糊口吃饭，我说什么呢。这话一咽咽了多年，直到解放以后，于长有和蛤蟆秧子受到法律制裁，我这才把话吐出来了。千年冰河开了冻，万年铁树开了花，毕竟善恶是非分明了。

解放了，不光是善恶分明，而且党想尽办法在培养人才，挖掘人才。就拿我这个老实巴交，人人见了都要笑一声的“瘦马”来说吧，居然还是1954年的天津市劳动模范呢！

其实，我并没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那年冬天，电厂下在白河的五口吸水管子，因为天寒，上游下来的冰凌太厚，在水落潮的时候，一下子把铁管子拔断了。这还是我们电厂几十年来头一遭遇到的这么一桩大事故。电厂用水很多，我们这个小厂子，一分钟还要吸八百多吨的水呢，这一没水，问题可大了。锅炉没水就得爆炸，汽机没汽，就不能运行，立刻全厂的锅炉都压火了，汽机全停了，线路都拉闸了。我那时是修配车间水管组的组长，修水管子正是我们的责任，我又是共产党员，能眼看着电厂遇上这样大的事，不玩命吗？我们去修水管子，跑到高处，卧到冰上，河风好硬，天气正冷，真是伸出手来都打哆嗦呀。可是冷又有什么呢？想起二十多年前，自己当徒弟的时候，穿着一个空心的破棉袄，在三层楼顶上因为冷得揣手便要挨打的事情来，我还在乎什么冷不冷呢？我和大伙一样，光想一件事了，早恢复一分钟就可以早发一分钟的电，早发一分钟的电，我们无数的工厂就可以早生产一分钟。干，干，不抓紧干怎么行呢？

干着，干着，不知为什么，支部書記下来了，随后，厂长，党委書記也下来了。叫我別干了：“馬增惠，你回去休息休息。你人太瘦，体力不济，又有血压低的毛病。不行啊，現在你已經干了一天一夜啦。”

怎么，一天一夜了？我应了一声：“好，好，干完这一段，能吸水了，我就上去。”

不久，管子扎好，可以吸水了，那曉得一开水閘，力量一大，又折了！真急死人！干，接着干！

干着，干着，不知为什么，党委書記朝我發火了。他說：“党命令你馬上离开。”

“离开干什么？”

“回家睡觉去。这是組織决定。”

我懂得組織紀律的重要性，只好把工作交給別人，走开了。我并不是故意，我当时只是覺着放心不下，不覺着困，也不覺着累。眼睛前面光是那几口大鉄管子在轉悠。无论如何我也放不下心去。从三条胡同，党委書記眼睜睜的看着我回家去了。对不起，从四条胡同，我又溜回来了。又下去干了。我們伙伴們懂得我这心情，就說：“瘦馬內劲不含糊，讓他干吧，別給他嚷嚷啊！”

五条吸水管又嘩嘩地、大张着嘴向里吸水的时候，我这才知道我一連干了三十六个小时。三十六小时有什么，可是就为这点事迹，大伙非选我做劳动模范不可！党給我的鼓励和荣誉太多了。

(王庭芳 整理)

于 恩 源

于恩源 口述

父亲是个没有正式职业的流浪工人。靠卖短为生，今天車站干个零活，明天就給盖房子的当个小工。我們家人口偏偏很多，母亲一共生了我們哥八个，我是老六。賺的錢不够吃飽肚子的，成天在愁吃愁穿的过日子。

我記事的时候大約是十一二岁，三个哥哥已在工厂学徒。白給人家使唤还不行，还需要家里照顧他們的穿戴。我和四哥五哥就过流浪儿的生活，在街头找点閑活，帮助家内生活。平常是到野外坎地里打草，拾柴禾，有时候，遇上有錢人家办紅白事，我們就去打“小鬧”，拿旗罗傘盖，或是打串灯。有时候，也跟着吹鼓手去敲小銅鑼，这叫当“黃梨”。白天干这个，晚上我們可以到李純祠堂里的貧民小学上两个鐘头的不花錢的学。可惜我也沒識了几个字，一来是人家不好好教，二来是我們冻着餓着学，也学不下去。反正那就是替有錢人家做慈善事业，給他們賺名譽罢了。

我的第一个正式职业是到棉花棧擇棉花。到那儿，人家嫌小，把头不肯要。亏了有熟人說合，算是进去了。擇了半天，我手儿生，只擇了二斤来棉花。把头一看，說我跟他泡蘑菇，抄起竹棍子就打，把我吓的抱着腦袋跑出了棉花棧。白干了半天！

活儿很难找。正式工作是在兩年以后，我长成了半大小伙子，跟着爸爸哥哥到“电灯房”来当小工子。看見比国鬼住的那兩座考究的楼房了嗎，那都是我們一锹一锹地土挖下去，又一塊一塊地磚給盖起来的。我們爷几个干活干的卖力气，讓工头看中了。随后盖义国鬼子的球場，英国鬼子的跑馬場我們又都跟去了。因为有活干，哥几个都掙錢，家里这才算是顧得上嘴了。

这时节，三哥已經在一家电机厂出师了。認識人比較多，他对我的希望也大。就跟父亲說：“我現在能掙錢了，家里不用他們几个見天見都去掙現錢了。讓老六到三条石德利兴鉄工厂学徒去吧。”

学技术是好事。爸爸贊成，我也乐意。于是乐嘿嘿的跟着三哥到三条石去了。

德利兴机器厂在三条石算是数得上的大厂。光师付就有三十来位，徒弟就更多。当天按了手印，进了厂子。我三哥剛走。掌柜的就給我来了个下馬威，他說：

“于六，告訴你，来这儿要好好干活学手艺，把师付們侍候好了。要是不啊，你可要知道家有家法，柜有柜章，厂有厂規。小心你的脊梁、屁股、腿！”

看掌柜的那副凶相，再瞧瞧徒弟們那份惨样，一下子就把我弄的怵头了。我連忙应了兩声。跟着便由师付領着干活去了。

名义上是学徒，实际上学什么徒呀，拿我們当牛馬使唄。我干的是炊事員的打杂儿的工作，刷盤子洗碗。完了事再跟着师兄們裝卸生鉄，搬弄廢鉄，打扫院子。完了事再給师付們做小跑，买点心端飯泡茶。哪个师付叫，就給哪个师付干，別說干慢了，就是应慢了都打。师付們打起来是毫不留情，把当初他們受的气都使出来，他們認为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回可得显显威風了。大师兄們也打，那就純粹是拿小徒弟撒气了。

三条石是天津最早的冶金机械發源地，这儿的作坊鉄厂子如林似海，都是小本經營。那些厂主們，专一的利用小徒工，剝削的都沒了份儿。有人說拿人当牛馬使，說实在的，比牛馬都不如。牛馬不是还得讓睡够了觉嗎，我們这儿起早睡晚，一天要干上十七、八个小时的活。夜晚几十个徒弟滾在一塊睡，沒一个睡够觉的。有些徒弟惊吓得睡觉的时候鬧“梦囈”，冷丁地爬起来往院里跑，不曉得撞在那里，这才算是梦醒了，赶紧倒头再睡。一天缺觉可以，兩天也能对付，日子长了誰頂得住啊，把我們熬的都跟得了大病似的。走着走着道儿就能打盹，撞得头破血出。

在这活地獄里熬了几个月，实在熬不下去啦。这天下午，我借口要回家拿衣服向掌柜的請假，柜上还真准了半

天假。天哪，我可見着太陽了。到了家，我鼻涕眼淚一齊來，抱住爹媽哭着嚷：“打死我，我也不回去了！這罪沒法受呀！”

三哥聽說我不回去，氣得什麼似的，罵我沒出息。媽也勸我熬上四年，也就出來了。不行，說什麼我也不回去。我算是吃了秤砣，鐵了心啦。

父親知道我这罪難受，就說：“不去算啦，還是跟我干活吧！”我算是逃出了這座地獄……

1930年的春天，那年我正16歲。從三條石鐵廠子跑出來有一年了。三哥又煩人把我介紹到濟南六合桅燈廠做學徒的。這家桅燈廠是當時山東省軍閥手下六大處的處長們合資辦的，所以名字叫做六合。領東的經理姓魚，這小子是通過他的小老婆和六大處的處長們的關係，才巴結上的這份差事。他的小老婆是軍閥張宗昌的姨太太。這個買賣就是這麼烏七八糟的搞起來的。可是表面看，這個廠子有錢有勢，挺唬人。我去的時候，廠子剛剛建成，還沒有開工。工人也沒有招齊。徒工我是第一名。這可真是歪打正着，瞎貓碰上死耗子了。往後來的徒工，歲數比我大的也好，小的也好，通統稱呼我大師哥。

廠子開工了，我被分配到機床車間做旋活。表面看，比三條石的鐵廠作坊來得新一些，骨子裡可是換湯不換藥，有把頭有監工，而且廠子裡有規章，不許罷工怠工。對徒工，這兒倒是不用什麼賣身契，可是徒弟得隨叫隨到，沒有工作時間，也是一干干到半宵才打住。也是不准出

厂，不准請假，不准打架。厂方还特地訂制打徒工用的大板子，藤子竿做的教鞭。还有几塊大砖是罰跪、罰站用的。我們徒工，不論那个，誰要是一天沒挨打，那算是交了好运啦。天下烏鴉一般黑。那年月，当徒工到处都是这样受折磨呀！

別瞧我做大師兄和他們一齐挨揍，可是我却 不翻回手来，拿师弟們来出气。我受过苦，知道苦的滋味，大家苦还苦不够呢，怎么还能再罵师弟，再打师弟呢？我从来不打罵他們，而且遇上事总是尽量維護他們，替他們挨打；为什么这样作？当时思想并不清楚，現在可以分析分析这事了。这就是阶级友爱呀，我本能的要这样作。記得有一年，正是三伏天，热的人火燒火燎的，我們整天搬鉄，上車床子，澆鑄鉄活，得使多大劲，流多少汗哪？可是廚房的师付們也欺侮徒弟們，新蒸的饅头不給我們徒工們吃，专把剩下来的，长了老长毛儿的坏饅头讓我們打扫。咬一口臭味熏人，大伙掰开饅头，沒法往下咽，直翻白眼。我气往上撞，自己不吃沒什么，大伙都不能吃，我觉着我这做师哥的有点責任。便給出了个主意。把坏了的饅头都往房頂上扔，扔完了再要，要完了再扔。給他扔了个一光二淨，徒弟們就口口声声的喊着要新蒸的饅头。廚师付奇怪，怎么坏饅头都吃光了呢？就来查看，有大师哥带头，小徒弟們都上来啦。跟他吵架。

这家伙不說理，还要唬我們：“監工的来啦，你們不怕挨打嗎，你們要造反哪。”

他这叫嗆火。大伙劲头儿起来啦，我也胆子壮啦，就带头喊了一声：“打呀！”話到手到，我一手抓住他的脖領，用拳头朝他前胸来了兩下子。徒弟們跟上去了，七手八脚竟把他打倒在地。又踢又踹。

大伙的劲头更高啦，我喊了一声：“搶呀！”我們几十个徒工一窩蜂的跑进厨房，好像餓虎扑食，打开籠屉，把新蒸的饅头給搶了个精光。

还没容我們吃完呢。有个小徒弟拼命跑来喊：“快跑呀，大监工的拿着鞭子来啦。”这一嗓子不要紧，把小徒弟們吓的炸了营，乱窜乱躲，这个监工的也是天津来的，是个流氓出身。整治我們徒弟那是又毒又狠。有好多徒弟都讓他打的發傻了。誰不是吓的藏藏躲躲呀。

他罵罵咧咧的掄起藤条鞭子朝我們乱抽乱打。我身子往后一撤，渾身一热，攔住他說：“喂喂，你別乱打人。冤有头債有主。什么事有我于恩源一人当。”

我才十六岁，看我說話这么硬气，大师哥往自己身上攬不是。把他猴鬼子气炸了肺。他丢开别的徒工揚鞭子朝我来了，咬着牙說，“我今天把你揍死！”

我也火上来了，嚷道：“来来来！今天卖給你兩下！”我拼命向他前胸撞去。

他把我揪住：“好小子，你認打認罰吧，認打，你看見我房內挂的二尺半长，寸半厚的檀木板子了沒有，老老实实挨他二十下。認罰，給我跪兩個鐘头的方砖。”

那年月，挨打不寒寒，矮人一头跪半截身子，那才叫

寒蠢呢。我不能給他下跪。說：“好吧，你打吧！”

这家伙咬紧了牙，屏住了气，掄开木板，照我后腿狠命打了十板。把我的褲子打开了花，馬上我觉着一陣針扎着的痛，屁股肿起多高。不过，我頂住了，沒哼一声。別說我挨的多痛了吧，連他打人的都累得呼呼直喘。

他歇了歇劲，喘着气和我說：“好小子，真有骨头。打一半跪一半。去，拿兩塊砖头給我跪一个鐘点。”

嗨！我一寻思这小子和我耍手腕，攪弄我呀，打成这样，我还跪得下去么，这不是加倍的折磨我么。再說，我跪着，他歇着，有那么便宜的事么。打人还得費力气呢。我就成心气他：“咱們都是天津人，咱們說話可得算数。你說打我于恩源二十板子。你就打，打掉了屁股决不言語一声。当着大伙的面，来来来！你打，你打吧！”

这两句話把他僵住。脑袋一晃，扑过来，狠命又是十板子。这十板子打的更狠。皮开肉綻，血順褲角流了一地，我背过气去。后来亏师弟們把我抬回了宿舍……

一晃，在六合桅灯厂干了快二年了。光和师弟們一塊当苦力，正經的技术是半点也沒学会。一想到来的时候，父亲母亲千叮万嘱，三哥也斜眼瞧我，看我有沒有学本事的决心，我要是空着手来空着手回去，我对得住老人們的心嗎？可是，沒师付肯教，問也白問。怎么办，凡事只怕有心人，我抓空儿就偷看师付們怎么干活，把他們操作手法一一牢記在心里。飯后，他們歇着的时候，我就悄悄溜进車間去試作。学这点本事，真就跟做賊一样。日子长了，

大路活我算是差不离了。到三年头上，王师付才给一定时间，让我上车床子摸摸活儿。可是只许我把着车头挑丝，不准自己动手卡活，他还是不教给呀！

有一天，王师付叫我自己上轮，我没摸过，怎么上也弄不好。气的王师付骂了我一句“笨蛋”！下边还踢了我一脚。用手把我推到一旁，伸手把轮子安上，从这儿起，再也不教给我上轮子的活儿了。教不教在他，可是学不学却在我呀。我就乘他下班的时候，把轮子卸下，试着去安。安来安去，我就找着窍门了。有什么难的呀！

光靠偷艺不行。旋罗丝活怎么偷呢，旋多大罗丝需要多大数字的系数。这我可没咒念了。我压根儿不懂数学！凑巧，王师付走了，换了一位黄师付来。这可是个老好人，五十出头的年纪，慈眉善目的，对徒弟说话从来不瞪眼。过了些日子，他和我说：“你们这些徒弟都规规矩矩的。我喜欢老老实实学手艺的孩子。有什么技术，我都教给你们。决不往棺材里头带。”

我就跟他说了：“我没拜过圣人，计算上一窍不通。旋什么活，自己心里没数。”

黄师付点点头，说道：“我看你是真心实意学本事。好吧，你明天买个纸折来。”

等我把纸折买来，几天的工夫他便给抄了满满一折子。旋什么活用多大数，那里面都有。这样一来，所有的旋活我都会做了。我有了本事。

看我顶起来了。经理却贪图省俩工钱，把黄师付辞

了。想不到我做徒弟的竟頂了他老师付的飯碗。怪不得人家不教呢。旧社会逼的人和人之間得藏奸，留后手儿！这件事真把我难受坏了。

可是，六合桅灯厂也沒有站住。經理吃私吃的太狠，連份假賬也交不出。六大股東又逼着他交賬，于是他来了个縱火自焚，好生生地从办公室里起了一把火。这一来，我們工人全都失业了。我拿了遣散費，回天津来了。

在天津，我在資本家办的全利鉄工厂当师付，一月能拿十元錢，后来漲到十二元。生活上比較安定了一些。七七事变以后就又不行了。日本鬼子进关，所有中国人办的鉄工厂都受排挤。生活难以維持，我們就辞活了。那年月，机器匠的手艺，沒有車床子是混不上吃的，万般无奈，硬着头皮到日本工厂来干活儿。

我去的那家鉄厂叫“东和”。势力不小，工人多，材料多，倉庫总是滿滿的。大伙瞧着又恨又气。再加上物价一年比一年的往上涨，逼得大家生活毫无着落。不管怎样，人总得活呀，一来二去的大伙偷上他了。我們不叫偷，大伙有句行話，叫做“捎他小日本的！”

当时厂里有个叫王錫文的。一家六口，靠他一个人那点工資怎么活呀，他就想出来一个点子，不論天晴天阴，見天見他都离不开一把破雨傘。原来这把雨傘里正好擱几根鉄棍，天天他都捎几根走。长了，日本鬼子就起了疑心，問他：“你的傘的什么有？”

王錫文沉不住气了。这一支吾不吃紧，戏法变漏，讓

鬼子搶過來雨傘，把鐵棍搜出。打了他一頓不要緊，还把王錫文拴在馬路的電綫杆子上，用皮帶抽。

大伙找我來了，讓我給想想法子。我一說情，那鬼子倒更冒火了，說是“白帽衙門的給！”把人送走那還了得，又去找日本掌柜的。掌柜的看我技術頂瓊，所以另眼看待一番，三說兩說的，把王錫文放下來了。白帽衙門是不送了（要送去，就得押解到日本去做勞工），可是非开除不可。开除不吃緊，事由不好找，他一家六七口，馬上就得斷頓呀。那時候我們還做加活。就由我領頭把包外活做羅絲的錢都給了王錫文。

王錫文走了，日本鬼是任誰也沒吓住。我們還是偷。

有天，王洪舉準備把鐵棍截短，好拿出去。正用車床切鐵棍呢，讓鬼子工頭一眼看見了。這工夫，我正在后邊庫房里面拿材料呢，聽見徒弟招呼我，連忙三步并兩步的跑進東和的辦公室。

一進去，正好鬼子田川用木棒子打老王，打一棍子問一聲：“你的鐵棍子的什麼干活？”

不能看着自己哥們挨打呀，我過去用手一攔，說道：“鐵棍子我的干活。他的好人。”

听說是我叫老王截鐵棍，田川把棒子放下。想不到事情竟這樣完了。不光完了，掌柜的東和还把田川這小子罵了一頓，嫌他不問青紅皂白就打人。

怎么掌柜的東和對我这么大的面子呢？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我的技術不賴，無形中成了工人中的技術頭兒，

鬼子格外看待我三分；一个原因是鬼子有鬼，他也不想利用我。从这起，經常他約我下飯館喝酒去。

喝着喝着酒，有回他問我：“于，你的馬車的有？”

我登时就明白了。可我故意給他打岔：“工人沒有錢，馬車的怎么有？”

“不是的！”他摆摆手，“你的外边的馬車的有。”

我赶紧問他：“你找馬車什么的干活？”

这小子慫的沒轍，說實話了。原来他也要偷。而且要和我搭伙，拉一趟有我一趟的好处。我連一秒鐘的猶豫都沒有，心里的話：“你要是偷了，還有我們窮哥們吃飯的活路嗎？”可我沒动声色，倒是点头說好，“我給办，我給办。”

这小子等了几天，看我沒办，又約我喝酒，又給我說好的。可是推了几次，这家伙也就明白了，知道我不給他办。把臉一整，老是斜眼瞪我。

鬼子心眼还不小，先来个下馬威給我瞧瞧。故意抓碴儿把王洪举开除了。这是逼我呀。我一寻思，中国人不能給他鬼子干这个，爽性我辞活吧！

从东和鉄工厂下来，我到富源鉄工厂来了。也是日本人开的厂子。机器設備比东和厂好，我用的是大車床，出活挺快。沒干了几个月，日本鬼子又看上我了。把我叫到櫃房談話：“你的干活大大的好，工头的干活的有。他們通統你的管理。”

什么？給鬼子当工头？我是从挨打受罵里长大的。怎

么能干这个騎在工人头上的事，我当时拒絕了。

过了些日子。掌柜的富源又找着我說：“你的工头大大的好，發財大大的有！”

“我不願意發財，我願意干活。腦筋的不行，”我这回答复的更加干脆。

看我一次再次的不肯。富源这小子倒有个鷺主意。把工头的事儿暗暗扣在我腦袋上了。有天，有个工人要鑽头，富源竟把工具箱的鑰匙交给了我，讓我給他拿！

我心里可别扭透了。真是有亏良心，做了多么对不起大伙的事。咱們是凭手上的汗換飯吃的工人，怎么能爬在穷哥們的腦袋上当工头呢？趁晌午大伙歇息，我把事儿和大伙說了。我还真沒有这么沉不住气过。

大伙一听，出我的意外，异口同声，倒說这是一樁好事！他們講的有理：“你想啊，要是你当了工头，那不和大伙当了工头一样嗎，有什么事不就有个遮遮掩掩，事情不就好办了嗎？”

对呀！当工头看怎么当了。我的心不在他那边。由这儿起，我把工头的权限全攬过来了。工具工賬都攬在我的手心里。当天，我就給大伙开了个方便之門。出了好主意：“从今天起，鬼子不在，咱們就做包工活，鬼子来了，咱們就做日工活。”

这一来，把大伙乐坏了。干包工活的时间加多，大伙的工資全拿多了。

光这样还不解恨。从这儿起，我还不断溜进鬼子监工

的屋里去给大家改工账，将包工的印章“包字”抹下去，打上—个“日”字的印章。这样闹，大伙更合适了，包工活按量计算，量多了，多拿钱；日工活，戳子多了，多一戳多拿一天的工资。合着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日双工。鬼子让我给他管工人，好哇，看我给他管的多好啊！就这样，我们一直胡弄鬼子，直到“八一五”他们垮台，降服。

国民党接收大员来了。富源铁工厂为伪经济部接收。原来我是工头，于是大员们还叫我当工头。我心说我这工头不比寻常，是穷哥们儿的“坐探”，不是侍候你们“飞来牌”的。当工头我不干！宁可饿死也不干，我又辞活了。

朋友们介绍我到伪中纺七厂原动部来了。凭我的手艺，凭我的经历，楞给评了个三等工。三等工就三等工，反正比当工头心里还好受一些。

到了国民党办的工厂，好呀，比鬼子办的工厂还复杂，帮派横行，到处都是把头。当时原动部的大把头叫何文甫，还有一个就是南市流氓头子××的徒弟。这两派是大眼瞪小眼，暗地里叫劲。有天，何文甫叫我到他办公处开会。我不知是什么事就去了。

万万想不到何文甫开的是国民党的党会，把国民党布置的当前任务，大批拉拢工人扩大势力，侦察进步工人，防谍防“奸”的任务都说给大家听了，随后就说我们原动部的××是青帮分子，不听从他的调度指挥，接着竟把我抬出来了，说是：“兄弟们，今天在这个会上我保举于恩源于师付当班长，大伙看好不好？”下面都是他养的一帮

子狗，就齐声开哄，炸窝似的喊：“好嘛，好嘛！”

鬧了归齐，还是讓我当工头呀？我要当工头何必到你这儿拿一个三等工的工錢呢？當場我没好反駁，下来我可不敢客气，當場謝絕了。何文甫挺不滿意，咧着大嘴說：

“唉！你这就不对了，我連我們党的秘密都跟你說了，咱們有交情嘛。別客气了！于老弟，咱們好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那年月，我是这么个处世哲学：占便宜的事，咱們不攪，吃亏的事咱們不干，能惹的惹，不能惹的咱們躲。不过，到底还是没有完全躲清，后来还是和××拜了一把子盟兄弟。我心里却始终和他合不到一块去，記得为了一丁点小事，就和××打过兩架。唉！勾心斗角，那碗飯可真是不好吃呀！

解放战役中，棉紡七厂駐有国民党炮兵，所以滿大的一个厂子都被炮火轟毀。单单留下了发电厂部份。解放以后，这部份便改为于庄发电四厂了。我这才算是正式成为电厂的修配工人，算是专做汽机保全工作了。

翻身之后，我要說的話可多了，生活变了，地位变了，思想变了，“一切都变了。但从我切身來說，我觉得变得最大的还是这些：以前，我好像只会干活，可是解放后，我逐漸發現我不光会干活，而且还有时想創造、捉摸一些什么。劳动和創造，这是工人的最大特色。开初我想了一点改进、創造，这都是自然而然的那么随便一想；但是党却抓住这星星点点，又支持又鼓励。后来有了些成

績，本來這些成績都應該歸功於黨，但居然讓我做了好幾年的勞動模範。這些事迹大致是這樣：

1953年在發電四廠改建水泵，評做市級勞模。

1954年在發電四廠設計上煤工具，又被評做市級勞模。

1956年發電四廠和三廠合併，我這才調到三廠的汽機分場。三廠的設備，雖然在解放後發展得是一日千里，但在新中國的電業發展史上却早已是提都提不上的一个又小又舊的廠子了。可在我眼睛里卻還是頭一遭見過這麼大的場面。好在是解放了，從心里有那麼一股要作好，也敢做好的勇氣。所以困難越大，問題越多，自己倒是越來勁兒，一年當中，有幾項改進。比較突出的是創造了危急保安器，在汽機上安上這玩藝，一有事故馬上就可中斷。再不會發生什麼危險。這一來，電廠的安全問題，便更加有保障了。這一年，我不僅被評做勞模，而且有個報紙還記載了這些事，說我是什麼千手千。使我非常不安，但也確實給了我很大鼓勵。

1957年改進風泵壓力簧片，縮短升壓時間一分鐘，延長了壽命，還解決了運行與維修爭着用風的矛盾。過去簧片一天至少要壞一兩次，改進以後，六七個月才壞一次。為這點成績，我又被評做勞模。

1958年大搞雙反運動。我是工會生產委員。必須帶頭上陣突破保守思想。電廠的歷史比較長，機器陳舊，有些老工人的思想也陳舊，不敢突破常規，干什麼都憑老經驗。這些老經驗有不少是不能適應咱們大躍進的時代了。得把

它撵走，于是我們組織了一个老年机智突击队，专门負責解决疑難問題，攻打关键。用实际行动把老年工人的腦筋打开。在反官僚主义上，也不简单，我們和青工一起搜集廢料，預計要献价值黄金 800 兩的东西，結果完成了1000兩还多。1958年是“大躍进”的第一年，事情特別多，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一樁事也發生在这一年。那就是开始制作 6800 瓩的發电机。

事情是这样：大躍进声中，毛主席到天津視察来了。在參觀工业展覽館时，他对电业职工指示說：“發电厂可以搞点制造。”党委根据这个英明的指示，决定利用原有的汽輪發电机的轉子，自制一台6800瓩的汽輪發电机（包括整套的附屬設備），这个重大的任务在發电厂來說，自从建厂54年以来还是头一遭。我們检修分場修配車間仅有几台皮帶式的旧車床、一台小龍門刨、一台小牛头刨。十几个老年工人还身担着五台机輪發电机、十三台式样不同的鍋爐大小修任务，除此以外就是百十个青年工人和徒工，他們之間有新从学校轉来的，有从农村来的，大部份是新工人。从制造一开始就把这个繁重而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帶領着一部份检修工人就开始了制造工作。通过参加工作的同志們研究，个个斗志昂揚。但是困难的關鍵問題重重出現，比如十几吨重的高、低壓缸大鑄件的加工，光靠我們現有的几台小床子是啃不动的。我想我現在是一个工人提拔的工程师。困难再次也不能向困难低头，再者党交給我們这项制造任务正处在目前电网紧张，需要生产大躍进的

日子里，能提前多發一度電，那就是多增加一份巨大的動力。何況我們製造的是6800瓩汽輪發電機呢？當時我就想起了黨教育我的話，有事多想想，多和群眾商量，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困難，所以我就根據黨的話，通過苦思和學習別廠的土洋結合的辦法，提出了一個大型土立車床的草圖；找來了工程技術人員和我們一起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王桂林同志共同研究。反復研究修改，一台用洋灰作成的三米八立式土車床便設計成功了。解決了大型鑄件加工的困難。

另外，在土車床加工低壓缸滑動面時，遇到了沒有大立銑車床不能加工的困難，我就主動的幫助王祥瑞、王桂林兩位師傅研究出利用土立車床上加小車頭，用螞蟻啃骨頭的方法代替了大立銑車床。後來又听取同志們的意見，使手動進刀改為土法自動進刀，加大進刀量，同時用三把刀旋活，提高效率四倍。旋高壓缸找正是一項精密細緻的工作，我們沒有找正工具，針對這個困難，我又和老同志們研究，提出了“四角針點”找正法，使旋高壓汽缸的任務順利完成，平面飄偏最大在0.1公厘以內。直徑橢圓度在0.2公厘以內，不亞于製造廠的加工件。隔板槽的間隙最大差0.6公厘以內，達到合格。

黨教導我們作為一個生產戰綫上的直接領導者必須經常關心群眾，幫助群眾解決困難，才能更好的發揮群眾的積極性。我在領導自製6800瓩汽輪發電機工作中遵循着這一指示，哪里有困難我就到哪里去，不分黑夜白天親自到

現場指導，多方面注意安全和質量的檢查，抓住關鍵，然後找大伙商量，發揮群眾智慧。群眾干劲沖天，困難關鍵問題真是手到擒來，不但在繁重的起重工作中沒發生任何事故，保證了安全，組裝也找到了一些製造經驗。

1959年9月26日，在苦戰八九兩個月的口號下，6800瓩發電機，最後完成了。做為向偉大的國慶十年的一項獻禮，我們把捷報一直送到北京去。

這一次的製造任務給我的教育意義很大，我現在正和伙伴們一起等待新的任務。我們正為製造一個一萬瓩以上的發電機在做準備呢。

(廠史編寫小組 整理)

赵树才

赵树才口述

我們發電三厂背后是金鐘河的旧址。几年前經過人民政府的整理，已經变做一条大馬路了。但是，要回溯到先前，这条河却是船舶云集的一条水上要道。兩边都是碼頭。碼頭上自然少不了裝卸搬运工人。这儿是个工人成长的地方。我們家就在这条河的左岸。从我爷爷起，几輩子都是干苦力，拉地排子車，后来又拉膠皮車。我是从小就繼承祖业，打十五岁起(实际是十三岁)就干这一行，拉小套^①。

但是，我生的时候太晚了。金鐘河已經堵塞，拉地排子車已經不行了。我們左近的人們又有了新的职业，大半是去猪鬃厂摘猪鬃，給洋行做出口加工业务。我是跟我叔叔去的。这个行业可是苦啊，整天在塵霧当中弄猪毛，把人呛得犯嘔。好多人都得了喘病。再說，規矩也严，虽然我岁数很小，还是任什么也不懂呢，可我就看不慣。出去

① 拉小套是指拉地排子車前边的繩套的。

大小便都得自动和头儿說一声“我解手儿”，然后双臂一抬，双腿一叉，讓头儿前后左右一搜索，連胳膊窩都摸遍了。猪鬃是出口的貴重物件，誰也休想夹带一点出去。別瞧規矩这样严，錢还不多賺，一天的工錢，不够我吃兩頓飽飯的。罪过太难受，我不干了。好在家里見天見都是一鍋山芋面或高粱面熬紅萝卜，飽不飽就这一鍋。实在餓得睡不着，就来点半空花生嚼，餓也餓習慣了。不去就不去吧。

稍大一些，我經人介紹到电厂前边那家日商醬油厂来了。是个小厂子，攤总三十来号人。大伙团結得很紧。从翻譯到會計，到工人通統串在一起，給鬼子来个大偷大运。比如說鬼子向外發100瓶子醬油，我們运出去的就是130瓶子。这多余的醬油卖掉，一人分一份外快。虽然有这一份，究竟生活还是紧，而且瞧着鬼子不解气，大伙还自行捎带。这可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誰捎出去是誰的。为了捎醬油瓶子方便，我还特地做了个又肥又大的棉袄，里面縫着兩個大口袋，一下子能裝好几瓶醬油。別瞧醬油捎的不少，一回总有十来斤，可是家里却一点也舍不得吃，都卖給飯館了。这天不巧，我下工的时候，正好鬼子从外边回来，一拉大門，瓶子碰瓶子，卡登卡登的直响。一下子讓鬼子抓住，用鞭子抽了我一頓。鬼子真損，抽完了，还从游領往里澆凉水，冻的人渾身打哆嗦。随后，大伙劝着，这才算完事。不过，凉水也沒鎖住我，当天下午，棉袄还湿着，我就又捎了几瓶出去。

“八一五”以后，酱油厂被国民党“劫”收一空。厂子不得不关门大吉。我们工人都失业了。一失业我就去干老行当，又去拉地排子车。和我一起拉地排子车的有位张师傅，他是当时电厂的推灰工。有回和我說，“推灰工人少，你要願意，我給說說，上班来得啦！”

那我还有什么不乐意的。沒几天就进了电厂。那时候推灰工的活儿真不是人干的，干一晚上能拿到七兩棒子面。下灰的时候噲得人喘不上气来，溝里面净是流的水，水里有硫化碱，人們多是光脚丫儿推灰，沒一个不爛脚的。有人穿着破鞋也不頂噲，有时爛肉竟和破鞋粘在一起，連脫都脫不下来了。晚上推一夜的煤灰，轉天一早再去拉地排子车，这就叫日夜連軸轉，根本沒有睡覺的时间。那时候不是睡覺，是打盹儿，等排子车活的时候，眯糊一会儿；晚上推灰的时候，大伙抓个空儿，只要特务张七不在，有的在鍋爐房，有的在烟囪道里，舖上一塊草包袋，枕上兩塊砖头，就睡它个仨倆小时的。那几年就沒有睡过整宵的好觉。直到解放了，翻身了，这才有了睡覺的自由。

自然，解放了，給我們的自由太多了，何止生活上的这一点点！党还給了我們發展的、供献才能智慧的自由。

1952年，領導上提拔一部份青年工人进鍋爐房，看我身体壮实，就調我去学司水。車間林主任和我一說，立时感动得我差点儿掉出眼泪来。过去，我們一个推灰的臭工人，凭力气換飯，誰教給一点技术呀，那有一点發展前途

啊，这真是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当天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翻过来调过去的，怎么也睡不着，我自己暗暗叫着自己的名字“树才，树才呀，你一定要好好干，要对得起党呀！”

过去学徒要三年。在电厂里学本事，师傅怕徒弟将来偷了饭碗，所以任什么也不教给。但是在新社会里，三个月咱就出师了。车间主任把我派到小炉上去，那个劲头可足啦。像是入了迷，有誰请假，我就替班，星期天我也舍不得休息。大伙都说我年轻小伙子肯干，其实不是肯干不肯干的问题，是我在报答党对我的培养教育啊。

转过年来，1953年的春天，十三号炉的师傅支援新建电力工业，调太原工作去了。组织上竟调我去接老师傅的后手。虽然我又兴奋又欢喜，知道这是党在培养我，可自己总是心虚，炉上的老师傅们工龄最短的也有七八年了，我才刚刚学了一年，就上这么大的炉子，这能行吗？未免有些嘀嘀咕咕，想打退堂鼓。

针对我的这种顾虑，支部杨书记亲自找我谈话。问我：“小赵，工作怎么样？有啥困难？”

“工作很好。就是有点害怕，怕完成不了任务。”

杨书记看着我发笑说：“别怕嘛！什么事全得有困难，有困难咱们就克服。千万别怕。你越怕它越欺侮你。多找老师傅学习学习。不懂的咱们就问。怎么样，有信心了吧。”

这还能没有信心，我气足了，连忙答道：“有信

心！”

随后，楊書記还拍拍我肩膀，說：“小伙子干吧！有困难多依靠党。”

干哪，我胆子大了，把担子挑起来。

干哪，渐渐我还發現了一个問題。这个問題也是历来的老問題了，鍋爐里的水面不穩，不是發生干鍋，就是發生滿水，不光威胁安全發电，而且还影响国家經濟收入。可把我急坏了，整天上班下班，吃飯睡觉全琢磨这件事。楊書記知道我琢磨这个問題，又找我談話，这时我已經入党了，信心更足了，覺得應該敢想敢干，攻下这个堡壘。

沒有不能琢磨的事情。渐渐我找出一些經驗来了。水面不穩是由于水的循环不好。循环不好是火苗的問題，火苗的好坏是煤的問題。可是煤都是好煤。那么問題一定是在操作技术上了。我就順着操作技术的这个路子研究起来。不久我就發現煤燒的不勻，怪不得火苗有高有低呢。我試着从風量上掌握。水往下落我就用吸風調，水漲时我就縮吸風。这样一試，果然水面平穩了，鍋爐效率也提高了。看，就是簡簡單單的这么点事。

誰想到，大伙竟把我評做1955年的劳动模范了。而且，1956年四月还派我去首都参加“全国电业先进生产者代表會議”。更荣幸的是，在會議期間，有天，我們忽然得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見我們全体代表。我們是在怀仁堂見到他老人家的，不光見了毛主席，而且还見到許多党中央的負責同志。当时激动得我流下了眼泪。我是一个拉地排子

車，推灰的工人啊！居然能見到毛主席。我想見他一次，這輩子足了。

不，黨還給了我第二次的機會。1956年9月30日，國慶的前一天，就要下班的時候，書記突然叫我去。說：“老趙，明天請你到北京觀禮去。”喜歡的我蹦了起來。第二天，我就到了北京，還居然佩着觀禮証，到觀禮台上來了。我又一次見到了毛主席，而且不光看到毛主席，還看到了那浩蕩的充滿了建設社會主義激情的幾十萬人的遊行隊伍。……

黨給了我這樣的榮譽。我應該怎樣努力工作來回答黨的關懷呢？這是幾年來，我一直想着的問題。

（楊清、胡寧 整理）

王庭芳

王庭芳

別瞧我說着一嘴天津話，說實在的，我却是山東省陽谷縣生人。提起來武二郎景陽崗打虎的地方，都知道吧？那地方離我們住處不遠。再細說，我們還不算是陽谷縣人，而是從我老爺爺那輩起，逃荒逃到陽谷縣來的。聽長輩們說，老爺爺當時挑着一副担子，前筐里放着我大爺爺，後筐里放着我二爺爺餓着肚子來到這裡。然後便利用這副担子挑水燒水，開了個水灶。那時候，陽谷縣水運繁盛，來往旅客很多。所以就靠着這個水灶，老爺爺，爺爺苦苦熬了兩輩子。

生我以後，母親得了一種營養失調的病。有病沒錢治，光拿身子耗着，耗到後來，母親一命嗚呼。父親在家裏呆不下去，便帶着我一起奔了濟南，隨後又由濟南輾轉來到天津。那正是1937年的春天，蘆溝橋事變的前半年。一下車，我們就投奔“電燈房”來了，因為我們一位叔伯兄弟的舅舅在電廠子燒鍋爐，便在他家先露住腳。

事由很难找。好不容易才被荐到織袜子的作坊去。因为我岁数小，干不了重活，只叫我紡綫軸，紡了十个，我給坏了五对。內掌柜的火，連一頓飯都沒管吃，把我撵回舅舅家。

事由很难找。好不容易又被荐到三义庄丁記飯館当学徒。洗碟子刷碗，抬煤倒土，这活儿咱們干得来，唯有一样，还得外饒着挨打，受罵，招气。掌柜的是变着法儿来收拾折磨小徒弟。咱是阳谷县武二郎打虎左近的人，受他这份轄治啊，沒那么容易的，熬了半年，咱王庭芳不給你干了，賭气溜走。这一来，沒地方糊嘴了，我呆在一个乡亲开的飯館楼上，长了一身的膿疱疥。飢一頓飽一頓的，瘦的不像样。可我并沒閑着，看了不少的書。自然啦，那年月我也摸不着好書看，看的尽是劍俠書，什么三俠劍啦，青城十九俠啦，虽然看得暈头暈腦，但是社会里的不平等現象，有的人吃穿不尽，有的人成天混不上一飽，这些事却一直在我腦子里轉。轉来轉去，自己給自己找到一条道路，打算跟一个老和尚去五台山修行。倒不是看破紅塵，而是想着学点武术，将来也做劍俠，抱打不平！幸亏我父亲注意上我了，看我看的很紧。我呢，也舍不得父亲，覺得他太苦了，我怎么能撂下他呢？总算沒拔腿。

1938年的冬天，也就因为舍不得父亲，我們爷倆一齐去当了华工。我們去的地方是山西段家嶺至宣崗鎮一帶的鐵路工地，我們受的罪那真是年青一代人們想也想不出的。

剛一到段家嶺工地的時候，大約吃了一个星期的面

食，以后就变样了，弄了三十多袋又黑又生芽子的大土豆，鹽也沒的吃。成天叫人們吃开了白水煮土豆。为了讓勞工們无处藏无处跑，給勞工們發了一种特制的“囚”衣，每人都罩上一套麻袋大衣麻袋褲，麻袋帽子麻袋鞋。老远的一眼望去，个个都是高个儿，腰溜圓，每人扛着一把大鉄銼，真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又冷又餓，头頂着槍子干活，誰肯使勁啊？日本鬼子就叫監工來打大伙。最可恨的要屬監工小林了，他每天瞪圓了母狗眼，不是嫌这个除土不用勁打一棒子，就是嫌那个背土走的慢來一下子。監工們太狠了。他們狠，倒教育了我們大伙，大家抱团抱的很緊，而且火頂腦門，恨不得整治他們一頓。

有天，我听說日本二掌柜的，叫西馬达的到工地上來检查。为什么要到我們这儿來呢？是包工大柜的朱八在鬼子面前夸下海口，說我們这一帮工人一个頂十个干，从来到山西沒跑过一个。西馬达登时挑大拇哥，喊着：“朱家大柜干活的頂好頂好。”一听这消息，我登时便計上心來，觉得打小林的机会到啦。

怎么打法呢？我找了兩位在外边創蕩多年的流浪汉徐大爷和刘大爷說：“你們二位合計什么呢？有什么高招教給教給我！”

“你过来！”他們就对着我耳朵叨咕了一陣子。……

轉天，天還沒大亮呢，鉄鑿子就当当的敲了个山响，我們連忙揉了揉眼，伸了伸腰，一人喝了一碗谷子和黑皮土豆煮的粥。拿起鉄銼，頂着風寒上了工地。到了工地我們就

扯開天，大家一齐“捏窩窩”，故意一字儿排开，站在鐵道一边，手扶着鉄，不干活。

小林从山弯子外轉来，老远就喊：“为什么不干活？”奔过来，举起打人的大馬棒，照着每个人的屁股上就是一下。打来打去，打到我这儿了，不动声色，我只用力把鉄銑往后一插。就听叭哧一声，小林的大棒子被洋鎬打断。小林吃劲不住，往前一栽。乘这工夫，我来了个顺手牵羊，小林鬧了个大趴虎，刘大爷一脚踩在小林的大膀上，喊了一声“打！”，十几个人都涌上来了。

“快跑，快跑呀！”徐大爷是去巡風的，这时从山弯子轉过来喊給大家听。

大伙撒腿就跑，給他来了个死无見証。唯有我没跑，反倒抄起小林打断的半截馬棒，朝西馬达跑去。到他跟前，我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装着哭丧臉的样儿，給小林这小子告了一状。我說：

“西馬达掌柜，小林的每天的苦力的‘三宾’的給。你看，我的大腿打坏啦，苦力們的打跑啦！”一边說着，我一边把打断的半截馬棒給西馬达看。

这时候，正好小林破口大罵，發瘋發狂的赶来。西馬达火儿了，过去喊叫小林：“你的苦力通統的打跑啦！”

小林怔住，連忙行礼。行礼也不行，西馬达上前跨了一步，嚷道：“苦力‘三宾’的給的不行！”紧接着抡起他那小蒲扇似的大手，一連打了小林兩記耳光。

把小林打的双臂直垂，一动也不敢动。我們工人們都

回来了。哈哈，大伙可开心了。这是我参与的第一次的自發斗争，以后我摸着了門道，动不动就来这一手儿。

不过，我們当时并不願意只搞这种报复式的斗争，我們都想当八路军去。我們住的那个村子，白天鬼子兵在村口上放哨，大搖大摆的；太阳一偏西，他們就立刻扎在炮楼里了。从我們一去，見天見夜里都有鬼子兵失踪，被我們八路军游击队摸了去。把我們喜欢坏了，恨不得有一天能冲出去找八路军。后来，日本鬼子在山头上挖了个大洞，控制住制高点，以为这样万无一失了。哪想到我們游击队用大繩子拴了一个洋油桶，桶里面装满了炸藥，乘刮風的时候把它从山上滑下来，随着繩子还滑下两个勇士来，把洋鉄桶送到山洞的小門上，然后兩人揪住繩子的兩头，把桶子悠进山洞里，把十来个鬼子給炸了个粉碎。

后来，游击队的活动發展到就是白天晌午的时刻也干起来了。这天，正是太阳晒得足足的呢，从山澗里来了三个身穿半新白皮褲袄的老百姓，牽着三匹馱着满满的麦秸的小毛驢，他們胸前都带着良民証，通过卡子口一直到我們工地上来了。离我們不远，他們把毛驢拴在棗树深处，从麦秸内拉出一把歪把子，兩支駁壳槍，往皮袄里一掖。一个人扛着歪把子跑进鉄道的桥底下。另兩個人就搖搖晃晃朝我們干活的地方来了。誰也睜着兩只大眼，可大伙都裝着沒有瞧見，自願干自己的活儿。他倆过来了，拿起小麻袋和我們一起背上，一扎就扎进了人群里，鬼子也分不出他們是誰来。干着干着活，太阳偏西了，十来个鬼子兵和

两个监工的都围在一块儿烤火，我们干活的，手冷不过，也可以到上边蹲一会儿再下来。我和一位李二伯也上去烤手了，他们俩也跟上来了。蹲在旁边，一边烤着手一边问：“老乡，从哪儿来的？”我一听是天津一带口音，就说：“我们都是从天津叫日本人招来的，也有他们抓来的。”有个黑脸的就说：“咱们都是老乡呢。”接着那另一个人就说：“老乡们别烤啦，快下去干活。”这句话透着硬，有点命令的口气。我们俩挺乖觉，立刻溜下来了。刚下来，就听上边一阵子驳壳枪响，嘎嘎嘎，咕咕咕，十来个鬼子全倒下来了。大伙一扭头，眼巴巴的望着这两位游击队员，他们真沉得住气，把十来杆大枪都背在肩上，朝炮楼走去。炮楼上的两个鬼子兵趴在里面，一动也不动。这两位围着炮楼子转了一遭，看看没有动静，以为鬼子兵都给打死了呢，就想往回走了。但没想到那两个鬼子兵爬起来，接连响了几枪，把那位中等身材的大腿打伤。这时，桥下边的歪把子嘎嘎嘎的一阵响，立刻炮楼里枪声哑下去。两个游击队员搀着那个受伤的同志走去。

这些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真恨不得马上跑到八路军那里去。事实上也不断有人跑走。可惜，我光转念头没有动脚儿，因为我让父亲给絆住了。总不能把他孤零零地丢在山西呀。不过，我却接受了斗争的影响。总是要反抗，而且一直向往着党。……

我是日寇接管“电灯房”的前些时候，经我舅舅介绍到厂里来的。在锅炉房烧锅炉。不久，日寇就接管了厂

子。鬼子一来，压榨的更露骨，更疯狂了。工人用流血斗争换来的养老金，两袋配售白面和煤赏钱都没有了。还建立了“三人连环保”，下班要搜腰，把工人整治的连牛马都不如。咱能看得惯这些吗？咱得跟那些八路军游击队学，给他们来个出其不意的。

这天。下班了，我没有就走，先把饭罐里的小米饭汤在大汽管子兰盘上加热。热得滚开的，我这才跑到前门。门口上，工人们排成了一列，正等着走狗马大脚搜腰。

马大脚一边让工人们挨个给他张开双臂，一边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说：“走，给我快走！”说着，轮到我了，他扫了我一眼，立刻就翻饭罐，我趁势一松手，于是一罐热滚滚的稀饭汤都泼在马大脚的手上，脚上了。烫得这小子啊呀啊呀怪叫。嚷道：“好小子，你故意弄稀饭烫我！好，老子揍死你！”

我忍住笑说：“咦，饭罐子本来是盛饭的嘛，谁叫你来翻它？”

说得他无言可答，从我手中夺过饭罐，死命朝洋灰地上一摔。我心说，摔就摔吧，反正你小子让我给烫啦。

以后，我又照方抓药，把邢三整治了一下。邢三是谁？邢三原名叫李文森，是个白俄监工，专一的拿着鞭子抽打工人，长着一副吊死鬼的脸，见人总是苦脸蛋子，大伙想起天津当地传说，邢三上坟的故事了，就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外号。这天，我正弯着腰推着煤车往14号炉运煤。走到半路腰上，惹着这块洋料了。他抓住我的后腰带，连推带

罵的喊：“你的不使勁，快推，快推！”

咱吃他这个又推又搽的嗎，气往上撞，我一轉身跳到煤車前面，大声罵他：“你他媽的推。爷爷沒勁兒。”

邢三的鷹鉤鼻子上直冒汗珠兒，抬手就要打人。咱不能挨他的，往后退了兩步，罵道：“邢三，你有種跟爷爷下边打來。”

罵完回头便跑。这下，可把邢三气炸了肺，他抬腿就追，我就紧着跑。跑来跑去，我跑到12号爐子前头，正好鬼子山田在大罵推煤工人，嫌推煤推得太慢呢。我心生一計，弯腰鑽过煤牆洞，装着很害怕的样兒，跑到山田跟前說：“山田先生。你看李文森的‘三宾’的給。上边推煤工都叫他打跑啦。”正好邢三也从煤牆洞里爬出來，朝我扑上來。我更有詞兒了，便說：“你看，他这不來了嗎？”

山田这儿正着急工人老是推得慢慢騰騰，煤不頂噲呢！原来是監工的把工人全打跑了哇！山田上去，嚷道：“你的什么的干活？工人‘三宾’的給的不行。跑啦，跑啦的有！”

正人們一看有熱鬧可瞧，誰不是給他加把子勁啊。都过来指着邢三喊：“都是他把人打跑的。煤才上不去。”

山田一听更急了，伸手把邢三拍、拍打了几下。邢三呆在那儿，居然委委屈屈的咧着大嘴直哭。我們看着可开心了。

是不是解解气，寻寻开心就滿足了呢。并不滿足。誰不是窩着一肚子火在想斗争的办法呢？有天，我們鍋爐房

的一班工人，被监工的吆喝了一声，十来把铁铤都给他摆下了。大伙七言八语的挤在一块又扯开了，都说：“不能给他们鬼子干，得想法子啊！”

我说：“告诉你们哥几个一点活路。人家胡头班的人，有的跑单帮，有的去贾家大桥打毛子工，一天能赚好几块‘大棉被’票①，你们说咱们呢？”

“咱们给他外边干去，给他拆台，搁车。大伙齐心不？”

“齐心！谁要是心猿意马，出门让电车轧死他！”

“对，电车轧不死，来个骡车也得撞上他。哥儿们抱团，干哪！”说到这里，大伙还对瞧了一眼，算是盟誓。

接着，我们就又拾起铁铤，吆喝着“一、三、五、二、四”地低头干起活来。

这时候，富根大模大样从后楼走进锅炉房。他看我们大家干活干的还起劲。这小子竟说：“干活大大的好。”说着要过一个煤鏟来，哈腰伸腿，也往炉膛里添煤，招呼大家向他学。

“干哪！干哪！加油干哪！”副班长催着大家，一边就拿大火扒扒灰。

火越烧越旺，悠悠的，连安全门都起劲了。富根咧着大嘴带笑地说：“顶好的有，顶好的有！”

“哎呀！哎呀！”乘他高兴的这时刻，我蹲在地上装病造魔，嚷道：“厂长先生，我肚子痛，哎呀！我站不住

① 指伪币一元票。

啦。厂长讓我回去吧。”

富根这小子最会收买人心。居然叫值班的电工楊文貴到他家取藥。給了我一个藥丸，这才說：“你的回去。”

我捧着肚子出了大門。聞了聞那藥丸，一股子大烟味儿。真他媽的会盜买人心，順手給他扔在馬路上。

次日早晨八点鐘光景，我們約好的几个工人都在电灯房东胡同集合起来。人不算多，有几个沒来的，可是一打听，进厂的只有把头 and 另外兩個人。工厂的大門已經上了鎖，鬼子怕沒有接班的人，把胡头那一班的人整个扣住了。总算不賴，哥儿們心齐。

我說：“好吧，咱們別在这儿等啦。这儿离厂子近，不太保险。走，先找老梁去。他大概是讓梁大嫂拖住了脚。”

我們找到了梁师付，跟着他一齐到北站打短工“卖現錢”。真是什么鬼年月，在北站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沒碰上一个找人干活的，大家正起急呢，突然从南边开来一輛日寇抓人用的軍車。我一看来势不好，急忙招呼大家：“腿上加油，馬上走人哪！”只是腿再快，也沒有車輪轉的快，卡車已經停住，鬼子已經跳下車来了。逃走是来不及了。怎么办？人多智广，也不知是誰一眼看見馬路左边有輛轎車，正好机器坏了，停在那里。我們就一窩蜂的奔过去，推車便走。下来的日本鬼子干瞪了兩眼，沒敢抓人，他誤以为是坐汽車的人雇我們推車的了，不知里面坐的是什么人物，另抓別人去了。

一关躲过，二关难逃，我們一看在外面干临时工是腦袋拴在褲腰帶上，也不是路。熬了八天只好硬着头皮又回到發电厂。斗争的道路还是找不着呀！

解放了。炮火剛剛停下来，我就从家里挖的地窖里跑出来，大踏步儿向工厂跑去。我爱人剛剛生产，只是我的心顧不上她了。再重要也沒有协助接管工厂这事儿重要了。瞧見軍代表，虽然我从来沒見過他，可我就像見了亲人似的，一面高兴，一面后悔，“如果那年在山西我跑过去，不管我爹，那我現在不曉得做了多少工作了。”

組織上也很重視我。第一次成立党課學習班，便吸收我参加。學習的內容是党员标准，党綱党章，革命史等等，对我來說，真是有生以来头一次开窍，眼界开了，心胸大了。我这才懂得党的崇高和偉大。我的决心很足，要一辈子跟党走。

只是，我的觉悟不高，我还不能全心全意为了党，和党员的标准还有距离。过了些时候，我得了肺炎，在我病中，得到党組織上的关怀，特别是1950年电厂党支部整風，給了我很大教育，我深深体会到党的英明和正确，所以当党在發电厂第二次吸收党员的时候，我便第一个交了志願書。不过这已是1952年了。

話还得从得病的事儿說起。病剛好，还没有恢复健康呢，我就要求上班了。不这样作当时心里不舒服，一个工人一歇多半年，誰受得了呀，党組織怕我身体吃亏，也懂得我这迫切想要工作的心情，准我上班，但不叫我干司爐



2 016 6964 9

的重体刀活，跟老工人耿庆祥一块做钳工，干些轻便活儿。耿师傅是个党员，对我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有时连我喝水他都管。身体渐渐好了，我也要强，所以在大修13号爐的紧张工作中，我也没有因为身体不好掉队。以后，厂内哪有工作我就到哪去打游击。下班以后，我不是进学校的門学习文化，就是进工会的門做工会工作。我是打三厂的工会一成立就担任小组长兼合理化委员的，后来就越来越多的搞起工会的工作来了。我的工作能力虽不高，当时的信念却只有一个，工人翻身了，能力低，也得好好干，好好锻炼！

1953年的春天，党组织又调我到市委党校初级班学习。一去又是半年多。在党校放暑假的时候，我因为半辈子没休息过，休息起来筋骨都觉得难受，便白天回厂，帮助工会搞工作。当时正是工会开展群众思想检查的阶段，很需要人手。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就抓些时间温习党校功课。晚上回到家里，因为街道上正在搞普选，我也参加了这项活动。虽然每天都很紧张，但我的心情却是十分愉快的。

从党校学习回来，组织决定叫我脱产搞工会工作，工会改选时，我被选为基层工会的副主席。光阴过的真快，一晃我已在工会工作了七个年头了。但是，我的工作做的还有许多缺点，我要继续努力，对于一个年轻的工人来说，这只不过是刚刚迈了第一步。

